

台湾大国策

[袁红冰](#) 著

《台湾大国策》出版序

袁红冰所著《台湾大劫难》一书，上市不到三个月即销售了数万册，英文版和日文版也即将出版，相信定会在台海两岸乃至美国和日本进一步引起震撼性效应。袁红冰新作《台湾大国策》是《台湾大劫难》的姊妹篇。资深分析人士认为，这本新书的出版，将会引起更大的震撼。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共高层和军方就已经秘密确定立这样的战略观念：「中国的崛起同美国的战略利益根本冲突。」《台湾大国策》首先披露了二零零七年夏，中共中央的一份绝密文件《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这份文件只发到中共中央委员一级。根据这份文件，中共要把二十一世纪变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世纪」，要实现中共为核心力量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复兴」；「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和世界规则的建立者」。

书中还披露，中共军方经长期研究形成的「超限战」思想深得胡锦涛欣赏。所谓「超限战」的含义之一，就是运用非军事手段进行的战争，这里所说的「非军事手段」战争指经济、文化、外交、社会、心理、互联网虚拟空间等各个领域进行的全方位战争。战争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中共全球扩张的政治目标。

作者以大量中共全球扩张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为根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实际是中共对自由民主世界的宣战书。胡锦涛的所谓「和平崛起」，就是以「超限战」的方式，通过经济、文化、外交、社会、心理、互联网等方式，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动员令。

作者更揭示出，在马英九政府不停宣传「两岸互利双赢」、「台湾离战争越来越远」的同时，中共通过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的全面渗透已经登陆台湾，中共对台湾的「超限战」也正如火如荼；国民党权贵阶层的政策表明，他们彻底背叛了台湾的自由，成为中共「超限战」的同盟军。

另外，作者还根据大量翔实的第一手信息，揭示出中共内部权斗的隐秘内幕。国际间已经出版了很多以中共内部权斗为题材的书，但大都属于望风捕影、缺少翔实根据之作。没有一本书，能像《台湾大国策》这样，对中共内部权斗作出如此深刻、真实、令人叹为观止的披露与分析。有分析人士预计，《台湾大国策》的这部分内容，必将成为世界上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的不可缺少的参考。

对中共全球扩张的警示；对中共控制台湾的「超限战」的揭示；对中共少将朱成虎同美国对抗的「核瞪眼」理论的披露；对国民党权贵沦为中共灭台的政治同盟军的披露；对中共政治死穴的入木三分的分析；对中共自身大危机爆发前景的令人信服的判断；以直接信息为基础，对中共最高级官员的人格和心理的探讨；对中共试图运用ECFA全面控制台湾经济的阴谋的深刻揭示；对中共全面操控台湾二零一二总统大选的周密计划的揭示——所有这些内容，使《台湾大国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当代了解中共和台海两岸关系的第一书。

根据对中共的深刻、全面的了解，作者提出了台湾抗争强权、保卫自由的大国策。书中的相关内容，既充满大政治智慧，也有能够感动历史的真情和勇气。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不禁击节赞叹。相关内容中关于二零一二年三月至五月将是台湾最危险时刻的判断，以及提出的应对策略，必定会对台湾政治家群体和所有关心台湾命运的人产生震撼性的警醒作用。

作者是以文学大师和哲学大师的文笔书写政论著作。因此，不仅文字流畅、语言优美，而且处处显示出哲理的智能。这使《台湾大国策》和《台湾大劫难》一样，超越其它的政论著作，成为同时具有文字和哲学价值的奇书。

袁红冰在《台湾大劫难》中就明确指出，亨廷顿关于中西方文化冲突构成二十一世纪焦点的理论是错误的。同时，他也提出，新世纪的根本冲突是西方文化的自我矛盾，即源自古希腊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理念，同西方的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而「中共暴政」就是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现代复活的经典表现。袁红冰的这个思想已经引起美国、欧洲和日本思想的重视。《台湾大国策》一书，则通过更丰富的信息，进一步有力地论证了上述思想。另外这本书还对当前自由民主国家的精神危机也作出深刻的哲学分析。据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台湾大国策》也将在当代人类思想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

《台湾大国策》推荐序

本书作者袁红冰先生是一位旅居海外的中国异议份子，去年出版《台湾大劫难——2012不战而胜台湾》，不但十分轰动，成为畅销书，而且提出的看法让许多关心台湾前途人士大为震撼，忧心重重，十分担心中共的谋台战略。今年，袁先生又写了一本新书——「台湾大国策」，目的在提出一套让台湾走出历史的阴影，既有利于中国民主化，又能保卫台湾自由的独立建国大战略。本人不但深受袁先生尽心尽力，为台湾未来设想的高尚情操所感动，对于本书内容的精辟分析、独特见解及真知灼见更是佩服万分。

本书认为中共极权体制的演变将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一种是由于权力斗争引起社会矛盾大爆发而像前苏联那样崩溃，第二种可能是通过对外扩张转移矛盾，造成人类的大劫难；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中共已确定把控制台湾作为全球扩张的第一步，并把时间定在2012年底，所以对台湾而言，2012年是最危险的一年。可是马政府

不但完全忽视这个危险，相反的却宣称只要循其全面投降中共的路线走下去，台湾将进入「黄金十年」。本书进一步指出，台湾人面对这么险恶的环境，如不想听天由命，就必须起而主导自己的命运，提出一套大英勇、大智慧的解决方法，也就是台湾要独立建国，这是本书为台湾前途所提出的大国策，值得关心台湾前途的人士参考。

本人非常同意本书作者的看法，认为台湾民主化和自由化对中国人有政治示范作用，已形成对中共的一项致命的政治威胁，可能会导致中共政权的崩溃，所以中共必须控制台湾，但是如果方法及时机不对，也可能带来中共政权的灭亡。但这是中共自己找来的麻烦，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纠缠不清，其实是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恩怨情仇的结果，因为台湾从来就不曾是中国的一部分，与中共也没有任何关连，可是中共还是不愿放弃对台湾文攻武吓，宣称拥有台湾主权。因此，面对中国的威胁及挑战，台湾就必须认清本身的优点，了解中国的弱点，并利用这优点来对抗中国的弱点，才能处于不败之地。当前台湾最大的优点是自由民主制度，而中共的弱点则是政治的专制独裁。为什么中共视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为其最大威胁的原因是由于爱好自由民主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而中共利用其专制独裁手段强加在人民身上，让百姓没有选择自由民主的机会。要不然，中国人也会选择自由民主制度。这可从近年来中国虽在紧密的管控之下，仍然不断发生异议份子要求自由民主即可显示出来。这才是中共所最担心的。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IMF）资料，2009年中国之平均每人所得只有 3,678 美元，世界排名 98，如以购买力平价（PPP）表示，则为 6,567 美元，世界排名 99，但同年，台湾的平均每人所得为 16,392 美元，世界排名 38，如以 PPP 计算则高达 31,834 美元，世界排名 24，二者相差约 4~5 倍之多，显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台湾仍然有一段相当的差距。所以当前中国所最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大环境来加速发展，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不是运用其军事外交优势来谋求控制台湾。何况台湾过去 20 年来是以比较进步的国家对中国提供资金、人才、技术、管理、市场营销等，协助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实际上也获得很多益处。中国一方面以便宜的劳工、土地，牺牲环保，成为「世界工厂」，大量出口美国、欧盟、日本等先进国家市场，赚取大量外汇，但也产生国际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与先进国家特别是美国及欧盟之间产生许多贸易摩擦，如人民币是否升值等问题。中国虽然经济上采取市场开放，欢迎外国人投资，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会员，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仍然相对落后，尤其是在政治专制体制下，主要企业仍属政府所有，经济决策及法规不够透明，所以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等先进国家，仍然认定中国是一个利用低工资维持国际竞争力的不公平竞争的国家，而不愿认定中国已达「市场经济」地位。最近在中国投资外商如台湾的鸿海富士康、日本的本田（Honda）汽车等发生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事件，虽然已经平息，但对于中国工资水平提升的冲击仍然在持续。这些事件一定会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及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可以预期的是，中国之经济发展正面临严重的挑战。

中国这种转型的经济能否持续的发展，一方面要看中国能否从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

顺利的转型为国内消费为主的经济，否则，先进国家势必无法吸收中国每年快速的出口成长；另一方面，人民所得的提高必会要求进一步的政治自由，但如此必会危害到中共的独裁政权。因此，如何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其所带来的政治冲击，决定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及经济能否稳定发展。换言之，一个政治上持续专制独裁，但经济上自由开放且快速成长的体制是一个不稳定的体制，尤其像中国面积这么大，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不均持续恶化，农村与都市差距不断扩大下，很容易就会发生问题。

邓小平自 1978 年起推动的改革开放政策经过 30 年的演变，中国经济的确获得相当的进步，这是政府企业不断放宽自主权，引入市场机制，并欢迎外资参与的结果。可是在政治上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法令规章缺乏透明化，因此贿赂横行。在中国流行着「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有权就有钱」的顺口溜，显示除非配合政治改革，推动民主化，否则，中共政权迟早会连根烂掉，终于导致崩溃。

面对中国谋台的野心，台湾的前途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本书一再强调 2012 年是台湾最危险的时刻。因为一方面有中共的威胁，同时，也有国共联手制台的危机，如何提出一套化解的方法是台湾必须严肃思考的课题。针对这个课题，本书内容提供关心台湾前途人士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见解，值得予以推荐。

目 录

[台湾大国策 前言：历史在逼问台湾](#)

作政治奴隶，还是作自由人

[台湾大国策 一：第三次世界大战悄悄拉开序幕\(组图\)](#)

--中共极权的全球扩张战略

一、引言

二、中共极权扩张的政治意志

--从未熄灭的欲望之火

三、胡锦涛：猥琐人格承受的巨大野心

--中共二十一世纪扩张战略的形成

四、“超限战”与第三次世界大战

--中共，现代十字军的西征

[台湾大国策 二：中共极权扩张的谋略概要](#)

--属于恶魔的理性

一、引言

二、中共扩张中的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

--命运钉入一个铁血强权眼睛中的两根铁钉

- 三、收买并腐蚀全世界
- 人类正上演道德的悲剧
- 四、恐怖主义的策源地
- 不仅仅是试图用恐惧威吓世界

台湾大国策 三：哲学与人性的悲剧

人类大劫难是怎样形成的

- 一、引言
- 二、自由民主国家的危机
- 变革的需要和哲学的贫困
- 三、中共暴政的本质
-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极端变异
- 四、谁养肥了中共
- 理性和良知在贪欲前的历史性失败

台湾大国策 四：无可回避的宿命

中共极权扩张阴影下的台湾

- 一、引言
- 二、“统独”之争是中共与国民党权贵共同制造的?概念
- 台湾的自由处于危险之中
- 三、中共已经全面展开对台湾的“超限战”
- 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是台湾自由的保卫者，还是中共的同盟军
- 四、不惜与美国作军事?战
- 中共是以血海?美酒的魔鬼

台湾大国策 五：黑暗中孕育的希望之光

人类大劫难之源自身的危机

- 一、引言
- 二、以往中共崩溃和中共政治改良的预言?什?都受到时间的嘲弄
- 思想基点的错误
- 三、中国社会全面危机的政治意志化
- 中共极权割肉自啖的政治天性
- 四、中共将在腐烂中走向灭亡
- 一种最丑陋的死亡方式

台湾大国策 六：中国内部权斗生死局

来自天谴的恶咒

- 一、引言
- 二、中共建政后第一阶段权斗回顾
- 偶然性对魔鬼的垂爱
- 三、江泽民与胡锦涛阶段
- 鼠辈人格的内斗样式

四、独特的人格?定独特的命运

--中共"第五代"的权斗将撞响中共的丧钟

台湾大国策 七：中共内部权斗和社会危机

中共内部权斗和社会危机的交互作用

--偶然性与必然性导演的戏剧

一、引言

二、当代中共权斗如何蚀裂极权体制

--没有公正规则的竞争

三、中国社会大变革

--条件成熟得只需要一个历史机遇

四、当前中共权斗的基本态势

--现实在预言未来

台湾大国策 八：台湾必须走出历史的阴影

--以自由的名义

一、引言

二、国民党权贵走上背叛自由的政治自杀之路

--一个百年政治命运的终结

三、《中华民国》已丧失台湾主权之盾的作用

--被当代国民党权贵埋葬在历史阴影中的概念

四、台湾，属于所有生活在台湾的族群的命运共同体

--台湾族群大和解

台湾大国策 九：台湾大崛起

--在命运逼迫下走向时代荣耀之巅

一、引言

二、世界的堕落与台湾的抉择

--和中共一起腐烂，还是作人类自由价值的捍卫者

三、台湾独立建国的时机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四、让《台湾共和国宪法》成为人类自由价值的集中表述

--一个既有利于中国民主化，又是保卫台湾自由所必须的时代主题

台湾大国策 十：铁血国策卫自由

--命运不相信怯懦者的眼泪或者微笑

一、引言

二、台湾最危险的时期：二零一二年三月至五月

--用铁血意志论证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

三、台湾国家意志宣示

--台湾给人类历史的备忘录

四、让保卫台湾的自由成为人类的共同事业

--组建《保卫台湾自由国际志愿军》

[结束语：属于台湾的英雄史诗时代](#)

--历史将把他们的灵魂刻在鐵碑之上

台湾大国策 前言：历史在逼问台湾

翻墙:<http://tinyurl.com/3e3k442> 全文:<http://is.gd/1SzG66>

前言：历史在逼问台湾

——作政治奴隶，还是作[自由人](#)

时间本无意义，是人的意志赋与时间意义，就像命运给了人灵魂。英雄史诗，则是生命意义的华彩篇章。

当代，心灵腐烂于物性贪欲，精神之光黯淡；物性实用主义哲学成为生命意义的主题，理想主义如秋风中的黄叶飘零——这是一个背叛美与高贵，并只懂得表述庸俗的时代。或许命运也厌烦了那令白玉之骨和铁石之心都生出斑斑霉迹的庸俗，从而引导或者即将引导两个族群，在这个诅咒英雄的时代，用血和泪谱写英雄史诗。

人类万年历史中发生过许多次民族大迁徙——为生存，为逃离贫穷或者战乱而迁徙。唯有藏人，是为了心灵的信仰不被中共铁血强权灭绝，才走上悲怆的流亡之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达赖喇嘛尊者，领十万藏人，翻越万里云海之上的喜马拉雅冰峰雪岭，走上民族的流亡与迁徙之路：流亡，是为了信仰的自由；迁徙，是相信终有一日，能怀着圣洁的信仰，重返生命的家园。

藏人的流亡与迁徙，已成为当代的英雄史诗；这首藏人的命运吟诵的英雄史诗，越过五十年时间，依然回荡在历史中。藏人的流亡与迁徙，是通向苍天的命运之路。连太阳都在物性贪欲中腐烂的时刻，由藏人的白骨与血泪铺就的命运之路，在坚守精神的启示；达赖喇嘛尊者正在苍穹之巅，为人类不死于物性的庸俗，点亮一盏心灵的金灯，那或许是人类得到精神救赎的希望。

当代，藏人正在证明自己属于英雄史诗的族群，而命运选定的另一个英雄史诗的族群将是台湾人。藏人的英雄史诗已经成为现实中怒放的心灵之花，台湾人的英雄史诗却仍然在我的预言中。我预言：中共铁血强权已经通过超“超限战”的方式拉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中共首先要控制并进而消灭的，是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台湾人将在中共铁血强权的逼迫下，用卫护自由的激情，书写当代另一首英雄史诗；属于台湾的英雄史诗将成为时代精神的主题，因为，历史宿命地选定台湾，作为自由与强权首战的决战之地，而决战的结果将相当程度上决定下一个历史时期人类的命运；更因为，自由是属于人类的共同事业，如果决战之际世界对台湾的自由命运表示冷漠，那么全人类都将由于对自由的共同事业的背叛，而承受前所未有的大劫难。

我对台湾英雄史诗的预言，同时也是对人类命运的预言。不过，我的预言既不是以所谓“先知”的名义作出，也不是以推理或者逻辑分析为根据，而是基于对中共铁血强权真实政治意志的洞察，尽管强权的真实意志被中共遮天蔽日的谎言所掩盖。

“中共‘超限战’是如何提出的；‘超限战’的真实涵意是什么；中共全球扩张战略是怎样形成与发展的”？

“亨廷顿关于二十一世纪的主题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论断是否正确；为什么说当代决定人类命运的根本冲突是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而中共强权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现代表现和极端形式”？

“为什么判定中共的全球扩张战略不是中国皇权传统的复活，而是十字军和希特勒征服世界精神的复活”？

“[胡锦涛](#)为什么屡次强调中美关系的和谐发展取决于双方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而[胡锦涛](#)提出的中共核心利益为什么是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

“为什么中共强权全球扩张战略首先要灭绝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其次要通过外交和战争方式逼迫印度驱逐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难民社区”？

“为什么美国如果介入台海战事，中共将不惜与美国决战；如果中美全面战争开始，中共将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对美的‘超限战’”？

“中共会用什么手段操控台湾的下一次大选；为什么说二零一二年三月至五月是决定台湾未来命运的最关键、最危险的时期”？

“为什么说中共已经通过‘超限战’模式，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各领域全面登陆台湾；马英九政府不是台湾自由的保卫者，而是中共灭绝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同盟军”？

“为什么以往诸多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对中共崩溃的预测都受到时间嘲弄；他们错在哪里”？

“中共铁血强权的真正危机在何处；这种危机将以怎样的方式和在什么时间段内爆发，爆发的政治后果将是什么；台湾的命运，乃至人类的命运，同中共的危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根据对中共真实政治意志的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洞察，我将在《台湾大国策》中，对上述十个关于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时代之问，作出明确而具体的回答。对于台湾，这十个时代之问，都直接凝成一个命运的冷峻逼问：“作中共强权的政治奴隶，还是作自由人”？

我愿相信，台湾人将拒绝为苟安而作卑贱的政治奴隶；台湾人将为自由人的尊严而勇敢迎接艰险的搏战。我也愿预言：台湾将书写属于自由的英雄史诗。但是，对于“作政治奴隶，还是作自由人”的冷峻逼问，最终只能由台湾人自己作出回答。我所能作的，是为保卫台湾自由，提出战略和策略性思考。这也是《台湾大国策》的主题之一。

另外,《台湾大国策》总计十章,却只在最后三章直接讨论有关台湾大国策的内容,前七章基本在讨论两岸关系,特别是有关中共的扩张战略及其内部大危机之所在。之所以作出这种结构安排,是因为只有达到对中共从本质到现象的全面而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有实用价值的应对中共扩张的台湾国策,或者说,真实而全面地了解了中共,台湾应对中共扩张的国策也就水到渠成。

台湾小而美丽,书名却标以《台湾大国策》。其原因在于,命运强加给台湾的这次与铁血强权的决战意义重大——如果自由的台湾赢得凯旋,世界将免于一次极权扩张的大劫难;如果中共强权摧残了台湾的自由,人类将进入一个血雨腥风的黑暗时代。正由于此,我愿以《台湾大国策》之名,代历史发出呼吁:让台湾保卫自由之战,成为全人类的神圣事业;让台湾为自由而飘洒的血泪,成为献给人类未来的英雄史诗,那是值得吟诵万年的诗篇。

台湾大国策 一: 第三次世界大战悄悄拉开序幕(组图)

翻墙:<http://tinyurl.com/3e3k442> 全文:<http://is.gd/1SzG66>



《台湾大国策》



袁红冰出版的自由台湾三部曲

[前言: 历史在逼问台湾](#)

第一章

人类大劫难：第三次世界大战已悄悄拉开帷幕 ——中共极权的全球扩张战略

一、引言

“冷战早已结束，人类终于走出[民主](#)与专制两大阵营对峙的危险时期，进入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中共会由于经济的发展，逐步开始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极权专制不再是对人类的主要威胁。”；

“基于经济的全球化，各国的利益互相依存度日益强化，世界性战争爆发的几率趋于零。”——所有这些对于世界各国文人和政客的国际政治观的总结性表述，都如同一支支注入人类精神的催眠剂，正在麻醉二十一世纪的神经。连美国的小政客总统奥巴马家庭的圣诞之树上，也赫然挂出中共极权之父[毛泽东](#)的照片，而更加渺小的政客马英九，则频频眨动他那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声称同中共建立起了互利双赢的关系，“两岸离战争越来越远”。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政治神经被麻痹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前述对当代国际政治局势的经典性观念，都在表述谎言。而[民主国家](#)的政客、文人与中共极权的御用文人，在谎言的表述上竟达到令人震惊的一致。不同之处只在于，有的谎言表述是基于愚蠢或者人格的堕落，有的则是基于故意欺骗。[民主政治](#)的价值并不表现为理想主义的状态，而只表现为防止最坏的状态发生，即防止极权专制对人的奴役。因为，多数选择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原则，而绝大多数人都是靠感觉和常识作出选择，而不是凭借深思熟虑的理性与智慧。由此一来，民主逻辑选择的政客，往往只有哗众取宠的小精明，而没洞察先机的大智慧；民主逻辑中浮现出的知识分子明星，常常也只像模特儿一样，通过扭腰摆臀式的浅薄的文化表演，赢得世俗的影响力，而完全不具备“民族智慧之镜”的能力与资格。这正是当代[民主国家](#)的政客、文人引领世界行进在谎言中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利益所收买，把灵魂出卖给中共，才开始随谎言的节拍起舞。

极权专制的罪恶根本在于对人的精神奴役。不过，极权专制又有能力选择某些诡诈至极的智慧和知识的拥有者作它的御用文人。现在，中共的御用文人正把智慧和知识变为欺骗世界的工具——欺骗世界，让人类在谎言中麻痹，是为了掩盖中共全球扩张的政治战略和事实。

人类的命运在愚蠢者与卑鄙者相信的谎言中蹒跚而行。这显然意味着时代的悲剧。而人类的命运在诡诈者的欺骗中行进，则必然预言历史的大劫难。对于智者和先知，这是一个荒凉的时代。但是，出于对人类自由事业的忠诚，我必须踏过万里谎言，站在智慧之巅，向历史讲述事实的真相：中共极权从来没有泯灭过全球扩张的政治野心；当代，以[胡锦涛](#)的猥琐人格为扩张野心的生命承载者，中共极权已经形成并展开全球扩张的政治战略；通过“超限战”的模式，中共在“和平崛起”的谎言掩护下，悄悄拉开了以征服全世界为战略目标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帷幕。

二、中共极权扩张的政治意志 ——从未熄灭的欲望之火

“性格决定命运”。对于个人，这个判断意味着真理的表述。就人类的历史而言，命运的决定者则往往是主导历史精神的政治意志。

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种全球扩张、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是浴血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魂，也是中共从建政之日起从未熄灭过的欲望之火。现在，分析中共历史、判断中共未来政治走向的著作汗牛充栋，甚至多如印度夏日的飞蝇。然而，其中却很少能够找到从全球扩张的政治意志的角度解读中共政治人格的真知灼见。事实上，征服世界的野心构成中共国际政治行为的“第一推动力”，而且相当程度上影响中共国内政治的决策。

韩战是中共建政后，在全球扩张野心引领下发起的第一战。对于中共，韩战并非起始于“志愿军”越过鸭绿江。北韩军队大举南侵之日，就是中共开始扩张的首战之时。因为，金日成实质上不过是中共军队的一名中级军官，北韩共产党也只是中共的一个分支，北韩军队南侵的主力亦由中共军队改编而成——金日成及其政党和军队，是中共政治肢体的一部分；北韩的南侵作战并不是两种意志的体现，而是中共极权扩张野心指导下的统一行为。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共极权之父毛泽东曾要求赫鲁晓夫动用核武器，发起对美国的全面战争，并承诺中共将组建一千个师或者更多军队参战。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宣称，打核大战，即使人类损失三分之二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能换来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也是值得的；人口数量再经过几十年发展也会恢复。

佛学把贪欲视为人的三种终极罪恶之一。拥有世界的贪欲一旦同独裁者的权力结合在一起，人类就将面临重大危机。只是因为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没有坚定到毛泽东那样疯狂的程度，人类才免于劫。此后，由于赫鲁晓夫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没有达到极致，以及其它更为复杂的政治原因，中共指控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发动核大战的建议被赫鲁晓夫拒绝之后，毛泽东决定自己全力开发核武器——中共开发核武器的意志起点，不是基于自卫的愿望，而是基于征服世界的欲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中营——“人民公社”的倒行逆施，以及经济“大跃进”的非理性举措，使中国陷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近四千万中国农民被饿死。就在这样的悲惨时刻，中共全球扩张的贪欲之火仍然炽烈。中共拨出巨款发展核武器和核潜艇，而置伏尸万里、白骨撑天的民族大悲剧于不顾。此刻，我重述以上历史，并非试图感动什么人；我深知，在一个冷漠的时代，很少有人会为别人的苦难流泪，更何况那是五十年前的苦难。但是，我希望历史的重述能够提醒人类：中共极权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可以冷酷和坚硬到无视最惨烈的人间悲剧的程度。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共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爆发为全面的政治社会危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这次政治社会危机贴上的虚假的标签。然而，以“文化大革命”命名的大危机发生前后，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政治意志不仅继续主导中共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轨迹，而且显得更加亢奋。

毛泽东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国际政治，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三个世界，即美苏“霸权”国为第一世界，欧洲等国家为第二世界，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

界。中共自命第三世界的领袖，并以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作为合理性根据，进行全球扩张；输出“革命”，则是当时中共全球扩张的主要方式。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共制定并不遗余力地执行其输出革命的全球扩张计划，在东南亚、南海群岛、南亚次大陆、非洲、拉丁美洲的广阔地域内，散布共产革命的激情，培育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政治势力和游击队式的军事力量。由于当年中共的经济能量还不足以为其野心勃勃的扩张战略提供足够的物资力量支持，所以，那一次共产主义扩张的狂潮，主要表现为精神能量的释放。即便如此，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扩张，仍然留下许多不应当被忘却的悲剧。

那个历史过程中最具浪漫激情的事件，是数万“红卫兵”怀着发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越过中缅边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然而，理想是虚幻的，现实则比死亡更残酷——数万美如朝霞的年轻生命黯然消失在东南亚阴暗的丛林中。现在，他们的白骨早已腐烂，他们的鬼魂却可能重返人间，因为，和他们曾经有同样的“红卫兵”情结的人，例如薄熙来一类，正在被培养为中共“第五代”权力执掌者。

那个历史过程中最血腥的事件，莫过于红色高棉的大屠杀。波尔布特拜谒毛泽东，领受“最高指示”之后，以共产主义式的社会改造之名，在短短的时日内，竟然杀死近三分之一柬埔寨人，其中包括数十万华侨。时至今日，中共还在用重重政治铁幕，掩盖这次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大屠杀。那永远不会消散的血腥气对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又一次作出事实的诠释——“解放”就意味着用铁血之死，让人得到终极解脱。

人是健忘的，历史则必须记住血泪书写的悲剧。如果历史也忘却了，人就将重新以更残酷的方式演绎同一个悲剧。可悲的是，现在不仅人遗忘了历史，历史似乎也忘却了它应该记住的教训——人和历史都因遗忘而失去了过去，过去就只能在未来中重现。

毛泽东之死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有人将毛泽东的死亡解读为中共放弃了全球扩张的政治意志，则是浅薄的错误。作为最高权力意志象征的独裁者的生命个性，确实会对极权政治的运作模式和风格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却不能改变极权政治的灵魂。共产极权政治的灵魂是由一整套哲学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历史观和政治学体系所构成；极权政治理念一旦物化为现实的政治存在，它就获得了独立于任何个体的生命与灵魂；是极权政治存在的逻辑决定个人的意志，而不是个人的生命个性决定极权政治的意志，对于独裁者也是如此。

中共内部的一次政变，为邓小平铺好踏上权力巅峰的红地毯。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改变了维护中共极权专制的经济模式，即把过去的计划经济改变为权贵市场经济。但是，他不能真正改变中共极权的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更不能改变中共的极权专制的政体。事实上，邓小平也不想改变。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就是在用思想来证明他对极权专制的忠诚；他毫不犹豫地将六.四学运淹没在血泊中，就是在用反人类的暴力来证明他对极权专制的一往情深。

同样，邓小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改变中共征服世界的政治意志。在邓小平实际主政期间，中共似乎暂时停止了全球扩张的脚步。但那并不意味着放弃，而只是无奈。邓小平主政的历程，恰处于中共两次大危机期间：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那是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一次是六.四屠城的政治后遗症，那是邓小平自己造成的。处此困境，中共全球扩张的政治意志犹如被命运逼进死角的野兽，只能暂时收起

爪牙。这两次危机使中共极权政治伤痕累累，邓小平宿命地只能扮演为极权政治疗伤的角色。不过，即便如此，全球扩张的野心也从没有真正从邓小平的政治生命中消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经济刚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复苏，邓小平就公开在政治报告中宣称，十年之内要实现对台湾的统一。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只是由于“六·四”血案造成的共产主义政治道德的历史性崩溃，使中共的扩张意志再次受挫。“六·四”之后，邓小平面对苏联共产帝国颓然崩溃、中共政权万夫所指的险境，提出“韬光养晦”的国策。“韬光养晦”这个成语的内涵深沉而阴鸷；它所表述的并不是退缩的意志，而是极具进攻性的意志：处于困境之时，要收敛锋芒，不事张扬，暗中积蓄能量，准备对命运作雷霆万钧之反击，一举改变困境——犹如猛虎收缩躯体、低伏深草之中，只为瞬间之后对猎物作致命的扑击。国际间多如印度乞丐的“汉学家”，当年多把邓小平的国策解释为放弃共产主义扩张野心的“务实主义”的产物，真乃愚人之见。

杨尚昆、杨白冰兄弟由于[江泽民](#)的挑拨而失宠于邓小平，并失去军权之后，杨尚昆身边一位工作人员曾透露邓小平对杨尚昆所作的一次谈话内容。谈话时杨尚昆还是邓小平的宠臣。邓小平说：“如果不是赵紫阳煽动学生，使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北京的动乱，我们这一代就有时间和精力解决台湾问题。我们不仅可以亲手给国共两党的历史斗争画上句号，更有意义的是，可以为我们党在世界范围内承担起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责任，消除隐患，打开门户。我们不能原谅赵紫阳，不只是因为他让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失去一次改变历史的机会，主要是因为他推迟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复兴... ..”

从邓小平的话语中我能够感受到某种炽烈的痛苦，那是黑暗的欲望之火焚烧下所产生的痛苦。但愿人类能够明白，能够记住：中共极权专制从共产主义理论中继承的最大贪欲，便是全球扩张的野心；那种野心是中共极权的政治基因，是中共极权不可改变的天性；征服世界的欲望之火将焚烧一个又一个中共独裁者的心，或者使他们痛苦，或者使他们疯狂——处于困境，无力扩张时，他们痛苦；获得扩张的政治和经济能量之后，他们必定以非理性的疯狂，展现“解放全人类”的意志。

三、胡锦涛：猥琐人格承载的巨大野心 ——中共二十一世纪扩张战略的形成

唯有真正的理想主义才能引导人类走进高贵的历史时代；庸俗或者罪恶的政治命运，则必然以人类贪欲的政治意志化作为根本动力。嗜血的共产主义是伪理想主义运动，它的政治实践的全部追求，都在于建立和坚守共产极权专制，以及全球扩张——极权，意味着人类贪欲的极端化，因为，拥有极端权力，就拥有了以人类的精神和肉体为私产的能力；用极权征服世界则是贪欲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都在表述同一个主题，即共产主义的伪理想主义性质和极权政治对于奴役、控制人类的精神与肉体的贪欲。

如果说毛泽东是狂放不羁、视万民为刍狗的一代枭雄，邓小平是深沉老练、凶残冷血的政客，江泽民是天性庸俗浅薄、酷爱卖弄风骚的上海小男人，那么胡锦涛则是奴性入骨而又阴狠寡毒、伪善狡诈而又机警如鼠的宦官。中共四代权力意志象征的人格差别，决定了中共政治风格的某些变化——毛泽东时代飞扬跋扈，邓小平时代务实而铁血，江泽民时代风骚而腐烂，胡锦涛时代则貌似和谐而温情，实则机心百端、凶

险难测。不过，无论政治风格怎样变化，对极权的贪欲和全球扩张的野心却是永远不变的政治主题。政治主题虽然不变，但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为实现政治主题而确定的国策却有两次意义重大的改变。这两次国策之变，都同胡锦涛直接相关。

第一次国策改变的主要内容，是将毛泽东晚期的联美抗苏战略，改变为联俄抗美，以美国为战略敌人。当年，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实现全球扩张的野心，中共与苏共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几至核战边缘。毛泽东为策中共极权专制之安全，决意向美示好，与美建交，共同抗御苏联。毛泽东撒手人寰，但是，他遗留的尸骸和制定的国际战略依然被虔诚地保留在北京——他的尸骸在水晶棺中，他的国际战略在中共官员奴性充斥的头脑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成为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期间，经济上改革开放，政治上实施前所未有的开明政策。一时之间，学术自由，思想活跃，多元的文化思潮滚滚涌入中国。中共顽固派立刻意识到这种状况对极权专制的威胁，他们先后指控胡耀邦和赵紫阳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投降。此时，改变联美抗苏国际战略的动向初见端倪。不过，真正的改变却是以一个名为何新的御用文人的理论为起点。

何新野心如炽，不甘作普通人终其一生，却又无胆抗争暴政，于是便以作中共的御用文人的人生理想。其人工于心计、精于策划、巧于献媚，得到王震、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欢心，虽然没有大学毕业证书，仍然受到破格提拔，最终被安置在中共的皇家学院，即社会科学院，作理论研究。

大致在一九八七年，何新完成了一份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何新预言，未来的几年内苏联可能分崩离析，国际政治局势将发生重大变化；据此何新断言，即将陷于分裂的苏联长期内不再是值得重视的国际政治因素，而中国的崛起势必与美国的全球利益发生战略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将构成下一个历史时期国际政治角逐的主题。

何新的研究报告为中共顽固派的观念提供了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础。一九九零年，何新关于苏联崩溃的预言得到验证之后，中共以美国作为战略敌人的国策已经呼之欲出。胡锦涛因大规模屠杀藏人而获得邓小平信任，并于一九九二年升迁为中共政治局常委，后又兼任中共党校校长；中共的理论和全球战略研究，属于他负责的范围。

胡锦涛看到何新的上述研究报告之后，大为赞叹，并作出如下批示：“何新同志准确预见前苏联垮台，实属难能可贵。说明他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何新同志提出的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崛起必然发生矛盾的论断，也很有远见，应当引起重视。”

为论证中国崛起势必与美国国家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何新提出一系列论据。其中台湾问题首当其冲。何新说，解决台湾问题关乎中共的根本政治利益，而美国出于其全球利益和战略布局的考虑，必定倾全力维护台湾；除非中共同美国在其它对美国更重要的利益领域，达成以台湾为筹码的交易，中美之间将必有一战。何新还

建议，中共应当作好同美国决战的意志和战略准备，同时，尽最大可能和美国达成核心国家利益之间的交换。何新认为，运用同美国进行利益交换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符合中共崛起初期的最大利益；而美国是一个自私的以实用主义哲学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只要给出合适的条件，美国不仅可以出卖盟友，甚至可以“出卖上帝”。

何新关于台湾问题的论述深得胡锦涛之心。胡锦涛升任中共总书记之后，还多次作出指示，制定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一定要参考何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只是由于何新曾强烈批判朱镕基的经济政策而得罪了朱镕基，胡锦涛权衡利害得失，一时还不愿明显提拔起用何新。

由于中共顽固派的支持，以及胡锦涛的推动，以美国为战略敌人的论断逐步转化为中共的国策，并主导中共的内政与外交的具体政策。当然，这种国策的转变是秘而不宣的。正因为处于秘密状况，中共的国策实际上演化成以美国为主要敌人的全球扩张的政治阴谋。

如果说从把美国视为对抗苏联的战略盟友，到把美国当作战略敌人，意味着中共国策的第一次战略性转变，那么，从“六.四”之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胡锦涛在二十一世纪初叶关于中共“和平崛起”的宣示，则标志着中共国策的第二次战略性转变。第一次转变，中共以其全球扩张的政治意志和维护其极权专制统治的必要性分析为背景，对主要的战略敌人重新作出定位；第二次转变，则是在渡过“六.四”血案和前苏东地区共产阵营崩溃的政治大危机之后，中共以二十余年权贵市场经济积累的巨大经济能量为信心的根据，具体确定了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扩张的政治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战略方式。

共产极权体制的政治基因，决定其战略目标的政治趋向；独裁者个人的人格特征，则决定极权体制实现其战略目标过程中的运作风格和策略特点。因此，为深刻理解中共二十一世纪扩张战略目标的运作风格和策略特点，就不能不对胡锦涛的人格特征，作必要的分析。

胡锦涛人格的养成主要基于中共官场的政治逻辑，同时也和他个人的病理特征直接有关。一九八四年任贵州省委书记之前，胡锦涛便罹患严重的糖尿病，以致阳痿不举，食欲受限。在美女如云如雾的贵州，没有能力恣意赏玩佳丽；在美酒之乡，却只能闻而不能痛饮国酒“茅台”，胡锦涛怎一个“愁”字了得。“食色性也”，在两大生命基本欲望被糖尿病冷酷阉割的情况下，对权力的贪欲和玩弄权力的阴谋，即无可选择地成为胡锦涛唯一真正的生命兴趣。正所谓“祸兮福所倚”，胡锦涛不幸丧失性欲和食欲，反能够心无旁骛，全心全意专注于权力角逐，从而使这样一个佣人俗物，终得问鼎中共最高权力。

中共官场有一个不太著名的官员，却与胡锦涛渊源甚深。此人名叫王三运，天性好财、好色，而最是好酒，自诩“酒鬼之王”；他声称，好色是为有红袖添酒，好财是为有钱得购天下美酒。胡锦涛初到贵州任书记，王三运不过是中共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的一个副处长。但因缘际会，胡锦涛一次到贵州师范学院考察，王三运之妻恰在学院工作；该女容貌姣好，善解人意，被安排作胡锦涛的接待服务工作。从此，王三运之妻便同胡锦涛拉上关系——太监尚有慕色之心，何况胡锦涛不过阳痿不举而已。

依凭红裙绿带之关系，王三运开始官运亨通。有人嘲笑王三运卖妻求荣。王三运一次酒醉后对一干结成盟兄弟的官员讲：“我是得荣而没有卖妻——我老婆说了，‘胡锦涛那玩意儿，既不耐看，也不顶用。’”从此之后，这句话在贵州官场不脛而走，成为一句形容劣质产品的歇后语。

不过，王三运能官路通达，更与他自己的直接努力有关。得知胡锦涛因糖尿病不能行人事之后，王三运便千方百计、八方奔走，为胡锦涛寻求治阳痿的中医秘方。听说用穿山甲的生殖腺泡酒有奇效后，王三运不畏艰险，进入大山深处，向山民求购穿山甲；返程时，不慎跌入山涧，腰椎受伤，几至残废。王三运最终虽未治好胡锦涛的阳痿，却赢得胡锦涛的欢心。此后，尽管不断有人检举王三运家族贪污腐败，但在胡锦涛的庇护下，王三运一直有惊无险。为避风头，他多次平级调官。由贵州副书记先后调任四川副书记、福建副书记；中共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更被胡锦涛钦点为其家乡安徽的省长。

用一些篇幅介绍王三运，是为读者理解他对胡锦涛人格的一次评断提供背景。二零零三年冬，王三运曾由福建秘密返回贵州数日，目的是安排其家族部分资金向海外转移事项。事毕临行前，王三运召集贵州官场他的几个磕头兄弟和一位精于面相之学的奇人，一起纵酒狂饮，就是这位奇人最初告诉他，胡锦涛“笑里藏刀，必掌大权”，他才决定不遗余力讨好胡锦涛。那日大醉之后，王三运说到胡锦涛时，如此评论：“... ..溜住谁，也不如溜住胡锦涛；得罪江泽民，也不能得罪胡锦涛。胡锦涛这个人每天过的都是和尚的生活，不能吃，不能喝，基本也不能玩女人。他只好一心琢磨怎么玩权。玩权就是玩人。我看玩权对他比色鬼玩女人还上瘾。... ..胡锦涛明年接军委主席后，一定要解决台玩湾问题。你们想，有绝色美女在你面前，有百年‘茅台’放在你的鼻子下，你们会放过，不玩不喝吗？权力就是咱胡总书记的美女和‘茅台’。他只要掌了大权，就必要用权：用权建不世之功。现在，对于我党，只有解决台湾问题才是不世之功啦。”

作为胡锦涛的心腹。王三运对胡锦涛的评断自有其深刻和精确之处。对权力的沸腾的贪欲确实构成胡锦涛生命的本质，但王三运还是小觑了胡锦涛的野心——胡锦涛并不以解决台湾问题为满足，他更要重新举起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扩张的战旗。整个世界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猥琐的人格所承载的巨大的政治野心；支持其政治野心的，是绑架了十五亿三千万中国政治奴隶的中共铁血强权。如果对胡锦涛，这个中共铁血强权的权力意志象征缺少真正的理解，人类将在昏睡中迎来一次极权扩张的大劫难。因为，由胡锦涛猥琐的人格特征所决定，中共全球扩张的运作模式会极端伪善，极端具有欺骗性和阴谋性——猥琐的人格酷爱阴谋；猥琐人格主导的权力意志，就是政治阴谋在伪善和欺骗中展开的过程。其实，胡锦涛脸上塑料花一样永远不变的笑容已经欺骗了，或者说迷倒了世界上诸多的政客和老处女。

四、“超限战”与第三次世界大战 ——中共，现代十字军的西征

二零零七年初夏，一份绝密文件从中南海发出。文件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以下简称《地位和使命》）。文件载明的撰稿人是胡锦涛。中共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决定这份文件传达到中央委员一级；军队中，用口头宣读的方式，传达到集团军军政主官一级。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对

此作出解释时，称：“这份文件是我党二十一世纪全球战略的最高机密，所以必须采取最严格的保密措施。”

如果说“和平崛起”的宣示是中共全球扩张战略的一个温柔而委婉的外交辞令式表述，那么，《地位和使命》则是关于中共全球扩张战略的真实而坚定的原则规划。一位中共高官私下评论说：“这份文件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

《地位和使命》字数约九千。全文的主题有两个：一是二十一世纪中共全球扩张的战略目标；一是实现战略目标的运作模式和策略原则。

在《地位和使命》中，胡锦涛首先回顾确定美国为中共主要战略敌人的历史过程，说明一九八七年何新就提出一个战略观念，即“中国的崛起同美国的战略利益根本冲突。”胡锦涛在对何新的“远见”赞赏之余，强调当年何新的观点一提出，就受到王震、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及时肯定；正是这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制定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战略指明了基本的政治方向。

胡锦涛认为，中共已经彻底走出“六.四”事件所造成的危机；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应当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目标，“承担起对人类的更大责任”。胡锦涛用极其明确的语言，对中共的全球战略目标作出表述：要把二十一世纪变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世纪”；中共“要取代美国，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和世界规则的建立者，成为国际法的主要立法者，使国际法从资本主义国家意志的体现者，改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意志的体现者”；要实现以中共为核心力量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复兴”。

胡锦涛少有的似乎难以抑制某种在黑暗阴影中沸腾的激情，反复论说共产主义复兴的话题。他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痛心疾首；对当时人类所表现出的历史性欢悦仇恨刻骨。他断言，中共最光荣的历史地位不应止于自身的强大，而在于成为“共产主义复兴的伟大旗帜”。胡锦涛这类梦呓般的话语会使人觉得历史正在倒退向过去时间的废墟，但是，魔鬼之梦一旦同极端的权力结盟，世界便已处在现实的危险中。百年历史证明，共产主义运动是从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中涌出的一条淹没了人性与良知血河；今天，当各国的小政客和蠢愚的“中国问题专家”们面带傻乎乎的微笑，希望中共由于经济的发展而走向政治改良之时，共产主义的血河却依然在中共权力意志的生命象征，即胡锦涛的心底里激起狂涛巨澜。

以马克思为起点，在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理论大师和实践领袖中，人格最为猥琐不堪的，莫过于胡锦涛。作出这样的判定，并不仅是由于胡锦涛对权力的病态的热恋和苦恋，以及这种恋情中涌溢出的巨大野心，而更是由于胡锦涛阴险凶残的奴性人格特征。胡锦涛出身寒微，几十年藏首缩颈、蝇营狗苟，苦苦筹思于阴影之下，循循奔走于权贵之门，全凭入骨之奴性才得以与权力结缘；如果说对权力的贪欲是胡锦涛生命的主题，奴性人格则是书写其生命主题的笔。不过，奴性一旦得到专制权力的附丽，就会演化成极端的双重人格，即极端自卑与极端自恋同在；极端怯懦与极端亢奋共存；极端伪善与极端诡诈一体。

胡锦涛的极端双重人格必定深刻影响当代中共权力意志的趋向和风格。《地位和使命》一文中，中共要取代美国替人类立法，以及复兴共产主义运动的宣示，字里行间，极端自恋与亢奋之情凝成的伪善野心溢于言表。同时，极端的自卑、怯懦、诡诈又决定了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战略的运作风格和策略原则。胡锦涛在该文中说：“我党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战略目标和政治意图要严格保密；要只做不说，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胡锦涛认为，中共之所以能渡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全球性的共产主义危机，而“屹立不倒”，关键原因之一，是得益于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国策。他写道：“‘韬光养晦’是危机期最高的策略原则，它麻痹了敌对势力，为我党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机遇。... 现阶段，我党已经具备再次崛起的经济能力和国际环境，但是我们绝不放弃‘韬光养晦’的策略原则。我们要在‘韬光养晦’中崛起，要继续散布、强化敌对势力对于我党会由于经济发展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为推进我党的全球战略减少阻力；我们也要在崛起中‘韬光养晦’，继续麻痹敌对势力，更快地发展好、储备好经济力量，为尽早迎来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复兴创造条件。”

胡锦涛的诡诈人格分娩出的策略原则，使中共全球扩张具备了政治阴谋的能量。政治阴谋能量的主要价值在于欺骗，而人类的命运常在谎言中蹒跚，阴谋的欺骗往往比赤裸裸的强权更容易征服历史。现在，人类的命运正在谎言中走向大劫难；人类的历史正在中共的全球扩张阴谋中走向大悲剧。

在《地位和使命》中，胡锦涛对上个世纪后半叶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性挫败作出总结。他断言，资本主义敌对势力，早就根据“和平演变”的大战略，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渗透，向社会主义国家发起不宣而战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人对这个意义上的战争毫无警觉，因此全面失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的领导人对此也缺少足够的警惕，所以导致造成中共重大危机的“六.四”动乱。

胡锦涛指出，“重大的挫折是振聋发聩的警钟”，“六.四”和苏东巨变之后，中共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已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并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各领域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也取得不少成果。但是，由于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联系，以及情报等各个方面分头行动，没有统一的战略部署和协调机制，无法形成合力，所以不足以彻底防止“和平演变”的危险，也不足以在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最后取胜。

在《地位和使命》中，胡锦涛为打赢“没有硝烟的战争”，改变历史性的被动局面，提出一个战略原则。他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必须以进攻对进攻，以“和平演变”对“和平演变”，以没有硝烟的战争对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共才可能一举变被动为主动；只有在统一的战略意图之下，协调经济、外交、文化、宣传、情报、军事各方面的行动，主动出击，向资本主义世界全面渗透，才能彻底改变国际政治的格局。

胡锦涛确信，进攻的战略原则与“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即“和平崛起”就意味着中共和共产主义的战略反击。同时，胡锦涛还确定，“超限战”的理论是实现“和平崛起”战略意图，实现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战略目标的重要理论指导之一。他称“超限战”理论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关心和指导下形成的，是我党我军战略智

慧的集体结晶，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政治谋略的继承和发展。这个理论适应实现我党二十一世纪历史使命的需要”。

“超限战”理论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为推动“中共崛起必然与美国战略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理念转变为国策，王震专门组织一个军事理论研究小组，研究一旦同美国展开全面战争，中共应当采用的战略和战法。王震当时已不担任军职，但是，他以政治局委员和国家副主席之尊，再加上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密切的私人关系，以及他本人在军中的重大影响，使主管中央军委的杨尚昆不得不按照王震的意愿，把上述研究小组列编为总参谋部序列，后又转至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门。就是这个研究小组的长期研究，逐步形成了中共“超限战”理论。胡锦涛于一九九二年升任政治局常委之后，最初虽无权直接过问军队问题，可是由于同王震之间很好的私人关系，便已经知道关于“超限战”的研究。一九九九年，得到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任命后，胡锦涛便经常过问并极其关注“超限战”研究。这或许是因为“超限战”理论蕴涵的战略战术阴谋素质，与胡锦涛的诡诈人格有相通之处。

时至今日，基本成形的“超限战”理论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即战争概念，战法概念，以及对各主要潜在敌国的超限战预案。

“超限战”的战争概念不再受军事范畴和传统战场的限制；国家或者国家阵营之间的战争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全面竞争与对抗；战场包括现实空间、网络虚拟空间、人的心理意识空间，以及外层空间；战争的目的是强迫战争对象接受战胜者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超限战”理论断言，资本主义阵营几十年前就对社会主义国家发起了超限战，苏联就是败于超限战。

“超限战”理论的法战概念最直截了当地体现出所谓“超限战”的涵义，即作战方式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其中包括国际法，也不受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性、人道主义的限制；确立战法的唯一标准，在于有效摧毁敌国的国家意志和人民的作战意志。战胜，是战争的唯一目的，是战法的唯一价值。“超限战”理论强调，弱国对强国的制胜之道，在于采取不对称战法，发展可一击制敌于绝地的战法和相关武器，而不是同强国进行全面的军事能力竞争；弱国为摧毁强国的国家作战意志，要优先选择对影响重大的民生设施实施毁灭性打击，而不是首先打击军事设施，因为，民生设施的毁灭会直接摧毁人民的作战意志。

中共“超限战”理论的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对于和各主要潜在敌国处于全面军事对抗态势下的超限战预案”；已经被列为潜在敌国的国家有印度、美国、日本。“超限战”理论对这三个国家的战法预案之凶残诡谲、无所不用其极，读起来令铁石之人都会惊心动魄。当容在本书其它相关章节，再做具体介绍。

世人对中共“超限战”的了解，多来源于上世纪末两名中共空军大校撰写的一本题为“超限战”的著作。殊不知那本书乃是中共军方情报部门放出的烟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涌起气功健身热，诸多中共老军头也卷入其中。当时，十余位气功大师和为数不少的中共老军头过从甚密，对中共绝密的“超限战”理论有所了解。中共军方情报部门侦测到这种情况后，深感忧虑，担心“超限战”理论泄密，引起世界的警觉。于是，中共军方才指令前述两位空军大校发表一本著作，故意用花拳绣腿式的语言，

把“超限战”表现为只限于个人研究的华而不实的思想，以掩盖真实的“超限战”理论。有人认为，逃到美国的气功大师张宏宝二零零六年之死，也是中共为免“超限战”理论进一步泄密而实施的极端措施的结果。当然，是否真的如此，还有待证明。

《历史和使命》确立了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扩张的战略目标、“韬光养晦”与“和平崛起”的政治阴谋式的策略原则，以及“超限战”理论指导之下的全球扩张模式。历史将证明，《历史和使命》实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意志起点。千年之前，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孕育出来的神权政治，为征服世界而发起十字军东征，人类的命运因此淹没在血海之中。千年之后，西方极权文化的近代经典，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建立起东方的巴士底狱，即中共暴政。现在，中共满怀成为世界规则建立者的野心，复兴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想”，踏上征服世界之路。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中共的这次全球扩张，实际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一次借尸还魂；中共的“超限战”，实际是现代十字军的西征。当年十字架东征，剑锋指向异教徒；今日中共西征，是以战胜自由民主制度为目的。作为一个哲人，我思考的只是，当血海又一次淹没历史之际，人类凝视浴血的落日时，会得到属于未来的启示吗？

[RSS全文订阅中国禁闻，不翻墙看禁网，SSL全程加密，安全可靠方便](#) | [Email订阅](#)

台湾大国策 二：中共极权扩张的谋略概要

第二章

中共极权扩张的谋略概要

——属于恶魔的理性

一、引言

极权制度下，整个国家的命运成为独裁者展示个人意志的舞台，而民众的意志是国家命运可有可无的注解。当代中国，胡锦涛的双重人格，决定了中国政治的风格。对外，胡锦涛可以展现永远不变的微笑，而且笑得温柔甚至艳丽；内心深处，胡锦涛可以在微笑的同时，作出残酷屠杀藏人或维人的铁血决策。中国的政治风格也是如此——一方面，中共用比演杂耍的小丑更花哨的方式，试图让世界相信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另一方面，在重重极权政治铁幕的遮蔽下，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扩张战略已经进入具体规划和实施阶段。

根据胡锦涛指示，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衔，组成一个国防部、外交部、国家安全部以及中共宣传部、统战部均派员参加的课题组。课题组由令计划任组长，刘云山、梁光烈、李肇星、王兆国等中共要员任顾问，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任秘书长。这个课题组的任务，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精神，起草一份文件，标题叫作《中国二十一世纪全球外交国防战略实施纲要（草案）》。课题组于二零零七年底高效率完成了文件撰写任务。

这份《纲要（草案）》的主要内容是，以美国为战略敌人，中共在全球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布局的具体步骤和策略。文件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积极国防”概念，声称：“胡主席关于以‘和平演变’对‘和平演变’，以进攻对进攻的战略思想，是‘积极国防’理论的基础”。按照该文件的表述，‘积极国防’的涵义在于，用‘韬光养晦’的精神实质为总的策略原则，在‘和平崛起’口号的掩护下，依据‘超限战’的理论，以非军

事手段为主，以强大的军事能力为后盾，在全球范围展开反“和平演变”的进攻。该文件认为，只有采取进攻的态势，才能抵御美国的“和平演变”式的进攻，真正保卫国家安全。

上述《纲要（草案）》虽然标以“草案”，却已经由中共政治局批准实行，从而同“超限战”理论一起，成为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战略的策略指导。标以“草案”，只是为了让这份文件的规定更具灵活性，便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作出修改和调整。

《纲要（草案）》最值得关注的要点有四项：第一，中共全球扩张的具体思路，以及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对中共的极端重要性；第二，中共扩张的具体领域的选择和主要策略手段；第三，中共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培育与运用；第四，中共的所有策略和手段，都始终围绕一个战略中心目标，即削弱美国国家实力，以及美国主导世界局势的能力，以便时机成熟后取而代之。

《纲要（草案）》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犹如一部精密的机器在运行；其为达成目标而无视一切良知与理性的实用主义哲学冷血而凶残，令人不寒而栗。面对这样一份文件，很少有人会相信它源于人类的智慧，当然也不会相信它来自上帝的智慧——它是属于恶魔的理性。

这是一个荒谬的时代：小政客奥巴马以最强大的[自由](#)国家总统的名义，深情脉脉地吹奏全球无核化的浪漫曲，那或许可以感动随时准备用没有必要的尖叫引入注目的小女孩，却难以感动由贪婪的物欲主导的时代精神；众多绿色人士正为气温的上升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向人类发出末日的警报，他们呼吁人类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澳大利亚和美国牧场上的牛放屁的事件，而且他们还希望所有的人都像和尚一样吃素；好莱坞的导演们则热衷于不厌其烦地制作一部又一部关于外星人的大片，似乎人类内部的全部问题都已得到最终解决，而人类同外星人的关系成为时代的主题。

从奥巴马到绿色人士，再到好莱坞导演，他们的神经兴奋点或许都有某种合理性，但是，如果他们忽视或者没有能力发现，极权铁幕以及遮天蔽日的谎言与假象后面，中共正用恶魔的理性，悄悄推动人类的命运之轮，向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劫难转动，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在表述时代的荒谬。现在，唯一的问题只在于，人类是否还有智慧走出荒谬的时代。

二、中共扩张中的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 ——命运钉入一个铁血强权眼睛中的两根铁钉

《中国二十一世纪全球外交国防战略实施纲要（草案）》首先对世界各地的渗透和控制，作出总体布局性的规划。在对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特点详细论证之后，该《纲要（草案）》提出如下要求：

对东南亚各国实施政治控制为主，军事和经济控制为辅的方针，要强化对缅甸、老挝、柬埔寨的政治控制，并以这三国为基础，逐步实现东南亚的中共政治意志化；在解决台湾和西藏问题之后，必要时可以对越南实施惩戒性军事打击，迫使其改变敌视中国的国家意志。

对非洲的渗透和控制以经济手段为主，以军事援助和武器销售为辅；要充分认识非洲作为部分战略资源的来源地的重要性，条件成熟时，可在非洲设立军事基地。

对南美洲的渗透和控制的主要目标，在于分化南美诸国同美国的传统联系。要同南美国家逐步建立起密切的经济关系，以经济为纽带，影响其国家政治意志；进一步加强同古巴传统的政治同盟关系，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注意运用切·格瓦拉遗留的政治思想遗产，采用慎重稳妥的方法措施，重振共产主义在南美的影响力。

对欧洲和日本的渗透现阶段应当坚持文化交流为主，辅之以经济交流。同时，必须通过外交和国际政治的运作，有效分化美欧和美日的战略盟友关系。在分化欧美关系时，注意运用法国传统的反美心理，以及德国的因二次大战而极端仇视美国的新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在分化日美关系时，既要注意运用日本人心底里因遭受核轰炸而产生的对美国的仇恨，又要注意运用日本人试图摆脱美国控制的民族自尊心，适时向日本提出建立以中日为核心的东亚经济与安全体系的构想，取代日本与美国的同盟。

对澳大利亚的渗透与控制实施经济与文化并重的方针。要逐步使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矿物出口的最大市场，从而以经济利益促使澳大利亚在中共同美国发生对抗时，保持国际政治意义上的中立。

在朝鲜半岛，要牢牢保持同北韓的“战友”关系，通过经济、军事援助，确保对北韓的政治控制，并通过北韓的核武能力，威慑韩国与日本。

对于中亚诸国，要利用它们担忧再次被俄国兼并的心理，强化其依靠中共维持国际政治平衡的政策，并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使中亚诸国成为中共事实上的卫星国；面对美国和西欧军事力量终将被迫撤出阿富汗的形势，要作好一切准备，获得左右阿富汗的国际政治趋向的能力——控制阿富汗，就控制了中亚的战略制高点。

要全面加强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关系，充分借诸阿拉伯世界普遍而深刻的反美情绪，采用隐蔽而又效果明显的策略手段，不断削弱美国的国家实力。要把同伊朗建立和发展实质上的盟友关系，作为一项外交的主要战略安排来对待。

《纲要（草案）》对中共全球扩张战略的实施规划最后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是中共的当务之急；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共推进二十一世纪国家战略就有后顾之忧。事实上，从胡锦涛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都会不断重复同一个话题，即中美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必须以互相照顾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为条件，而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就是中共的核心国家利益之所在。中共当局不厌其烦地释放此类信息，无非是告诉美国，当中共“解决”台湾和西藏问题时，美国不要干预；如果美国不干预，中共也会在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对美国投桃报李，否则，两国之间必有一战，因为，事关“核心国家利益”，退无可退。

中共为什么把台湾与西藏问题当作“眼中钉”，必欲拔除？根本原因在于，这两个问题构成对中共极权专制的致命政治威胁。凡威胁极权政治生存的问题，当然被中共视为心腹之患。其原因很明显：极端的独裁之权是中共官僚集团政治经济特权的最终依托；失去权力，中共狗官便失去一切，并将由于其滔天的反人类罪行接受末日审判；相反，拥有权力，中共官僚集团便拥有奴役中国，进而操纵人类命运的能量。

台湾问题被中共确定为“核心国家利益”，只是基于[台湾民主](#)化和自由化对中国人的政治示范作用，已形成对中共的一项致命的政治威胁。“[台湾民主](#)了，自由了，中国为什么不能[自由民主](#)？”；“台湾人可以选举总统，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台湾，官员讨好民众；中国，狗官任意欺压百姓。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把这种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这一系列在中国十五亿政治奴隶心底里回荡的问题，正在逐步凝成时代对中共的政治逼问。中共回答这个逼问的方式，便是控制，进而灭绝台湾的民主与自由，并以此告诉中国人：“逆我者必亡，台湾就是榜样；你们永远只能作我的政治奴隶。”

西藏问题之所以引起中共当局的极度重视，在于藏人的反抗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反抗暴政的典范与精神象征。

中共统治六十余年，追求的基本政治目标之一，就是把中国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中共不仅摧残中国文化，而且对各少数民族实行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为此，中共对少数民族实施一次又一次血腥的大屠杀。魔鬼相信屠杀可以摧毁铁铸的意志。

一九六八年，中共对蒙古人实施大迫害。军事管制之下，绝大部分蒙古人被关进临时设置的监狱；兽性的酷刑之下，十余万蒙古文化政治精英摧残殆尽。从此之后，蒙古文化之魂湮灭，蒙古宗教信仰隐入荒草大漠，蒙古人的人格神韵黯然消失。中国境内，蒙古人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已被灭绝。

从建政起直至今日，中共当局对维人的屠杀从没有停止过；维人对暴政的抗争也惨烈而悲壮。不过，二零零九年七月对维人的最近一次大屠杀过后，中共已作出加速向新疆移民的决策。中共相信，大规模移民政策的效应，加上铁血镇压，会自然解决新疆问题。更何况，中共还可以通过指控维人的反抗具有恐怖主义性质，压迫维人争取自由运动的国际活动空间。所以，中共虽然重视新疆问题，但是，却没有从二十一世纪全球战略的角度，将其视为致命的政治威胁。

藏人使中共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遭遇历史性挫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藏人为维护民族尊严与文化精神的生存权，举行全民大起义，反抗中共暴政。起义被中共几十万大军淹没在血泊中；达赖喇嘛尊者率十万藏人，翻越喜马拉雅雪峰，走上流亡之路。五十年如白驹过隙，今日凡到过印度的藏人流亡地的人，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会确认一个事实：藏人已在流亡中重建民族的文化命运；以藏传佛教为中心的藏族文化生机蓬勃，非暴政可以灭绝。

与之同时，西藏境内藏人的反抗也从未停止，藏人的宗教信仰比顽石还要坚硬。中共又难于像在内蒙古和新疆那样，通过大规模移民使原住民少数化、边缘化。因为，西藏地势高亢，藏人则是“高原的选民”——藏人有一颗比低地的人更大，所以更坚强的心；西藏大部分地区对于低地的汉人，只能暂时居住，而无法常期适应，汉人在此生活数年之后，一般必患心脏疾病。这或许是上苍垂爱藏人。

藏人的流亡之路是白骨血泪之路，艰苦卓绝之路，同时也是藏传佛教走向世界之路。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藏传佛教在流亡中迎来从未有过的世界性影响；在心灵腐烂于物欲的时代，人类正在把藏传佛教当作拯救心灵的精神价值之一。

藏人的宗教顽强，藏人与西藏高原的天人合一，人类对藏传佛教命运和藏人心灵苦难的强烈关注，这一切合乎逻辑地使中共暴政恐慌，并将西藏问题当作心腹之患。

《中国二十一世纪全球外交国防战略实施纲要（草案）》明确把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并列为必须限期解决的重大问题。根据该《纲要（草案）》的精神，中共决策机构于二零零八年六月，制定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要在二零一二年之前，用“一国两制”的政治方式，完成控制台湾的战略任务。对此，我在《台湾大劫难》一书中已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纲要（草案）》中具体规定了解决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顺序，即先台湾后西藏；要求在解决台湾问题之后，于二零一六年启动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步骤。根据该《纲要（草案）》所载，中共将一方面迫使印度改变国策，驱逐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社区，另一方面在印度建立中共能够操纵的政府，从而把中共在南亚次大陆的扩张同解决西藏问题这个心腹之患联系在一起，一箭而双雕。该《纲要（草案）》还指明，制定为解决西藏问题而对印作战的方案，应参照中共“超限战”理论的相关部分。如前所述，“超限战”理论第三部分内容：“对于和各主要潜在敌国处于全面军事对抗态势下的超限战预案”；该预案中已经列出的潜在敌国包括美、日、印。

对印度的超限战预案首先对印度的战争能力作出极其轻蔑的评价。该预案称，印度是一个社会组织化程度相当低的国家，且贫富悬殊，人民散漫，因此，战争动员能力很低，作战意志薄弱，作战能力不强；惟近两万人的藏军具有一定战斗力。不过，由于人数不多，不能起到战略作用。

该预案就针对印度的超限战作出下列战略安排：第一，通过军售和军援，以及对高级军官的经济收买，加强同巴基斯坦的政治关系；预案列出至二零一六年可能掌握重权的一百名巴基斯坦军官的名字，要求中共有关部门进行经济收买。第二，加强对尼泊尔毛主义政治力量的全面支持，使其成长壮大，逐步控制尼泊尔的政治局面，确保对印作战启动时，尼泊尔成为中共的盟军。第三，全力支助印度毛主义共产党，使之尽快发展成为一支能执行战役任务的、战力强大的游击队，准备配合中共对印作战。第四，通过经济活动全面渗透印度社会各领域，形成以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公司等经济机构为中心的渗透网络。

该预案关于对印超限战开战后的战法问题，提出下述指导性意见：

（一），在巴基斯坦军队协同下，中共军队之一部将经克什米尔，有可能的话通过巴基斯坦边境，进入印度，前出德里平原，迅速占领德里。

（二），中共军队一部，经尼泊尔，对东线印军合围，并歼灭之。

（三），在中共军队开始上述两项全面进攻作战之前，中共将派出不少于五万人的特种作战小分队，分头经陆路、空中、海上渗入印度，在印共游击队和华为公司建

立的各社会网络的配合下，实施以下作战任务——**A**，突袭印度核武基地，使之丧失核战力；**B**，突袭印军战略性的作战指挥部门，使印军战略上处于无指挥状态；**C**，摧毁水坝、粮库、机场、交通枢纽、电力设施、公共交通系统、通讯系统等具有战略价值的民用目标，以造成民众普遍恐慌；**D**，对于印度政界军界的强硬派人物实施突袭，并消灭之。

（四），在军事作战任务基本完成后，应迫使印度政府签订停战书，并声明驱逐西藏流亡政府。同时，迅速在阿鲁纳恰尔邦、阿萨姆邦、不丹和锡金，成立印共执政的东印度政府，让印度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中，处于分裂状态。

（五），在作战的全过程中，要注重对西藏流亡政府和其它重要藏独组织以及重要人物的打击，力争彻底摧毁藏独的政治和人员基础，一劳永逸解决西藏问题。

二零零一年，凝视电视屏幕上双子星楼的废墟，我难于相信，这个必须由清晰的理性逻辑导演的恐怖主义悲剧，是人的智慧的结果。当时，从废墟间涌向苍穹的滚滚黑烟似乎在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仇恨主导的世界。近年来，当我从多种途径获得互相验证的中共“超限战”理论信息时，我相信那种理论只能来自魔鬼的理性，而中共对极端权力的贪欲将在全球扩张中演化成人类大劫难。现在，人类已经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危险，因为，属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千年仇恨毕竟裸露在阳光下。但是，对于中共极权的嗜血贪欲的危险，却甚少有人认知，因为，那种征服全球才能得满足的贪欲，是深藏在重重伪善的语言和政治骗局之下。似乎连太阳都被欺骗了，难道世纪的黑暗真得无可避免了吗？

三、收买并腐蚀全世界 ——人类正上演道德的悲剧

根据前述胡锦涛撰写的《地位和使命》，以及中共决策层制定的《纲要（草案）》，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外交国防战略第一阶段的任务有两项，一是解决台湾问题，然后在二零一六年以启动对印作战来解决西藏问题；二是为高科技非核武军力全面超越美国奠定基础。第一阶段的时限在二零二零年，即在此之前，除继续坚持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方针，积蓄更大的经济能量之外，中共的全部内政外交活动，都围绕上述两项阶段性战略任务进行。

二零零八年十月，分管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曾应邀到中共中央党校，就中共全球战略问题给省部级以上官员的培训班作专题讲座。徐才厚授课时讲：“... ..这次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再次证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世纪，是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复兴的世纪，已经变成必然的历史趋势。党中央深谋远虑，正确决策，为完成我党二十一世纪的崇高使命，要求首先限期解决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 ..这两个问题关系到我党执政地位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国政治制度的生死存亡，是我们的心腹之患。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推进全球战略时就有后顾之忧。... ..同志们应该认识到，解决这两个问题和我们的全球战略发展也是相一致的。解决了台湾问题，我军就直接面对太平洋。用刘亚洲的话讲，‘我海军战舰的航迹就可以在辽阔的太平洋上耕耘，收获巨大的海洋利益。’更重要的是，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一举解决我军在太平洋上的被动态势，美国的力量将从此在太平洋上被迫后退千里。... ..解决西藏问题，实际就是解决南亚次大陆的问题。军事上击溃印度之后，不仅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消除了西藏问题的威胁，而且也必定使印度国家意志衰退，长期处于失败的阴影中。更何况，我们将帮助印度共产党建立东印度共和国。有的同

志认为应当把阿鲁纳恰尔邦收归中国。这种看法是短视的，缺乏战略眼光。其实，那个地区由印度共产党来管理，本质上就是由我们管理。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把长期居住在那里的印度人全部赶走。建立东印度共和国而不是收回阿鲁纳恰尔邦，一方面可以使印度在分裂中长期处于弱势，另一方面又有利于促使国际社会接受我们击溃印度的国际政治后果，何乐而不为呢？”

此次专题讲座，徐才厚还涉及中共全球战略第一阶段的第二项任务，即为中共在高科技非核武军力上全面超越美国奠定基础。他讲到：“... .. 我们不会同美国进行核军备竞赛。前苏联的国力就是在那种愚蠢的竞赛中被拖垮的。理论研究和事实都证明，超过有效实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核武备，完全没有必要，是劳民伤财之举。我军核武备的原则，一开始就十分明确。我们只保持为有效实施核报复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核力量。这个原则是效费比最佳的原则。聂帅在几十年前就讲过，‘我们可以允许美国用核弹把我国毁灭几十次。我们只满足于保持彻底摧毁美国一次的核能力’。聂帅的这句话，说出了关于核武备的最高真理。现在我们已经拥有可靠顶用的二次核打击能力。... .. 我们确定的战略任务是，为高科技非核武军力全面超越美国奠定基础。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解释。第一，我们为什么不使用‘常规军力’的概念，而使用‘非核武军力’的概念？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研究发展的高科技武器和‘超限战’理论的战法，都超过了传统‘常规军力’的概念所能容纳的范围。第二，所谓‘全面’超越美国，并不是指在每一个武器系统或者军事领域都同美国竞争，而是依据‘超限战’理论，发展不对称战力，从综合战力的角度，即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打赢’，这个作战的最基本要求的角度，全面超越美国... .. 。”

内政外交都要为完成全球战略第一阶段的两项任务服务——这已成中共的国策。前述《纲要（草案）》为实施这一国策规定了策略原则。据此，中共现阶段在全球的渗透主要沿下列方向进行：

（一），全力发展对国际舆论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在最重要问题上左右国际舆论的能力。控制国际舆论要达到两个具体目的。首先，尽可能掩盖中共的两项战略任务，要“有示之以无”，并通过强大而多样化的宣传手段，让国际社会相信中共会由于经济发展而逐步民主化的幻想；其次，中共一旦展开解决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决定性步骤之时，力争国际舆论倾向于中共。

（二），全力发展影响美、日、英、法、德、澳等国拥有政治、军事权力的个人或者集团的能力，使中共的意志能作用于这些主要国家的国家意志和国策制定，以减少中共实现其两项战略任务的国际阻力。该《纲要（草案）》中特别强调，在解决台湾问题过程中，以及在为解决西藏问题而展开对印作战过程中，通过同上述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达成“国家核心利益”的交换，以使其实质上置身事外，乃是最高的策略目标。

（三），全力发展同拥有巨大经济能量的金融集团和其它跨国公司的经济联系，使这些经济动物同中共形成经济利益上的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当中共展开解决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决定性步骤时，要让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紧密而广泛的经济关系，发挥有利于中共的国际政治作用。

中共在上述三个领域内的渗透活动其实早已分头展开。现在只是通过《纲要（草

案)》，为分头实施的渗透活动提供了统一的协调机制和共同的具体目标。这标志着中共的全球扩张进入一个计划周密、目标明确、有机协调的新的历史时期。

为迅速强化上述三个领域内全球渗透的能量，《纲要（草案）》提出一个简明而有效的方法，即要求同所有的“渗透对象”——中共的政治术语中称为“工作对象”，根据具体的不同情况，建立各种实际而密切的利益关系。如果用更直接的语言表述，那就是中共要用金钱、美色或者其它利益，收买腐蚀全世界。令计划对此解释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这是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也是我们推行全球外交国防战略必须遵循的理论指导。经验表明，只要切实同‘工作对象’建立起密切的利益关系，那么，这种利益关系就构成他的社会存在，就会决定他的社会意识。”

一个时期以来，中共以上述利益哲理为策略原则，推行全球渗透战略，可以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凯歌入云。历史命运似乎正在论证一个中共信奉的唯物主义的真理：人本质上是物质的存在，而不是精神的存在。

在国际舆论的领域内，中共取得的进展最为明显。“控制了知识界，就控制了舆论。”——这是“六·四”血案发生不久后，邓小平对胡锦涛说的一句话。现在，这句话已经被中共运用于全球扩张战略。为控制国际舆论，中共首先对各主要国家的知识界展开全面渗透，渗透的战果可以略数如下：

近年，中共官僚阶层以及依附权贵的奸商恶贾，把送子女、情人到国外留学当作转移资金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中共贪官数逾两千万，再加上奸商恶贾，中国留学生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而其学费则成为许多国家的大学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在中共有意操作之下，各国大学很快便意识到，想得到中国的留学生，就必须听命于中共。于是，各国许多大学都奏起向中共求爱的政治小夜曲，而几乎所有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均已沦为替中共吟唱赞美诗的学术奴仆。

另外，在中共利用丰厚的科研经费、学术著作出版经费、提供学术资料，甚至美色的诱惑之下，各国智库或者研究机构的众多“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高级研究员”，纷纷争先恐后为中共欺骗世界的宣传作“学术”注解。他们正在把古先哲“知识就是美德”的箴言，改写为“知识就是无耻”。其中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外交政策专家李成可谓无耻者的一个典型。他关于中国还不具备实现民主的条件，以及中共终将自动走向民主的“理论”，是在中国的自由事业最艰难的时刻所表现出的中共思想“线人”的无耻。

控制世界各国的媒体，是中共控制国际舆论的重要安排之一。经过多年努力，以控制股权、操纵广告费、收买主要编辑与记者等各种方式，全球绝大部分华文华语媒体都已经沦为中共的喉舌。同时，对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等西方主流媒体的渗透也令人惊心动魄。这些媒体对中共的批评越来越温柔，对中共小骂大帮忙式的报道日益增多。这种现象性的变化后面，中共利益收买的阴谋鬼影幢幢。二零零八年德国之声中文部负责人之一，张丹红，公然为中共摧残[人权](#)的行为张目，是中共渗透严重程度的指标性事件。

二零零四年，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常委胡锦涛主持，中共在全球推行“孔子学院”计划。时至今日，中共已在近九十个国家，建立起近三百所孔子学院，遍布五大

洲。“砸碎孔家店”，彻底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共产党文化——这是中共建党的文化原则之一。中共统治中国的六十年，也是中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文化殖民地的过程。中共毁灭中国文化精神之后，又利用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以“孔子学院”之名，推行中共党文化的全球渗透扩张战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收买众多亲中共的外国人，作职员或者教师；在东欧，原来共产政权养活的只懂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知识分子，在共产政权崩溃之后合乎逻辑地变成知识垃圾，现在，中共把这些知识垃圾收纳入“孔子学院”，为中共二十一世纪领导共产主义运动复兴，预作人才准备。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曾作出如下评价：“胡锦涛主持的‘孔子学院’计划，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战略。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和平演变’，反击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和平演变’。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对于我们影响和改变所在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中共海外的文化渗透，在宗教领域也取得重大战果。二零零九年末，中共统战部向政治局提交的一份相关报告中称，美国境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华人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均由中共官办的“三自”教会实际控制；台湾的佛教和道教的著名人士，百分之九十以上，同中共官办的佛教协会和道教协会，建立起密切联系。

在全球进行全面文化渗透扩张的同时，中共也从来没有放松对世界各国政客和大资产者——这两个拥有最大社会能量的群体的收买工作。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二零零零年，中共决策层就指令相关部门列出两份名单，一份是三十个重要国家的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的名单，其中既有政府官员，也有议会议员，还包括重要的退休政客；另一份是全球五百名资产最大的经济单位。这两份名单每年修订一次，作为外交、国安和军队情报部门利诱收买的参考对象。

中共对上述两个群体的利诱，意在尽可能影响或者控制相关国家的政治权力意志和经济能量的意志。由于相关活动的极端隐秘性，人们只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前澳大利亚总理被重金延揽为有中共军方背景的某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及奥巴马访华的随行官员竟然拜谒中共暴君[毛泽东](#)的尸体，以向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挑战，可算中共利诱成功的例子；中共女商人收买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曝光案，则是中共利诱战略的失败案例。但是，无论成功或者失败，能为世人察觉的案例只可能是九牛一毛，就如同印度小客栈里游客能捉住的臭虫，必是极少数。

对于中共极权的行为作定量分析，往往不如作定性分析准确。这不仅是因为极权的行为常在铁幕之后运作，更是由于中共以制造虚假的数据作为保持生存的基本方式之一，所以，根据中共当局的数字作出定量分析，恰是对定量分析的侮辱。尽管我们缺乏定量分析的数据，不过从大量现象中，我们还是能对中共利诱战略的规模和成果作出定性分析。

君不见，中共持续不断封锁网络，审判言论，关押思想犯，并一次又一次把藏人、维人维护文化生存权的抗议淹没在血泊中，而各国的政客声称中共的人权状况和社会自由度比以前有改善的大有人在；中共毁灭自然环境、冷血剥削数亿中国奴工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显出可能造成人类灾难的端倪，可是，国际资本却仍然对中国趋之若鹜，并肉麻地把中国称为全球经济危机中的希望之星；中共连续以两位数提高公布的军费，而其实际军费至少比公布军费高两倍，但各国政客称中共正“和平崛起”者不乏其人；中共支持北韩等流氓国家用核武器恐吓世界，暗中援助国际恐怖主义势力，

并扩散核武和导弹技术，各国政客与财阀却称赞中共已经变成“负责任的大国”——全世界都在同中共有关的问题上故意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所有这一切荒谬的现象，足以给我们信心，得出一个定性分析结论：中共利诱各国政客和资本集团成为其代言人的战略在大规模进行中，并成果卓著。

中共成功地收买了全世界，国际舆论则完全违背事实，把中共，这个犯下重重反人类罪行的人类大劫难之源，描述为一个具有理性的政治存在。依照“超限战”理论，中共运用非军事方式展开的全球扩张已经如火如荼，人类却在演出一幕时代性的道德悲剧——只为从一个铁血强权那里得到物欲和私利的满足，人类便背叛了真实。那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没什么两样。

四、恐怖主义的策源地 ——不仅仅是试图用恐惧威吓世界

运用大规模毁损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的方式，造成普遍的社会恐惧，以实现个人或者集团的政治意志——这是我对当代恐怖主义所作的定义。当然，这个定义只适用于狭义的恐怖主义，或者说美国人眼界中的恐怖主义。

在美国人看来，当代恐怖主义是一种主要针对美国的仇恨的结果，而仇恨源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尽管主要针对美国，但是，这种宗教恐怖主义毫无疑问应该受到人类的共同谴责。这不仅是由于古老的宗教仇恨早应当随过去千年的时间一起腐朽，更是由于当代宗教性恐怖主义的风格——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包括无辜的妇女与儿童进行阴谋式的袭击，无法被有尊严感的人接受。因为，那种风格中蕴涵着无赖汉式的对生命的蔑视和流氓式的凶残。

辨别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是非，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道德难题。然而，恐怖主义似乎让中国人发生了是非认知的障碍。二零零一年，双子星楼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普遍处于幸灾乐祸的亢奋之中，而且用种种方式尽情宣泄其亢奋。数千美国无辜者的死亡竟给至少数亿中国人带来血腥浓烈的欢悦——怎样深刻的仇恨才能使人因无辜者的死亡而无耻地欢悦？历史应当怎样解读这种人性肮脏的堕落？

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对于当代中国人这个真实地位的认知，是正确解读上述现象的前提。政治奴隶有两个基本心理特征。其一，在暴政的恐怖统治下形成的奴性人格，决定政治奴隶丧失反抗暴政的心理冲动，对于暴政下的非正义的，甚至罪恶的现实怯懦地视而不见。其二，在长期沉重地精神压抑之下，产生强烈的情绪宣泄的心理冲动，但是，只有意识到暴政允许其宣泄时，政治奴隶才敢于让那种心理冲动炽烈地表现出来。

中国人未必知道中共早已确立了中共的崛起“必然同美国的战略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观念，但却能直觉到中共对美国的仇恨，所以，他们相信借恐怖主义灾难宣泄对美国的仇恨，不仅不会受到中共暴政的迫害，反而会讨得暴政的欢心。于是，暴政前怯懦如鼠的政治奴隶们一时之间势如疯虎，张牙舞爪，尽情享受情绪宣泄的快感。

对上述现象作出解读是为说明下列两个问题：第一，对于中共全面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判断，中国十余亿政治奴隶的直觉，比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更准确

无误；第二，在中国，中共已经为其全面支持恐怖主义的政策，制造出属于政治奴隶的病态而肮脏的人性基础。

据曾庆红的家族成员透露，早在“六.四”血案之后，邓小平就训导[江泽民](#)、李鹏等人说：“... ..要稳住阵脚，美国、欧洲制裁我们，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国际空间广阔的很。别的不说，美国越制裁我们，我们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就越紧密。... ..要用聪明的办法，利用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削弱美国，使美国陷于被动，让美国自顾不暇... ..”。邓小平的这个策略原则，不久就经王震指示，演化成“超限战”理论的一个战术领域，即全面支持并充分运用阿拉伯恐怖主义，削弱美国国力。而这个理论也成为中共实际执行的一项国策。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共军方便通过阿拉伯国家的一批关键性政治人物作代理人，同宗教恐怖主义组织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通道，并为其提供资金、武器和尖端通讯设备。中共提供的武器和设备都标上俄文等外文字母，以混淆视听。

二零零三年美国开始对伊拉克的反恐战争之后，中共即在河西走廊地区设立了数个秘密训练基地，培训恐怖主义游击队员。这些训练有素的游击队员返回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后，成为对抗美军和以色列军队的重要力量，多年来使美军在人员和军费两方面都遭受重大损失。

另据尚未得到确凿验证只具相对可靠性的信息，中共曾至少两次把本·拉登接入中国境内疗养，为其治疗肾病，并提供紧急时刻的隐蔽处所。二零零九年七月新疆维人抗议事件之后，到新疆执行任务的国安局十局一位副局长，在同接待他的当地国安局人员酒后闲谈时说：“美国要想逮住本·拉登，还要先问一问我们同意不同意。”

中共“超限战”理论对运用恐怖主义制定了两种方略。第一，要为保证阿拉伯恐怖主义力量作为一个强大的国际政治要素的存在，提供足够的政治、资金、武器和其它作战设备等诸多方面援助；要使其具备在全球范围内打击美国国家利益的能力。第二，在关系到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战略的最关键事件和最关键时期，特别是出现同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危险时，中共将派出精干的秘密力量，以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名义和恐怖主义的方式，对瓦解美国国家意志有重大意义的战略目标，例如核电站、大型水库、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和自来水系统、通讯枢纽、民用机场、粮食和食品仓库、大城市的大型市场和标志性建筑等，实施有效摧毁。

《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在高层秘密传达后的两个月，即二零零八年八月，为应对二零一二年中共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时美国进行全面军事干预，中共军方制定了实施上述运用恐怖主义的第二项方略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中共开始组建一支秘密部队；这支秘密部队成员将分头在二零一二年之前以各种合法身份进入美国，如果出现同美国全面开战的局面，这支秘密部队就冒用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的名义，对美国境内的民用战略目标实施恐怖主义打击，以迅速摧毁美国人民的作战意志。

该计划规定，这支秘密部队的指挥、组织和训练原则是：“统一指挥，垂直领导，分头培训，互不统属，目标定点，专属训练。”依据上述原则，这只秘密部队共分成两百个小队，每个小队五人；部队直属中央军委垂直领导指挥，各小队之间不得发生任何联系，且人员之间互不认识；这只部队的两百个小队分别由中共各军兵种和各大军

区以及武警部队的两百个特种兵单位进行训练；每个小队都以美国的一个特定具体战略目标作对象，制定袭击方案，进行针对性训练。这只秘密部队虽只一千人，却属军级设置；所有成员都是军官，军衔最低为中尉。

综上所述，运用伊斯兰原教旨势力的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扩张的具体国策之一。不过，我们作出中共是恐怖主义的策源地的判断，却是基于另外的重要理由。美国已经对宗教性国际恐怖主义宣战，并将其视为最严重的安全威胁，然而，构成对人类命运致命威胁的，并非宗教性恐怖主义，而是以中共铁血强权为政治根源的国家恐怖主义。

历史证明，共产主义运动一旦获得国家权力的政治形式，就迅速转变为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治存在；国家恐怖主义对内表现为政治“专政”，即实施人类历史上最冷酷的警察统治和最严密的特务统治；大规模屠杀、逮捕、监禁、流放、思想整肃和政治迫害，则是国家恐怖主义的特征表述。

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对外扩张必定表现为战争和大规模屠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假北韩之名进行的军事扩张引发韩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共假红色高棉推行的共产主义政治扩张，构成近三分之一柬埔寨人被屠杀的原因。现在，当漫步于吴哥窟废墟间的外国游人同柬埔寨人对视时，从他们——无论男女老幼的眼睛里，都能看到同一种荒凉的悲愁。时至今日，中共为掩盖其作为国家恐怖之源应当承担的反人类重罪，仍然用强权与利诱对阻止红色高棉大屠杀的审判。然而，没有公正的审判，就没有正义的重建；被共产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屠杀的百万柬埔寨人就无法安息。一个受到百万冤魂诅咒的民族的眼睛，又怎能不荒凉而悲愁。需要问的是，人类凝注当代柬埔寨人荒凉而悲愁的眼睛时，是否还会有同情的良知和警觉的智慧？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六.四”血案的发生，使中共处于历史性被动之中，在一个时期内中共被迫停止了国家恐怖主义的扩张。现在，在全球性的绥靖主义纵容之下，中共又一次积聚起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能量，开始实施全球扩张战略。虽然按照“超限战”理论，战争的概念超越单纯的军事范畴，中共此次全球扩张主要采用经济、文化、政治的方式，但是，扩张的国家恐怖主义性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之所以作出这个论断，并不只是因为中共把全力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作为国策之一，也不只是由于中共决意在解决西藏问题时对印实施军事打击，以及朱成虎等人奉命对美国作出的核战威胁，更是因为中共把自己的崛起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复兴联系在一起——共产主义和国家权力的结合，便意味着国家恐怖主义；人类正面临国家恐怖主义扩张的大劫难。中共极权铁幕之后正在发生的事实，早已对人类敲响警示之钟；只不过，人类似乎充耳不闻。

前述《地位和使命》一文被认为是中共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秘密宣战书。在该文中，胡锦涛写道：“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与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复兴联系在一起。否则中国的崛起就没有精神支柱，没有精神支柱的崛起既可能失去正确的政治方向，也不会持久。全党同志对此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在该文的另一处，胡锦涛又写道：“当年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党，留给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精神遗产。现在这个精神遗产的国际政治意义再次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来。”

为论证上述观点，胡锦涛在《地位和使命》中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组建和政治活动有重大发展；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统计，“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组织总计达四十多个，遍布印度次大陆、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地区。胡锦涛据此断言，以“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发展为特色之一的全球共产主义复兴，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令计划在一次中央书记处的学习会上，对胡锦涛上述思想的意义作出进一步阐述，他说：“胡锦涛同志对于‘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发展前景和历史地位的论断是十分重要的，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垄断资本主义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从根本上改变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即便能暂时渡过这一次危机，下一次破坏性更大的危机很快又会到来。这说明，历史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大危机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在全球的大发展是必然的历史趋势。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未来在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发生‘毛泽东主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对于这种局势的出现，我党现在就应当有足够的预见，并且作好充分准备... 。”

根据令计划的要求，关于政治、资金、组织、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世界范围内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充分支持的规划，作为特别方案，补充进《二十一世纪外交国防战略实施纲要（草案）》。

美国对宗教性国际恐怖主义宣战，并组织起对付宗教恐怖主义的同盟。与此同时，以中共为策源地的国家恐怖主义已经开始了全球扩张。但是，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扩张的危险性。如果说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是要通过散布恐惧情绪，威胁国际社会，以实现其具体的政治意志，那么，中共的全球扩张的最终目的，是要用国家恐怖主义主导世界的未来。

一位中共高层良知人士听过胡锦涛关于世界未来发展的讲话后，作出这样的评论：“我就像听到从腐烂棺木中传出的魔鬼的独白。”这位良知人士说得没有错，胡锦涛这个不学无术的中共小政客的意识，确实活在时间的废墟中，他就是以早就化为枯骨的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想作他的灵魂。更荒谬的是，这样一个腐朽的意识和灵魂竟成为支配十五亿政治奴隶命运的强权的最高意志。而这个时代的荒谬中所蕴涵的，乃是属于人类的失败；这个时代的荒谬所预言的，乃是又一次人类大劫难。

台湾大国策 三：哲学与人性的悲剧

第三章 人类大劫难是怎样形成的 ——哲学与人性的悲剧 一、引言

历代伟大的智者和宗教家都把贪欲视为万恶之源——无论对于个人或者对于人类，都是如此。返观人类万年历史，每一次命运大劫难背后，都有烧焦人心的贪欲在炽烈燃烧。

智者与宗教家最神圣而艰难的天职，往往在于用道德驯化贪欲，并将贪欲之兽囚禁在精神信仰的铁牢内。他们成功时，人类的命运趋向平静和幸福；他们失败时，历史经历劫难。不过，无论成功和失败，最终都是哲学的和人性的成功或者失败。

庸人的贪欲主要表现为对金钱的无尽热恋，独裁者的贪欲则表述对专制权力的疯狂追求。庸人企图用金钱换取幸福，独裁者却要用专制权力奴役人类，征服世界，取得对人类历史命运的个人所有权。因此，专制权力的意志意味着贪欲之冠，万恶之王。

中共暴政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成熟、最狡诈、最凶残的极权体制，因此，也是人性政治贪欲的最经典的表现。然而，仅有征服全世界的政治贪欲并不能形成现实的人类大劫难，全球扩张还需要政治和经济能量。当前，世界各国政客和伪“中国问题专家”们共同营造的绥靖主义，为中共暴政二十一世纪的扩张战略提供了国际政治的能量；人类的贪欲——主要是属于庸人的对金钱的贪欲，则为中共实现其获得对人类历史命运所有权的政治贪欲，提供巨大的经济能量。人类的贪欲通过怎样的逻辑过程，转化为中共暴政制造人类大劫难的经济能力？这是本章将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

中共暴政形成当代人类大劫难之源的过程，不仅通过贪欲的泛滥表述人性的悲剧，而且通过人类智慧的缺失表述哲学的悲剧。当代人类的智慧在科学理性的领域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狂飙突进，对客体自然逻辑的探索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上都取得了可以令上帝惊叹的成果。但是，在另一个智慧领域，即生命哲学的领域，包括与生命价值相关的一系列概念，例如正义、真理、法的精神、理想主义、道德等等，人类的智慧却如千年木乃伊般干枯衰朽，缺少盎然生机。

发现了繁富的外在客观真理，却又由于失去属于心灵的真理而失去生命的意义——这是当代哲学智慧的悲剧的本质。不相信生命意义的时代只能相信贪欲；照亮心灵真理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人类便在愚昧中用自己的贪欲为自己编织大劫难的命运之网。

在历史的回顾中，这个时代将以贪欲和愚昧而著称：因贪欲蒙蔽了心智而愚昧；愚昧之下，贪欲鼓励罪恶。古贤者有千年明训，“流行坎止”为智者处世之道。但是，我仍愿向一个贪欲和愚昧主导的时代，讲述大劫难形成的人类精神危机背景，讲述中共暴政，这个人类劫难之源的本质。我不敢相信我的讲述能够让人类意识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一次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已经在中共暴政的铁幕与“和平崛起”的谎言遮蔽下进入历史。过去太多的经验告诉我，人往往不能被承载真相的语言说服，而只会在事实的教训中清醒。只不过事实常常冷酷而血腥，教训常常惨烈而无情。尽管如此，我仍然必须讲述，即使只有顽石和狂风愿意倾听。因为，与孤独和真实同在，是哲人与诗者的道德责任。

二、[自由民主](#)国家的危机 ——变革的需要和哲学的贫困

以复兴古希腊文化为灵魂的“文艺复兴运动”，奏响近现代的精神主题曲。这个精神主题曲主要由四个思想乐章构成：古希腊多神信念中涌现的精神多元的理念；古希腊哲学箴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中衍生的人本主义理念；古希腊政治法学中创生的近现代民主法治理念；古希腊崇尚自然理性的文化传统中怒放的近现代科学理性。

精神多元的理念奠定心灵自由原则；人本主义奠定人权至上的原则；民主法治理念奠定社会正义原则。西方文化从上述三项原则中获得了主宰时代精神的道义力量，而科学理性则赋与西方文化征服世界的强悍，甚至野蛮的巨大物性能量。近现代的人类历史，是西方文化挟道义力量和无可阻挡的物性能量凯歌行进的过程，也是东方文化一败再败，溃退万里，濒于灭绝的过程——溃败是因为忽视自然理性的文化传统所造成的科学理性和物性能量的缺失；濒于灭绝则是由于东方文人彻底背弃了文化的祖国。

直至今日，人类历史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执行“文艺复兴”的思想遗嘱。但是，“文艺复兴”创造的精神原则通过人类数百年的实践，已经充分展现出其价值内涵。充分展现者不再有资格和能力表述时代精神主题，就像牡丹怒放之后，便开始枯萎，不配继续表述美。事实上，命运已经通过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向自由民主国家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人本主义是击碎中世纪神本主义和神权政治的精神之剑；没有人本主义，就没有神权的崩溃和人权的崛起。不过，完成历史使命后，经过百年行进，人本主义逐渐步入某种哲学的困境。人乃是心灵与本能同在，善与恶共存的悖论——心灵由于能够理解道德而成为善之源，本能则只能听懂物性贪欲的召唤并以他人为客体，从而表述人性之恶。所以，人的概念不应该受到绝对肯定，人是需要救赎的存在。人本主义以人的本体性全面肯定人的概念；“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箴言没有说明人以本能还是心灵来尺度万物。于是，人本主义的历史性胜利托起人权至上的理念，而构成生命的心灵与本能、道德因素与非道德因素，都以人权名义要求得到法律的尊重和放纵的自由。

对于人，心灵意味着向上的路，所以道德和善是艰难的；本能意味着向下的路，非道德和恶是欲望的诱惑。基于人的本体性，人权理念使心灵和本能具有平等的哲学地位和权利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心灵、道德的败退与本能的胜利就都是不可避免，那就犹如万丈瀑布飞流直下一样势不可挡。

本能的根本生命冲动表现为物性贪欲。在一个本能受到哲学的肯定，并以人权的的名义获得自由放纵的权利的时代，横流的物欲主宰时代精神就是必然的逻辑结果。物欲崇拜则成为引发多重危机的哲学根源。

首先，以物欲满足为生存价值的生活方式，是没彼岸的无边苦海。从这种生活方式中涌现的贪欲决定了当代经济模式的基本价值取向，即疯狂的超前消费和非理性的过渡消费。二零零七年开始的“金融海啸”，不过是命运对人类物性贪欲的一次嘲笑。我预言，如果不根本改变目前的生活价值观和相应的生活方式，经济危机定然会以更令人痛苦的方式和规模，一次又一次降临。因为，欲壑难填；物欲不可满足。更严重的是，为追求物性贪欲的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即地球的自然环境正在受到灾难性的毁坏。有一天当受到致命毁坏的自然环境不得不惩罚人类的贪欲时，恐怕就不会像经济危机那么温柔了。

其次，物欲主导的生命只懂得向物欲索取幸福。然而，幸福感最终只属于心灵的范畴，正所谓“幸福就在我心中”；佛早就告诉人类，幸福与物欲无缘。现代社会满足和扩充物欲的能力空前提高，却不能提高人的幸福指数；古代骑在瘦驴背上追寻美的苦吟诗人，定然比当代坐在“奔驰”、“宝马”车内为权势或者金钱而忧心的政客或者商人更幸福——用古诗人同现在的政客和商人作比较，是由于当代已经很少有真正的诗者了。从物欲中索取幸福，最后只能得到烦恼，其原因在于物欲中没有幸福；物欲不能够把它本来没有的给予人类。如果向物欲索取幸福只是某些个体的行为，还无伤大局；如果这种趋势已经泛化成人类整体的价值追求，精神和社会危机的时代便随之来临。有什么能比人类整体处于幸福感缺失的焦虑中，更接近命运的危机？

再次，金钱是物欲的社会载体之一；放纵物欲的时代必然放纵金钱。基于中世纪神权专制的教训，近现代法的精神极其严格地限制和监督制约国家权力，以防止国家权力由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异化为公民自由权利的伤害者。但是，法律对于金钱转化为实际的政治社会特权的警觉性却远远不够。已经有足够多的社会现象表明，财富的政治和社会特权化，不仅十分严重地侵蚀著“法律权利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且相当程度上伤害了社会正义的基础。然而，在热恋物欲的时代，要求加强对金钱转化为政治社会特权的法律限制，如同改变一个历史命运一样艰难。

比上述各项现象更深刻的危机，或许在于人格物欲化而引发的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心灵和本能共同构成生命。人因心灵而成为追求道德的动物，道德的最高价值要求在于利他主义；心灵的生命原则是“高贵的存在”，否则宁肯不存在。本能不懂道德，本能的價值追求只表现为个体物性存在；本能遵行的生命原则是“个体存在即真理”。当心灵成为生命的主宰，高贵的道德存在就成为命运的主题；当本能主导生命，命运就演绎非道德的物性贪欲的主题。

人是历史和文明的焦点；人格状态构成判断社会危机是否来临的首要标识。当代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格特征早已预言精神的危机。这个特征就在于人格的本能化——物欲化与本能化是一回事，因为，物欲意味着本能的生命欲望形式。

人格的普遍本能化不仅使社会道德观念逐渐淡化，理想主义迅速湮灭，而且由于本能遵行的“个体存在即真理”的原则，会让自私意识恶性膨胀，使社会丧失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人的生命具有个体性，但是，个体的人又只能生活在社会中。对于任何一个群体组成的社会，共和精神，利他的道德精神，都是宝贵的价值原则，而恶性扩张的自私和个体贪欲，则构成社会动荡和社会责任感缺失的人格原因。

否定人的个体性，只强调人的整体性，是极权主义的特征；否定人需要共和精神，只强调人的个体性的绝对真理性，是自由主义的异化。所以，当前是一个东方需要自由来拯救，而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时代。用道德精神和理想主义从物欲主义中拯救西方的自由，同以自由的名义从中共极权暴政之下拯救东方相比，其紧迫性毫无二致。因为，中共极权已经启动全球扩张的战略。面对铁血强权精明设计的“超限战”理论的实践，社会责任感的普遍缺失，对于自由民主国家是致命的弱点，它意味着当与铁血强权决战的关键时刻来临时，自由民主国家难于形成坚硬的国家意志，应对命运

的残酷挑战。对此，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应邀在国防大学举办讲座时曾有评论：“美国现在是一个被物质享乐主义打败的国家；美国人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是美国的致命伤。对付像伊拉克、阿富汗这些小国，美国是以巨象搏犬，它的国家意志没有受到真正的挑战和考验。我判断，当我军为解决台湾和西藏问题开始台海和对印作战时，美国可能会做出一些军事上的花架子，但绝不敢全面介入。我不相信一个国民绝大部分都沉溺在物欲享乐中的国家，有勇气为远在万里之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同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决战。”

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一直是自由民主国家社会正义的基石。法律的合理性又应当以一般人都能理解的常识性为前提；法律超越常识性，到了一般人难于理解的程度，法律的合理性就已经受到质疑。因为，不应当用国家强制力迫使人们遵守自己理解有困难的规则。但是，由于人格的普遍本能化，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用以自律的共和精神、道德理念和社会责任感日益萎缩，法律不得不通过繁琐化，来扩展其规范的领域，才能保障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而法律的繁琐和庞杂化，使法律变成一门远远超越常识的专业知识；作为这门专业知识生命承载者的律师和法官群体，就实际成为凌驾于普通公民之上的社会正义的代言人。正义的解释权一旦沦为某个专业阶层的特权，社会就开始以“正义”的名义趋向非正义的过程——这正是自由民主国家面临的社会法律危机之一。

自由民主国家的危机意味着，“文艺复兴”蕴涵的精神能量已消耗殆尽，人类必须寻找新的精神动力。我们讨论危机并非表述绝望，而是论证变革的需要。社会危机必定归结为生命哲学的危机；生命哲学的危机是一切危机之根。因此，解决社会危机应当以解决生命哲学的危机为前提。然而，当前自由民主国家真正的危机正在于哲学的贫困。

物性贪欲成为时代精神之王，成为幸福的象征，哲学便从高贵的生命意义的创造者，沦落为物欲合理性的辩护士。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的种种所谓哲学理论，绝大部分都穿上物性实用主义的短裤，为人格的本能化作思想的广告。从理想主义的角度，从时代变革的角度审视，当代哲学比充斥新德里大街小巷的乞丐还要贫困。

战胜危机必须变革，变革又需要丰饶的生命哲学作精神前导；而哲学贫困的现状正在否定变革的可能——或许这才是自由民主国家的真正危机之所在。

当人们说正义必胜，邪恶必败，那在相当程度上只是理想主义的誓言。事实则告诉历史，邪恶战胜正义的案例常常发生。当代，处于危机之中而又缺乏变革的精神动力的自由民主国家，是否能够阻止中共铁血强权的全球扩张，已经成为时代的疑问。尽管世界上的政客们几乎都试图回避甚至否定这个疑问。但是，这个问题就像溅在眼睛上的一滴血，让我无法视而不见。我预言，人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方式，将决定未来百年之内，人类成为极权的政治奴隶，还是自由人。

三、中共暴政的本质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极端变异

亨廷顿断言，二十一世纪的时代主题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但是，这个断言属于谎言。我不知道亨廷顿是有意向历史撒谎，还是无意之中使学术沦为欺骗人类的骗

子；不过我知道，沉溺于亨廷顿的学术谎言中，人们就无法真正清醒地理解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问题——中共暴政为什么会成为威胁台湾乃至人类自由的大劫难之源。

走出亨廷顿谎言的阴影并不困难：只需要直视一个明确的事实，即从“文艺复兴”至当代的全部历史，都在西方文化以盛装舞步踏出的凯旋之路上进行，这条路同时也是东方文化一溃万里的失败之路；当代人类命运的主宰者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则是还没有复活的鬼魂，因此不可能与西方文化对抗。唯有从西方文化自我冲突，自我矛盾的角度审视二十一世纪，才可能对人类面临的大劫难有清醒而深刻的理解。

古希腊智慧和古犹太智慧构成西方文化的两个源头。

古希腊智慧是哲学的，世俗的。她所孕育的多神观念是千年之后精神多元化的自由观的种子；她所创造的民主、人本和法治的理念，直至今日还在表述社会正义的基本原则。

古犹太智慧是宗教的，心灵的。难以计数的信徒从属于古犹太智慧的宗教情怀中得到精神的终极安慰——这是古犹太智慧的不朽荣耀。然而，古犹太智慧中涌现的绝对一神论，则构成西方极权文化的源流。

金钱和财富是贪欲的经典对象，但却不足以表述贪欲的极致性追求。贪欲的最高理想在于对人的控制，所以，专制权力比金钱更具诱惑力；心灵控制是控制人的最高形式，所以，控制全人类的心灵恰又成为贪欲的极致表现。一神论，以及与之相应的唯一绝对真理观，是从古犹太智慧中渗出的第一滴极权文化的黑血，是贪欲的神圣信仰形式。唯一的神以人类创造者的名义，获得主宰人类心灵的权威，神的意志则由此成为否定人的心灵自由和精神多样化的唯一绝对真理——极权文化的终极追求不仅在于用专制政治的铁链束缚人的社会自由，更在于用心灵控制来囚禁人的精神自由。唯一之神孕育者，古犹太智慧，乃是万年历史中最成功的财富聚积者。精明的商人只懂把金钱视为财富，可是，古犹太智慧却把人的心灵，这财富的智慧之源，视为她的财富。

西方文明的清晨属于古希腊智慧，古罗马文明则是对古希腊智慧的阐释。或许由于古希腊智慧太世俗化，难以满足人对终极安慰的追求，再加上罗马皇权的腐败与凶残，人类开始呼唤心灵。而心灵的呼唤表现为从古犹太智慧中走出的基督教。两千余年之前的时间早已同枯骨一起腐朽，而当时一位传道者耶稣同罗马帝国黄金的权杖之间的冲突，却成为不朽的历史记忆。最终耶稣头戴荆棘之冠，被充满仇恨的强权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意味着献祭和救赎：以传道者的苦难命运作祭品，献给神圣的信仰；以惨烈的殉道文化，救赎人类沉迷的心灵——那献祭与救赎之中，正凝结著对人类的丰饶之爱。十字架上的耶稣，乃是古犹太智慧最辉煌的篇章。

源自心灵的信仰是坚硬的，至少比强权坚硬。基督教最初的命运对此作出了证明。罗马皇权试图用血海淹没基督的信仰，但是，在十字架前，动荡的血海退潮了。当罗马皇帝最终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时，历史便确认信仰的荆棘之冠，比强权的金冠更加灿烂。

国教的荣耀意味着，属于古犹太智慧的一神论和相应的真理一元论得到了强权的加持。而神权政治的日出却预言著历史的千年暗夜，并拉开精神信仰千年悲剧的序幕。

神权政治是权力与绝对真理的同盟。这个盟约使权力疯狂，使真理腐败——权力受到绝对真理的加冕，就获得了在神圣的理由下尽情发泄兽性的权威；真理不是靠精神魅力，而是由铁血强权支撑，就立刻从心灵的启示，堕落为思想的摧残者和精神枷锁。

基督教，这个曾经被强权摧残的信仰派别，却由于一神论信仰的强权化而走上思想屠夫的命运之路。宗教裁判所对于思想的审判，将精神控制推向极致；在火刑柱上燃烧的异教徒的身体，熔铸出用权力囚禁心灵的铁牢；极端的精神不宽容，使基督教信仰成为战争之源，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异教徒和实现整个人类的基督教信仰化——为实现精神专制而进行的战争，常比为争夺女人和财富进行的战争更残酷，并充满血腥的激情。

对权力的贪欲中，基督的大爱异化为对精神自由的千年仇恨；心灵的救赎者异化为心灵的暴君。思想随自由一起死去，心灵的星光被强权的铁幕遮盖。精神的太阳变成思想专制的绝对真理，苍天 and 大地就隐入无边的黑暗。那铁铸的黑暗上刻写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根本特征：一种专制之所以应当被称为极权主义，本质上并不取决于其权力结构样式，而是取决于权力的终极目的——当铁血强权试图侵入并控制心灵，这个人的自由的最后领地，并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要求征服整个人类时，就意味着它在表述极权主义的意志。

中世纪的千年黑暗属于古犹太智慧，而古希腊智慧则似乎已经湮灭——法治和民主的学说、自然理性至上的理念、“人为万物尺度”的人本主义意识，这类曾经照亮人类命运夜空的精神星座，都在唯一绝对真理性的上帝那璀璨的光辉中黯然失色，人类由于上帝的神圣而忘却了自由。

但是，背叛自由的时代必定会崩溃，因为，它同人心底里对自由的渴望相悖。就在中世纪黑暗最深沉的时刻，被埋葬千年的古希腊文化却奇蹟般复活了。有人说复活的鬼是丑陋的，然而，复活的古希腊智慧却繁富壮丽，生机如狂风怒潮——人本主义树上怒放的人权之花，结出宪政法治的正义之果；精神多元的传统中，涌现出多元文化精神表述的[思想自由](#)；古老的自然理性崇拜，精致化为科学理性，物性能量火山爆发般从科学理性中喷薄而出，赋予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现实力量。一个东方文化万花凋残，西方文化主宰时代精神的历史进程，正是由古希腊智慧的复活拉开序幕。

古希腊智慧复活了，古犹太智慧并没有死去。基督教的上帝放弃了神权政治，却依然保留了神圣感和终极心灵安慰的价值。曾经浴血千年的基督教能受到新时代的宽恕，或许是受惠于古希腊智慧中的众神意识，即精神多样化的文化宽容传统。

基督教神权政治失去了历史，但中世纪的极权主义鬼魂却在人的贪欲中找到冬眠的洞穴。它深藏在人性的阴影中，紧张地寻找重新复活的道德理由。人比兽类更凶残，也更虚假。凶残在于，兽类只会为生存而捕杀同类，人类却会为体验征服的快感

而残杀同类；虚假则在于，兽的一切行为都像自然一样真实，人则一定要用神圣的理由骗过守护心灵的道德良知，才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本能的兽性快感。

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鬼魂在数百年之后，终于再次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找到复活的道德躯体——以解放全人类的神圣理由，铸造铁血强权，奴役人类的生命和心灵。

欧洲中心论者将苏联共产帝国的崩溃视为共产主义的墓志铭。但是，他们错了。因为，共产主义建立的东方巴士底狱，中共暴政，仍然在论证极权主义的顽强。只要不带偏见，就不难发现，中世纪基督教神权政治同中共暴政之间，虽然横亘着重重时间的废墟，然而，共同的西方极权文化之魂却又使它们相像得犹如一面铜镜内外的形象。现将中世纪基督教神权政治和中共暴政的共同性历数如下：

（一）它们都自命终极真理的垄断者，并以此要求主宰人类的命运，用铁血强权迫使人类放弃思想自由，只服从一种信仰；不同之处只在于，一个绝对真理称为上帝的意志，另一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它们都设定一个最美好的理想，以诱惑人类，只不过一个在苍天之上，叫作天堂，一个在地平线之内，叫作共产主义社会。

（三）它们都对铁血权力表现出极度贪婪，只不过权力的来源一个被表述为虚设的神圣感，一个被表述为虚设的“人民”的概念。

（四）它们都表现出控制人类的强烈野心，只不过一个把野心扩张的过程称为圣战，一个则称为解放全人类。

（五）它们都通过对思想的审判控制人的精神，用自由人的血海深淵为它们的绝对真理沐浴，只不过审判机构一个叫作宗教裁判所，一个叫作人民法院。

（六）他们都崇拜仇恨，只不过神权政治的仇恨之鞭是抽在异教徒身上，中共暴政仇恨的锋芒则昨日指向“阶级敌人”，今日指向“敌对势力”。

（七）它们都设定“先知”和“圣徒”群体是绝对真理的代表者，只不过一种“先知”是宗教人格，另一种“先知”是中共的领袖；一种“圣徒”群体称为主教或者教士，另一种“圣徒”群体称为共产党员。

（八）它们都在追求神圣真理的名义下，大规模屠戮生命，残害思想异端，为兽性在人间泛滥寻找高尚的理由，只不过高尚的理由一个在于维护上帝的荣耀，一个在于维护中共的“社会主义制度”。

（九）它们都把人类的命运视为宿命的必然，不给人类意志对自己命运的自由选择和创造留下任何空间，只不过宿命一个源于造物主的意志，一个源于物性崇拜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

（十）它们都以一种绝对真理、一种绝对排他性的信仰，与铁血强权结成政治同盟作为根本的政治特质，只不过这种政治盟约一个在教皇的王冠与权杖上闪耀，一个书写在中共宪法的序言中。

历数至此，白痴也会看清，从理论风格到政治特征，从运作模式到思维方法，基督教神权政治与中共暴政都同两个骷髅一样相像。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中共暴政的政治基因来源于中世纪西方极权文化传统吗？

当代冲突的主题是西方文化的自我矛盾与自我否定，即[西方民主](#)、人权、法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极权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中共暴政，这个当代人类大劫难之源，乃是西方极权文化的极端变异；它所表述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狡诈、最伪善、最无耻、最自私、最凶残的极权形式。发生这种变异的哲学原因或许在于唯物主义哲学成为极权专制的生命观。

西方极权主义在中世纪头戴宗教信仰的金冠，在现代则身披源自古希腊智慧的唯物主义战袍。但是，这并不表明极权文化传统有实质性变化，因为，变化的只是时代对正当性的理解。西方极权文化传统有一种不变的狡诈——总是选择最具时代正当性的理论支撑起它的精神权威：中世纪属于神，宗教是最具正当性的概念；工业革命之后，以物性逻辑崇拜为魂的科学理性，则被奉为正当性的最时髦的标识。于是，极权主义传统便背叛了神，而走向唯物主义。

然而，对神的背叛，使极权主义丧失了最后的心灵价值和对道德良知的认知。唯物主义则是对生命的阴暗至极的哲学审视——人活着是一团蠕动的物欲，死去是一块腐烂发臭的物质。正是在这种对生命的阴暗审视中，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呈现为中共暴政，这种极端的变异形式。它的极端性就在于，物性的贪欲和对生命的蔑视，都以铁血强权的名义，达到极致。

由于哲学的贫困，自由民主国家缺乏解决内在危机的精神能量。处此困境，忠实于自由的人们该怎样应对中共暴政的全球扩张？这个问题似乎比地球本身都沉重，而人类却缺乏能承担这个沉重问题的思想巨人。但是，缺憾意味着召唤。

四、谁养肥了中共 ——理性和良知在贪欲前的历史性失败

二十年之前，“六.四”血海冲决了中共的政治道德基础；苏联共产帝国的崩溃，更使中共暴政风雨飘摇。当时，众多“中国问题专家”都把预言中共的垮台的时限，当作一种理论的时尚。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共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聚积起强大的经济能量，甚至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被视为拯救经济的希望之星。那么，这个过程究竟怎样发生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面对极权专制的历史性危局，[邓小平](#)以洞察人性弱点的老政客的精明，为中共暴政走出困境制定出有效的策略原则。这个策略原则其实很简单，一言以蔽之：运用人类物性的贪欲渡过政治危机。[邓小平](#)坚信贪欲比理性和良知更有力量——庸俗而又狡猾的人都有这种堕落的信念。

“六.四”大屠杀是不可饶恕的反人类重罪。对此，邓小平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只是由于苦恋独裁权力而选择了罪恶。正如犯罪心理学所揭示的那样，绝大多数罪犯犯罪后的心理兴奋点在于掩盖罪行，邓小平也是如此。他确定的掩盖罪行的方式，便是让中国人，乃至人类的心灵都在物性贪欲中腐烂——只有忠实于理性和良知的心，才会记住“六.四”之血；物欲主宰的心中，理性和良知早已死去。

中共暴政按照邓小平的策略原则，通过权贵市场经济政策，把中国人诱向疯狂追逐物欲的命运。中共当局特别注重收买知识界和商人，在物欲的诱惑下，中国知识界整体上背叛了真理，中国商人则几乎毫不犹豫地背叛了良知。中国很快就形成腐败的权力、堕落的知识和肮脏的金钱的神圣同盟。权力、知识、金钱，这三个最具社会能量的要素，三足鼎立，共同支撑起中共极权体制的稳定。

在稳定国内的同时，中共暴政从没有停止对国际资本的诱惑。中共“对外开放”国策那一时期的实际内容，就是用迅速暴富的可能诱惑全世界。然而，那是魔鬼的诱惑。

中共暴政的诱惑来自两个方向：一是数亿农民工的奴工般的廉价劳动；一是对中国辽阔国土上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利用。上述两个因素构成二十一世纪除中国外任何地区都不可能有的暴富的条件。

不过，任何人都不难意识到，对农民工血汗劳动的冷酷剥削违背现代人类的良知；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几乎无须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毁灭性开发利用，则不仅违背基本的理性认知，而且会直接严重影响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这种根本违背人的良知和理性的经济模式本应受到人类的谴责和抵制。但是，邓小平不相信人类会那样作；作为一个俗不可耐的唯物主义者，他相信决定人的命运的，最终是物欲，而不是理性和良知。很遗憾，历史证明邓小平对了——人类确实是由物性贪欲主导的动物。

“六.四”屠城后的短时期内，美国和欧洲的自由民主国家还在坚守最初的道义原则，对中共暴政实行经济制裁，台商和台资却如决堤的天河，滚滚涌入大陆——当代理性与良知在贪欲前历史性失败的第一幕，是由台湾商人拉开的。

对于进入大陆的台资究竟有多少出现了不相同的各种数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六.四”之后最初一个阶段，台资在中共当局引进的外资中占有绝大的比例。这部分资金对中共暴政渡过当时严重到危机程度的政治经济困境所起的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一年前，一位台湾朋友谈到中共逼迫台湾的种种恶行时，愤愤不平地指责道：“中共真是忘恩负义之徒。当年如果不是靠台商和台资，它早就完蛋了，又怎能有今天的发展！”注视这位台湾朋友愤怒的眼睛，我只能无语，并怜悯。不过，在心里我愿对他说两句话——“愚人责人，智者过己”；“与其怒泄噬脐之愤，不如筹思亡羊补牢之策。”

美国、欧洲对中共的经济制裁实质上并没有坚持多久，理性与良知在贪欲前显得如此苍白而脆弱。数年之后，国际财团、跨国公司就像被暴富的欲望之绳拴住鼻子的驼队，踏着道德的荒漠，进入中国，而且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就这样，二十多年来，中国向世界输出沙尘暴和廉价商品，世界则向中国输入资本。人类毫不在乎中共经济发展模式对良知的摧残，对理性的践踏，而只把吃过尸体的野狗一样充血的眼睛，死死盯住贪欲的满足。中共成功地用贪欲收买了整个人类，数亿农民工二十余年奴工般的廉价劳动、对中国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破坏，以及巨量的国际资本，这三个要素共同创造了属于中共权贵市场体制的黑色的经济奇迹。中共在真正开始全球扩张之前，首先轻而易举地用贪欲征服了全世界。

然而，泯灭理性和良知的贪欲所得，必遭天谴。现在，中共聚积起全球扩张的巨大经济能量——极权政治拥有的急剧膨胀的经济能量，最终必然以国际扩张作为政治的泄洪道；中共通过“超限战”的概念，已经开始了不宣而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让中共的政治意志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立法者便是战争的目的。面对正在走来的大劫难，人类现在所作的似乎只是茫然地眨动充满贪欲的双眼。难道中共暴政的扩张就意味着命运对人类贪欲的天谴？

不义之财，得之不祥。一部分台商，特别是国民党权贵家族，或许从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中得到了暴发式的财富，但是，台湾所受到的伤害最深刻。这并非指中共正利用通过台资积累的经济能量，压迫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对台湾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的全面统战渗透，也不是指中共决意在二零一二年之前彻底控制台湾，灭绝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在此，我只是说，部分台湾商人的财富得到暴发式的增长，而台湾的经济能力却受到或许难以恢复的损伤。

约三十年前，台湾人依靠出类拔萃的经济运作能力和高瞻远瞩的科技创新能力，依靠充实敦厚的人文精神和艰苦卓绝的拼搏意志，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当时，台湾人的经济竞争力，或者说台湾的经济能力同世界上任何经济体相比都毫不逊色。然而，时至今日，马英九竟然可以毫无自愧之意地宣称，不通过 ECFA 的签订依附于中共权贵市场经济，台湾只能走入经济的绝境死地。台湾的命运为什么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当然，马英九如是宣称，与他阴柔似水，阳刚缺失的个性直接有关——他没有同严酷的命运挑战作勇士之搏的勇气。不过也应当看到，台湾当年冠绝亚洲的经济能力已经枯萎，不复有往昔的勃勃生机。这正是过去二十馀年中巨额台资涌入大陆的后遗症。

在中国获得经济的成功，不需要符合理性及良知的经济运作能力，也不需要科技创新能力，甚至不需要艰苦拼搏的精神，需要的是自我窒息道德良知，用铁石之心，尽可能从农民工奴工般的廉价劳动和对自然环境肆无忌惮的破坏性利用中，榨取暴发式的利润。所谓“用进废退”，长期习惯于在中国的泯灭理性及良知的经济运作，台湾原有的建立在理性和良知基础上的经济竞争能力便日渐萎缩，由于台资数额巨大，台商人数众多，上述情况的出现，就直接削弱了台湾整体的经济竞争能力。短时间内获得巨额财富，却丧失了具有蓬勃生机的公平竞争的经济能力——这里面的利弊得失，不言自明。

如果承认人是人类历史的主体，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巨额投资于大陆对台湾最深刻的伤害在于对台商人格的扭曲。中共以强化极权专制为政治目的的经济改革，必然以权贵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为结果。权贵市场经济之中，腐败的国家权力是主导者，资本是官权的奴仆。要想在权贵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必须用肮脏的金钱取得腐败权力的支持。台湾以外的国际资本，由于能够得到所属国国家主权和法律的保護，在中共腐败的国家权力前或许还可以稍微保持一些独立性和自由意志，台湾资本的人格承载者则没有任何独立性和自由意志可言，因为，中共不承认台湾的主权地位。所以，台商一旦进入大陆，就失去任何法律保护——中共的专制法律和司法系统本质上是中共权贵意志和利益的体现者与保护者，而不会保护台商的利益，中共的腐败权力由此成为台商财富的唯一支配者，除了同中共官员通过钱权交易结成奴主关系外，台商再无其它出路。

中共暴政，无官不贪，无吏不腐，数千万贪官污吏已成人类官僚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观。台商进入大陆，便是进入贪官污吏的蚁群蜂巢。为从贪官污吏手中取得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台商除钱色贿赂之外，还不得不精于阿谀逢迎、媚笑买怜。卑贱与金钱齐飞，堕落与财富共舞，久而久之，人格腐烂之际，台商努力进取的意志消失殆尽，投机取巧之心日炽，从而永远失去往昔创造“四小龙”经济奇迹的能力与荣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如不及早回头，继续让台湾的经济命运同中共权贵市场经济难解难分地扭结在一起，不仅台湾会由于丧失正当的经济竞争力而走入绝境死地，百万台商也将丧失人的尊严和经济前途，成为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一种历史上最腐烂的经济体的殉葬品。——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者，必为魔鬼殉葬。言尽于此，愿百万台商熟思之。

聪慧者不会两次在同一个地方摔倒，愚蠢者却总是从一个错误的泥潭跳入另一个错误的泥潭。不幸，当代人类似乎正在表述愚蠢者的逻辑。

人类的贪欲帮助中共度过了重大的政治危机，并为中共积聚起进行二十一世纪政治、文化、经济甚至军事扩张的经济能量——这个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裸露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但是，世界各国的政客和“中国问题专家”却在喋喋不休地重述种种中共御用文人制造的谎言，诸如“中共正和平崛起”、“中共将在经济发展之后走向民主”、“中共已经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资本主义”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试图通过掩饰人类的贪欲所犯的历史性错误，来自娱自慰。殊不知，他们正在犯另一个后果更严重的错误，即蒙蔽人类的理智，让人类无法认清源自中共暴政扩张的危险。

中共暴政用一种泯灭理性和良知的经济模式绑架了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效应之一，表现为世界不仅无法同中共权贵经济分离，而且相当程度上被这个罪恶的经济体拖向地狱——如果有谁相信一个建立在对数亿奴工冷酷剥削，对自然毁灭开发利用基础上的经济体能够长久存在，并把人类带入天堂，那么他一定站在地狱的边缘了。

世界现在就站在地狱的边缘。因为，人类热衷于相信谎言，以避免正视人类的贪欲孕育出的大劫难。

台湾大国策 四：无可回避的宿命

第四章 中共极权扩张阴影下的台湾 ——无可回避的宿命 一、引言

一位神情坚毅的台湾雕刻艺术家登上花莲的高山，为雕一艘帆船寻找石材。他驻足于峭崖之上，遥望太平洋的万里波涛，对我说：“我的梦里，台湾是一艘巨船；我们拉起风帆，驶向天涯海角，远远离开中国，避开中国的逼迫。”他的声音中有迷茫的海雾弥漫。

一位身姿妖娆、体香胜花的采花女，手捻野花，对我说：“我们一点儿都不恨中国人；我第一爱花，第二就爱李后主的词。... 请你告诉中国人，我们只是想自己过，请他们放过台湾。”采花女的音韵比她的话语更富动人的情致。

一位台湾的政治活动家，坐在竹林中的石桌旁，于茶香萦绕之际，对我说：“中共的领导人也应该有理性。他们应该明白，留下一个[民主](#)独立的台湾，对中国长远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我们台湾独立后会作一个好邻居，我们会把蒋介石带来的中国珍宝全部还给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我们也会支持中国... 。”他的语气理性而冷静。

一位台湾学者在他的客厅里气势如虹地对我说：“美国绝不会让中国占据台湾，那样第一岛链就被中国打破了。所以，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一定会出兵保卫台湾。以中共现在的军力，根本不敢和美军决战。”学者声如洪钟，只是钟声虽然洪亮，却有几分空洞感。

我深深地理解善良的台湾人：他们没有干预中国事务的任何愿望，他们不想挑衅中共，他们甚至会忽视中共暴政对中国人所犯下的重重反人类罪行，会在中共屠杀藏人、维人时保持沉默——他们只希望平静地生活。以上我引述的四位朋友的话，说出当今台湾人对待中共逼迫的典型的四种心态：石雕艺术家试图在诗意之梦回避中共；采花女希望用灿若野花的善意感动中共；政治活动家想用理性的利害权衡来说服中共；学者则指望通过美国干预的预言吓阻中共。

但是，中共既无法回避，也不会被感动、说服和吓阻。这就是本章将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无法回避，因为，中共的意志成为台湾必须直接面对的宿命，乃是上苍的安排；不会被感动，因为，中共暴政不相信善意的微笑或者泪水，而只相信铁与血；不会被说服，因为，中共暴政只遵从它自己所认知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引导，而没有兴趣倾听别人的理性，即便那种理性与真理一致；不会被吓阻，因为，就算美国人自己也很难相信他们会为保卫万里之外的台湾而竭尽所能，更何况台湾的执政党和马英九总统正在实施全面投共的国策——在此情况下，恐怕上帝都不会为台湾而与中共一战，更何况精于利害权衡的美国政客。

四百年来，台湾的命运多次被外来强权所左右。外来强权把其意志凌驾于台湾之上，从来没有征询过台湾人的意愿，因为强权的天性就在于忽视并蔑视弱者，就在于“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现在，中共暴政根据它自己的利益，又要把它意志强加于台湾，它同样不会考虑台湾人的感受与意愿。

我会更具体地说明中共控制并灭绝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原因；我也会说明，中共暴政是台湾无法回避的黑暗的宿命。不过，我说明这一切，并非为劝说台湾在铁血强权前屈膝。因为，我从不与怯懦者对话。

中共不会被感动，被说服，被吓阻，只会被铁铸的意志、充沛的智慧和浴血的搏战击败。对于台湾，现在想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并赢得未来，首先必须放弃一切幻想，清醒而坚定地注视正在逼近的大劫难。唯有真正的勇者才敢于同险恶的命运对视。

二、“统独”之争是中共与国民党权贵共同制造的伪概念 ——台湾的自由处于危险之中

从中共的御用文人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从国共两党的政客到它们控制的媒体，都试图使国际社会和两岸民众相信，当前两岸关系的实质在于“统独”之争。然

而，他们试图让人们相信的，乃是假相。所谓“统独”之争是中共与国民党权贵共同制造的伪概念。

之所以指控“统独”之争是伪概念，根本原因就在于，现在两岸完全就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基础。理由简单而明确：[自由民主](#)制度与极权专制水火不容，不共戴天，而不可能水乳交融，统一于一国之内。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对于中国人是侮辱，对于台湾人则必定是谎言。

“一国两制”意味着十五亿中国人永远只能生活在极权专制之下，永远被剥夺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利和思想、[言论自由](#)权，即永远只能作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永远不能够成为自由人。确认一个族群只配作强权的政治奴隶——难道不是对这个族群的欺人太甚的侮辱吗？无论台湾的政客们，比如国民党权贵，将来是否会接受“一国两制”，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必定从心底里抗拒并坚决反对这种把自己当作政治奴隶的模式。

对于台湾人，“一国两制”必定是骗局。因为，“一国两制”意味着中共极权要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控制台湾。不难预见，在“中央政府”的极权专制控制之下，台湾完全没有可能长久地保持自由民主制度，而台湾人从自由人沦为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当可计日而待。更何况，极权专制根本没有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控制民主台湾的政治道德资格；中共暴政这个反人类罪的政治罪犯，只配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为它的百年罪恶接受正义的审判。依今日之情势，台湾绝对不应当统一于中共暴政；如果台湾丧失了政治独立和主权地位，受控于中共暴政，就意味着台湾丧失了自由和尊严。

既然根本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基础，中共为什么要制造“统独”之争的伪概念？一切伪装都是为了掩盖真像。中共正是要用“统独”之争这种具有强烈民族利益色彩的问题，来掩盖其仇恨并灭绝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真实动机。

我曾多次指出，台湾的自由民主化在十五亿中国人中产生的政治示范效应，已经成为对中共暴政最致命的政治威胁；中共把民主台湾的这种政治示范效应视为心腹之患，必欲灭绝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方能消除其全球扩张的后顾之忧。中共暴政十分清楚，如果它把自己仇恨台湾自由的真实动机公之于众，必将受到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万夫所指，所以，它一定要牢牢地把真实动机隐藏在“统独”之争的民族主义概念之下。

事实上，中共是伪民族主义者。作出这个判断，并不只是由于中共背叛了文化的祖国，通过六十余年的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灭绝中国文化精神，使中国沦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殖民地，使中国人沦为文化的亡国奴，更是因为中共天性上只把获得和保持一党私有的国家权力视为最高原则，在中共的政治词典上，“民族利益”只意味着为获得和保持其专制权力可以随时出卖的婢女。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苏共为把外蒙古变成其卫星国，策划外蒙古从中华民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公开发贺电，祝贺外蒙古人民从此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可是现在，中共的大小狗官却又全都吠声一片，声称“台独就意味着战争”。外蒙古的面积是台湾的近三十倍。为什么在外蒙古独立和台湾独立的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判若两人？这种巨大的反差后面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即对专制权力的贪欲。——当年中共向苏联摧眉折腰，为其把外蒙古从中华民国版图上分离出去而欢呼，是要讨得苏联之欢心，助它攫取统治中国的专制权力；今日中共对台湾怒目相

向，形色狰狞，是要控制并消灭台湾的民主制度，从而灭绝自由的台湾在中国人心中点燃的政治自由的希望之火，以维护极权统治。可见，专制权力是中共最高的原则，而包括“统一或独立”在内的民族主义的议题，则是中共用来作政治表演的道具。

从中共建党之日起，专制权力就成为其不变的生命主题。因为，独裁集团的一切政治经济利益和特权，都依赖于专制权力。拥有专制权力，中共便拥有了把国家当作私产任意挥霍的条件，便拥有了把人民当作奴隶任意欺凌的条件。对于独裁集团，唯有国家成为专制权力的私产，才能满足其贪欲；唯有人民成为政治奴隶，才能满足其践踏人民命运的野心。

不过，当代中共权贵阶层对权力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同过去的中共官僚集团相比，他们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更加强烈。“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暴政推行让中国人在物欲中腐烂以忘却道德良知的国策。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腐烂的是中共官僚集团。中共暴政迅速堕落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最无耻的贪官污吏集团；国家彻底沦落为各级官吏用以攫取财富、欺凌民众的工具。中共暴政又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其腐烂的程度。除了政治黑手党式的权力之外，中共已经一无所有；失去权力，中共官吏不仅将失去政治社会特权，失去其利用腐败权力积聚的财富，而且必将因其反人类罪和贪污掠夺国家社会财富罪，受到审判，甚至政治惩罚——中共暴政的统治不仅积累起如崇山峻岭般的罪恶，也积累起难以消融的社会仇恨。对此，江泽民和胡锦涛均有清醒的认识。

二零零五年，中国政治流亡者组成的民间法庭——“审判中国共产党悉尼特别国际刑事法庭”，在袁红冰大法官主持下作出判决，根据国际法，以反人类的罪名，判处江泽民等人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并兼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从中共新华社“内参”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江泽民极为震怒。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评论说：“不要小看这件事。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有一天我们丧失政权，他们是要对我们反攻倒算的。这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针对我们全党的，他们妄图审判中国共产党。我党假使失去执政地位，就会沦为阶下囚... ..”

二零零六年十月，中共决定整肃陈良宇之后不久，胡锦涛在中共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讲：“... ..党内有些人说中央决定审查陈良宇同志是搞派系斗争。这种说法极不负责，危害极大。陈良宇同志对抗中央指示，拒不执行中央政令，严重损害了中央威信。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很可能影响我党的执政地位。这是中央决定对于陈良宇同志采取组织措施的根本原因，是从我党执政地位的高度来看问题必须做出的决定。... ..今后，对于任何可能对我党执政地位产生消极影响的问题，都要高度重视，当做头等大事来抓。... ..全党同志务必不能忘记苏东巨变的教训。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党的执政地位。... ..敌对势力不断叫嚣有一天要对共产党进行审判。如果我党失去执政地位，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 ..”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讲话，都在表述中共暴政对失去专制权力的深刻恐惧，以及视专制权力为生命的意志。当前，中共制造“统独”之争的假像，就是为了掩盖其对自由台湾的恐惧；中共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为消除台湾自由化对中共执政地位的威胁——不是台湾要威胁中共，而是台湾自由的示范作用自然成为中国自由化的政治启蒙。

自由与极权之争，民主与专制之争——这是当前两岸关系的实质内容。只有撕开假像和谎言，让两岸关系的实质内容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在中共暴政实施控制台湾的政治阴谋过程中，台湾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强有力支持。因为，唯有自由才是属于人类的共同事业。中共暴政用“统独”之争的假像掩盖自由与极权之争的真相，就是为了使两岸关系“民族主义化”，从而剥夺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理由。

保卫自由的过程中得到人类的支持，对于台湾极端重要，甚至相当程度上关乎台湾今后百年的命运。要想让保卫台湾自由之战，成为当代人类为捍卫自由而同极权暴政进行的一次决战，首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让国际社会明白两岸关系的实质之所在。此乃台湾自由的生死存亡之道，有志抗争强权者不可不察。

如果说中共制造“统独”之争的假像是为掩饰其对台湾自由的恐惧和仇恨，那么，国民党权贵趁风扬沙，帮助中共制造“统独”之争的假像，则是为了掩饰其投共卖台的无耻。现今之台湾，根本没有“统一”派，只有“投共派”，只有“等待被中共统一派”。国民党权贵早就丧失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意志。人是意志的存在；丧失信义，人便魂飞魄散，成行尸走肉——人如此，政党也如此。当今之国民党权贵阶层既无统一中国之意志，又无保卫自由民主台湾的愿望与信心；他们丧魂落魄，唯一的生命活力，在于通过投共卖台，尽可能从中共那里得到更多赏赐。

利用台湾给与他们的名誉地位，向中共暴政显示其卖台的能力，冀得中共的赏识，这已成为国民党权贵阶层的时髦之举。天可怜见——中共小狗官陈云林以“天朝上国”使臣之骄横来台时，国民党权贵争先献媚之奴态纷纷，更有连战、宋楚瑜为没有争得宴请中共小狗官之机会，竟撕破老脸，公开在电视上同马英九争风吃醋，真是怎一个丑字了得。

台湾这方水土养育了国民党权贵六十余年，今日被养育者要以出卖台湾根本的政治利益，即出卖台湾的自由与独立，来深刻地伤害养育者。对于中共，丧失专制权力就丧失了一切；对于台湾，丧失了自由与独立就丧失了一切——两千三百万自由的台湾人将由于自由和独立的丧失，沦为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可悲之处在于，国民党权贵只为一己之利益，就要背叛台湾的根本政治利益。可谓无耻之尤。

无耻者常伪善。国民党权贵随中共制造的“统独”之争的节律起舞，想要让历史相信其投共卖台是基于“民族大义”，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从而掩盖其无耻。国民党与中共百年恩怨情仇，又怎能不知中共从创建之初就是一个政治、文化和组织上的外来势力，又怎能不知中共统治六十年就是中国文化精神被彻底摧毁的六十年，又怎能不知中共暴政之下，八千万中国人死于社会灾难、政治迫害和血腥屠杀——怎能不知中共暴政是中国的罪恶与灾难之源，是中国人民的公敌，是背叛文化祖国的卖国贼集团。

国民党权贵投降中共暴政，乃是认贼作父，与中华民族为敌之举；国民党权贵背叛台湾人民，出卖台湾的自由与独立，乃是千古罪人之举。投共不仁，叛台不义；不仁不义，狼心狗行，此乃当今国民党权贵阶层之谓也。

中共谋台，其心毒如蛇蝎，狠如虎豹；国民党权贵卖台，其意阴险莫测，寡廉鲜耻。内外交迫之下，台湾自由已处现实的危险之中。思之念之，令人百虑交集，心急如焚。

三、中共已经全面展开对台湾的“超限战” ——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是台湾自由的保卫者，还是中共的同盟军

中共“超限战”的“新思维”之一，表现为对战争概念的重新定位，即战争不再被视为纯军事性或者军事性为主的领域，相反，一个国家试图迫使其它国家或者政治势力接受自己的政治意志，以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而实施的非军事的和军事的行为，都归于战争的范畴。

根据“超限战”理论，中共早已在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各领域，全面展开对台湾的登陆作战。《台湾大劫难》一书所述《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则是中共在二零一二年内完成对台湾“超限战”作战任务的方略。现在，中共为灭绝台湾自由的“超限战”正如火如荼，已成烈焰辽天之势，而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政策使人们不得不问，他们究竟是台湾自由的保卫者，还是中共的同盟军。

中共对台湾的“超限战”，以通过统战活动实施的社会各领域全面渗透作为主要方式，以“军事斗争准备”作为辅助。其具体作战逻辑就是先经济、文化一体化，然后，二零一二年实现政治一体化。当前，中共不遗余力，高速推动经济和文化一体化进程，国民党则全力跟进，紧密配合。中共与国民党之行动默契如风动枝摇，似夫唱妇合。

在对台湾问题实施最终的政治解决之前，首先实现两岸经济一体化——这是中共控制台湾的最重要的战役目标之一。**ECFA** 的签订就是达成这个战役目标的标志性事件。

关税是一个国家保卫自己经济安全的制度之墙；**ECFA** 实质上是趋于零的关税协议。这个协议一签订，就意味着两岸之间的关税制度之墙被拆毁，从而形成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但是，**ECFA**，这个看似对双方都很公平的协议，在目前两岸情势的具体背景下，则只有利于中共实现其谋台的政治战略；对台湾的自由却构成致命的威胁。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如下：

首先，中共的基本战略在于否定台湾的主权与独立，消灭《中华民国》的法统和国体，用中共的极权政治统一台湾，使中共一党专制的政体，以中央政府的权威控制台湾。这个战略目标众所周知，中共也布告天下，从不隐讳。在上述政治前提下，面对在领土、人口、国力与军力诸方面都极不对称的铁血强权，台湾同中共签订**ECFA**，岂不等于自毁卫护自己经济安全的关税屏障，岂不等于自愿为中共谋台的两岸“政治一体化”预先作“经济一体化”的奠基。不同政治体制国家之间当然应当依照国际法进行经济交流。但是，极权专制与自由民主体制形成政治上的悖论，这种政治悖论必然对经济交流作出限制，即两者之间的经济交流不能达到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否则，当极权专制处于不对称的强势的情况下，经济一体化就只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度被控制的前奏曲。

其次，中共对诸多国家实施经济利诱或者政治逼迫，促使这些国家弱化，甚至切断同台湾的经济关系。中共这样作，是为了压缩台湾的国际经济活动空间，建立起对台湾实施经济围堵“柏林墙”，将台湾逼向中共的经济体系，使中国成为台湾唯一有经济战略价值的市场和资源的依托。**ECFA** 的签订则意味着中共经济“柏林墙”战策的成功。不用经济学专业知识，仅凭常识人们就能理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多元化都是

其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当中共运用经济“柏林墙”，把台湾逼上只能同中共“经济一体化”的不归之路时，台湾就将由于丧失对外经济多元化的能力而丧失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在那种情况下，同中国的“经济一体化”就成为套在台湾脖颈上的经济绞索。当二零一二年中共用极权政治的铁手拉紧这根经济绞索时，台湾将如何保卫自己的政治自由！

中共“超限战”似黑云压城；经济战战鼓频频，风急雨骤。值此危机之际，作为总统和执政党，本应当作出一切必须作出的艰苦努力，击破中共围堵台湾的经济“柏林墙”，开拓多元化的对外经济关系，强化台湾经济安全的基础。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马英九和国民党并不筹思救国之大策，而是通过 **ECFA** 的议题，为中共实现“经济一体化”战策赤膊上阵。

先是开投共之先河的连战，罔顾中共全力压缩台湾经济的国际空间之事实，竟称如不同中共签 **ECFA**，台湾经济就会边缘化——他要台湾人相信，中共，这个在国际上逼迫台湾经济边缘化的罪魁祸首，乃是使台湾经济免于边缘化的救星。后有总统马英九，一边重复连战的荒谬逻辑，一边为台湾签订 **ECFA** 定下最后期限，大有不尽快把台湾的命运送入中共默认的陷阱绝不罢休之势。

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都对同中共签订类似协议持极为谨慎的态度。澳大利亚甚至把同中共签订类似协议的可能性推迟至二零四零年之后。之所以如此，可能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对于建立在违背良知和理性基础上的中共经济体心存疑虑；他们不相信这样的经济体会长期存在与发展，所以不愿意把自己国家的经济命运，同中共权贵市场经济过分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反观马英九与国民党，对签订**ECFA**之事，简直急如星火，不肯稍待，与之同时，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也及时配合马英九和国民党，声称，签订**ECFA**一定会给台湾让利。国共两党领导人真可谓知心之交。只不过，台湾的民众是否会相信，一个用几十万大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自己同胞和学生的铁血强权，没来由突然会对台湾人关爱有加，温情婉转，慷慨让利。显而易见，中共是为实现政治一体化的战略而对台湾“让利”；这种“让利”只意味着政治阴谋，中共控制台湾的政治阴谋实现之日，就是中共对台湾的经济“让利”结束之时。

二零一二年政治一体化之前，先实现文化一体化，这是中共对台“超限战”的另一项重要战策。中共对台湾的文化渗透可喻之为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

中共通过台商已成功控制了台湾的媒体，蔡衍明的中时集团就是一个范例。相当一部分台湾媒体沦为中共宣传部的代言人和中共“超限战”的政战单位。

出版社和书店为避免因触怒中共而使经济利益受损，已实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制度”，对中共刻意封杀的作品暗中作出种种限制；中共属意的作品则成台湾出版界和书店的宠儿。

中共运用资助研究经费、邀请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提供旅游机会等诸种方式，将为数众多的台湾学者驯化成蒙昧学术良知的政治小动物。其中最可悲者，利用专业知识为中共政治统一台湾的战略背书；其中最可悯者，为物性利益而背叛了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对台湾的社会道义责任。

宗教竟成信奉唯物主义的中共实施统战活动最密集领域之一。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台湾和尚、道士赴大陆弘法传道，受大陆香火者日众。当年有台中某寺大和尚称，选上民进党候选人作总统，会血流遍地。不久前，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贾庆林向中共政治局作报告时，信心满怀地说：“二零一二年，台湾的宗教界将对大选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中共文化性“超限战”事项繁多，难以尽述；视界所及之处，无不触目惊心。马英九和国民党对中共推行“文化一体化”的种种行为，或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或巧舌如簧，多方掩饰；或鼓励纵容，百般支持；或曲意逢迎，关切备至。最具讽刺意味之处在于，中共实际控制的台湾媒体，如中时集团等，竟在毫不掩饰地作中共宣传工具的同时，为国民党政策百般鼓吹，为马英九竭力辩护，似乎国共两党已经情结连理。

除“经济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这两个重要战略领域之外，其它方面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共政策也已日益昭彰。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中共把解决台湾问题作为首要战略方向。当前中共的“军事斗争”准备，集注于策应对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渗透，并已作好准备：一旦非军事方式不能实现二零一二年控制台湾的目标，则不惜用军事方式占领台湾。中共外交的中心则是同美国和日本进行国家核心利益的交易，尽最大努力消除中共不得不军事解决台湾问题时美军介入的可能。

面对如此险恶的军事外交形式，马英九本应当千方百计筹思卫国之策，让世界了解台湾的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竭尽可能获得国际社会对台湾的道义和外交支持，尤其要加强对美外交，以便中共武力犯台时能够从美国得到强有力的军事援助。然而，马英九及国民党权贵却反其道而行之。

马英九先是轻声曼语，宣布外交休兵，军事不武，向中共献媚示好；继之以公告两岸已建立互信，离战争越来越远，试图掩饰中共谋台管弦繁急、事态险恶之真相，麻痹台湾和全世界对强权扩张的警觉性。

尤其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据二零一零年五月二日诸多媒体报道，日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公开对美国 CNN 说：“永远不会要求美国人民为台湾而战。”马英九此语，以台湾总统的名义，彻底断绝美国人民，乃至世界其它国家人民，为卫护人类自由事业，在台湾生死存亡之际，同中共搏战的可能。马英九此举，可谓自绝于国际社会的支持。正当台湾命运凶险难测之时，马英九上述宣称无异于从背后捅向台湾的卑鄙阴险的一刀。可以想见，中共狗官闻马英九此语，定然欢欣鼓舞，弹冠相庆——马英九短短一言，寥寥十余字，为中共谋台解除了美军可能介入台海冲突之大忧，使中共可枕戈而

安卧。对于中共灭绝台湾自由之战略，马英九一言真可抵百万大军之助。中共又焉能不欣喜欲狂。无怪中共鹰派将军朱成虎在国防大学讲课时，对此评论道：“从今往后，我们不必再真正反对美国对台军售了，给国际上做个样子即可。而且，我们还要希望台湾尽可能从美国买到高、精、尖的武器。反正二零一二年之后，这些武器都要被我们收编。”

无论如何，台湾也有对马英九天覆地载数十年之恩义，然而，马英九却以断绝国际社会保卫台湾自由的可能来回报，其心又何其毒也，其意又何其险也。

马英九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军事各领域全面投共政策，正在把台湾的自由带往中共默认的绝境死地。不过，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权贵对于台湾的最深刻的伤害还在于，其投共媚共的丑行卑态，正在摧毁台湾人，特别是青年人对台湾的民主制度的自信，对台湾的多元文化的精神价值的自信，对台湾的经济能力的自信——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权贵正在摧毁台湾人自强不息的意志，正在摧毁台湾作自由人的信念。

对马英九上台两年来的台海两岸局势作纵横观，已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权贵不是保卫台湾自由的战士，而是中共暴政谋台的同盟军，他们正在同中共暴政默契配合，背叛台湾的自由，出卖台湾的独立，逐步把台湾引上作中共专制的政治奴隶的命运之路。

这个结论对于台湾是冷酷的。铁血强权逼迫于外，自由独立的叛卖者执政于内——台湾，你将怎样走出历史的困境，你将怎样杀出命运的重围？愁绪如海，忧思如山；忧思愁绪已使太阳长出白发三千丈。

四、不惜与美国作军事决战 ——中共是以血海为美酒的魔鬼

中共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条件下就大规模投入韩战；中共会实施导致四千万农民饿死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方案；中共会展开几乎造成政权崩溃的、动乱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共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动几十万大军屠杀学生，血洗北京，等等——所有中共在历史上作出的关乎基本战略的选择，国际社会的有关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几乎都没有作出过准确的预见。现在，又有不少专家和研究人员，特别是一些台湾的学者，在对中共的战略选择作出一个判断：中共不敢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因为不能排除届时美军介入的可能；中共不会选择同美军直接冲突，因为双方国力军力相差悬殊。

上述这个判断仍然在重复以往的错误。之所以在中共战略选择的问题上总是“测不准”，原因在于国际社会上的各种身份的判断者，对于中共的思维逻辑的基本特征缺乏了解，他们用一种和中共政治环境完全不同的参照系中养成的思维逻辑，来判断中共的行为，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不可能准确。

战略决策的非理性和战策战术的极端理性——这是中共极权的基本思维逻辑。国际间中国问题研究者多为理性动物，他们以理性的利害权衡为基点研究中共的战略选择，就如同根据猴子的逻辑判断虎狼的形迹一样荒谬。

决定中共战略决策的，不是理性的利害权衡，而是极权专制的权力意志，或者说是凝结在权力意志中的价值取向。在台湾问题上，这种极权政治思维逻辑的特征表现得格外明显。台湾的民主化对大陆民众的政治示范作用，构成对中共极权的致命威胁，为维护极权体制，必须控制并从实质上灭绝台湾的民主制度——这是中共对台湾问题作出战略选择的基本思路的最简明表述。在这个战略选择过程中，美国的国力、军力以及美军是否介入台海作战等理性思维要素，都在中共的决策视线之外。

事实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党领导下的‘中国崛起’必然同美国的战略利益发生根本冲突”这个判断，就被中共高层确定为关于国际政治的基本战略观念。之后数年，中共“超限战”理论便把同美国的战略冲突锁定在两个具体问题上，即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超限战”理论把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列为中共的“核心国家利益”，并指出，用外交方式同美国达成“国家核心利益”上的互利的政治交易，使美国在军事上置身事外，是解决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最佳策略选择。但是，如果发生台海战事，或者二零一六年后为解决西藏问题而展开对印作战时，由于没有达成同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的交易，美军进行军事介入，则不惜以“超限战”战法，同美军决一死战。因为，“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没有退让的余地，一退便陷入战略上的被动。”

中共国防大学防卫学院院长朱成虎是“超限战”理论专家，在中共军界又“虎将”之称，同被称为“智将”的刘亚洲并列。他的军衔虽然只是少将，但是由于任国防大学教授，他的学生中不仅有众多少将，而且有为数不少的中将、上将，所以，他以及他信奉的“超限战”思想，在中共军中颇具影响。二零零五年，朱成虎在香港宣称，如果美军介入台海战事，而中共的领土——包括台湾和中国的舰船，一旦受到美军攻击，中共将用核武器反击；结果可能是中国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而美国也必须作好数以百计的城市被毁的准备。

朱成虎此言一出，国际哗然，举世震惊。于是，一群从来就没有对中共的战略选择作出过准确判断的专家、学者们，不知借着从哪里得到的自信，断然宣称，朱成虎的话只是个人的意思表达；中共领导层不可能如此没有理性。这群专家、学者们的宣称只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一个真理，即无知者最武断；愚蠢者最固执。

任何人只要对中共极权政治稍有常识性的了解，就不可能不知道，中共的将军在公开发言中是没有个人意志的。朱成虎的对美核战的言论，是中共战争意志的表达。只不过以朱成虎个人谈话的方式来表达，较为委婉。至于专家学者对“中共领导层不可能如此没有理性”的论断，则更属无知之言。朱成虎关于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也要与美国决战的意志，乃是对毛泽东的政治基因的继承。当年毛泽东不仅曾鼓动赫鲁晓夫同美国进行核大战，而且在中共内部也多次谈过核战问题。越战时，中共曾作出只要美军越过北纬十七度线，就公开派兵入越作战的决定。据中共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的资料，在作这个决定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军队将领说：“美国是纸老虎，核武器也是纸老虎。大不了同美国打一场大仗，美国给我们丢几颗核弹。中国死一半人，或者死三分之二，我们还会剩下两亿人。有什么可怕的。”可见，朱成虎与毛泽东一脉相承。

一位诗者与哲人目睹中共于一九六八年屠杀蒙古人的惨状后，曾有言：“中共是以血海为美酒的魔鬼。”从毛泽东到朱成虎的核战言论中，人们可以呼吸到更浓烈的血腥

气。中共视亿万生命如草芥，有其生命哲学的根源。唯物主义把生命归结为物质。这是一种对生命最阴暗绝望的哲学关照。凡把生命本质视为物质而不是心灵的哲理，定然轻贱生命。唯物主义就构成中共的理论基础。同时，因掌控极端的权力而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独裁集团，有一个共同的天性，即把人类的命运视为展现其个人意志的舞台，而决定其个人意志取向的，是从任意运用极端的权力中涌现的快感；对于独裁集团，蘸万里血海，书写运用权力的历史，乃是快感的极致。

朱成虎的对美核战宣告并非虚声恫吓；中共“超限战”理论关于同美国作军事决战早有预案。根据该预案，出现美军全面介入台海作战的态势，中共就将依照“超限战”战法，发起对美决战。决战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运用弹道导弹，以及其它常规性长程武器，对美军参战的航母战斗群，以及东亚的美军基地实施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全面动员长期培育的以各种移民身份潜伏在美国的中共十万秘密力量，与潜入美国准备发动恐怖主义攻击的特战队相配合，以中共驻美使领馆和中共大型商业机构为指挥中心，发起“超限战”，用城市游击战和秘密袭击的战法，在短时间内，彻底摧毁美国各大城市的核电厂、电厂、变电站、自来水系统、供暖系统、食品供应系统、水坝、桥梁、机场、车站、港口、地铁、邮局、通讯系统等战略性民用设施，让美国的国民生活系统陷入全面瘫痪，让美国的所有大城市都变成黑暗之城，死亡之城，以摧毁美国民众和国家的作战意志。

如果第一阶段在美国本土的“超限战”没有达到摧毁美国作战意志的目的，同美国的决战即进入第二阶段——全面核大战阶段。中共实施核大战的“杀手锏”武器，目前不是战略核潜艇，而是千里太行山洞穴内的远程战略核导弹。在太行山中，中共掘出纵横数千公里的大通道，通道宽可并行四辆大型军用卡车；通道上面的岩层厚达数百米。数百枚战略核导弹日夜在山洞的大通道内遂行机动，构成美军没有能力摧毁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甚至第五次核反击能力。

中共为什么强调保有多批次的核反击能力？对此，朱成虎在给国防大学战略班学员授课时曾有解释。他认为，同美国的核大战将是逐步升级的作战过程，而不是一开始就进入全面核战状态。因为，全面核战是没有胜利者的互相彻底摧毁的战争。为避免一开始就进入互相毁灭的状态，双方都会使核战逐步升级，而这一过程与其说是核军力的较量，不如说是国家意志的较量，归根到底是人的意志的较量。一位学员的听课笔记中，记录了朱成虎的这样一段话：“美国民族性格有冲动、急躁、强悍的一面，又有怕死、脆弱、过分敏感的一面。我判断，只要我军掌握了核战逐步升级的节奏，具备多批次反击的能力，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我军将必胜；在互相彻底毁灭的全面核战爆发之前，美国的意志必定崩溃。同志们，美国国家意志一旦在生死较量中崩溃，美国的急速衰落就是必然的。一个国家魂飞魄散了，还怎么可能强大。二十一世纪就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世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事业也会随之复兴。”

朱成虎的上述理论被中共军界称为“核瞪眼”理论。朱成虎也宣称，中共只要同美国在两次“核瞪眼”的意志较量中获胜，中共的崛起就无人再可阻挡。而两次“核瞪眼”，一次是指解决台湾问题时美军全面介入；一次是指为解决西藏问题而展开对印作战时美军介入。

当前，军中鹰派的“核瞪眼”理论仍被胡锦涛的“和平崛起”骗局遮挡在铁幕之后。不过，胡锦涛之所以决策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渗透的统战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非由于他对和平的热爱，而是出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考虑——用军事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文职出身的胡锦涛无法真正控制事件的过程，而江泽民培育的太子党军人将因此获得荣耀和威望；用统一战线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胡锦涛及其“[团派](#)”势力则可以游刃有余地操纵整个过程。

然而，胡锦涛的意志又一次受到军方的挑战。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台湾大劫难》在台湾出版，书中披露了胡锦涛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略。两个月之后，国防部长梁光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针对《台湾大劫难》的出版事件，提出两项建议。首先，梁光烈建议对于用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重新评估。其理由在于，如果继续实行原来的战略方案，就等于按照《台湾大劫难》披露的内容行事。这不仅可能造成极大的政治被动，也会受到敌对势力和历史的嘲笑。其次，梁光烈建议严肃审查泄密问题，无论牵涉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应当尽快对涉嫌最大的[曾庆红](#)家族成员、陈希同家族成员、陈良宇家族成员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进行审查。

对于梁光烈的报告，胡锦涛作出批示，并传达到省部级官员和军队的集团军主官以上官员。胡锦涛批示的主要内容如下：（一）用统一战线方式为主，军事斗争准备为辅的方针解决台湾问题，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不能因为一本书就改变。况且，这个战略决策执行的十分顺利，我党与国民党在和平统一问题上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二）要重视《台湾大劫难》出版带来的消极影响。有关部门要统筹安排，作好台湾方面的工作，尽量限制这本书的发行范围。我们控制的台湾媒体对这本书要作到不评论、不提及、不参与炒作。（三）加强对这次泄密事件的查处力度。

从批示内容看，胡锦涛拒绝了梁光烈改变对台战略的建议。但是，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胡锦涛于二零一零年春节后，曾到国防大学视察。期间专门接见了朱成虎，听取他汇报“核瞪眼”理论，还对朱成虎的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肯定。由此可见，曾把藏族僧人淹没在血泊中的胡锦涛，本质上并不会拒绝以血海为美酒。

台湾大国策 五：黑暗中孕育的希望之光

第五章 人类大劫难之源自身的危机 ——黑暗中孕育的希望之光

一、引言

二零零七年以来，[自由](#)民主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美国努力试图走出危机，但是，它艰难的步履已显出历史性衰落的端倪；欧洲在危机中步履蹒跚，老态龙钟，似乎正在失去过失的荣耀和未来的希望。与之同时，中共极权专制的经济能量和综合国力却急速增长，犹如刚吃下过量摇头丸的无赖汉，充满超乎正常状态的勃勃生机。这种像滴血的刀锋一样引人注目的反差，让一个时代的困惑呈现在历史之巅——难道极权专制的崛起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衰落，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命运的主题吗？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怀有两个急切的希望。一个希望预言中共政权将会追随苏联共产帝国的命运，很快崩溃；另一个希望预言中共会由于经

济发展而逐步走上民主改革之路。然而，时至今日，这两个希望都没有实现，而且似乎也看不到实现的前景。这是为什么？

或许因为过分失望，国际社会对中国已经不敢再有希望，再作预言，而只接受极权专制强化的现实。如果说整个人类处于深刻的困惑之中，那么台湾则不得不感到绝望。中共，这个胁持十五亿人并成为美国最大债主的铁血强权的政治逼迫，本就是台湾的难以承受之重，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共卖台政策，则又给台湾雪上加霜。《与台湾关系法》原本或许给台湾一线希望：当自由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只要台湾敢于为自由而与强权决战，可能会得到美国的军事支持。但是，马英九一句“永远不会要求美国人民为台湾而战”，已经永远抹去了美军介入台海作战的希望——马英九不想给台湾留下任何希望。

人类必须走出困惑，台湾则应当走出绝望。从本章起，我将向历史讲述人类能够走出困惑，台湾可以走出绝望的理由。这个理由并非基于“正义必胜，邪恶必败”、“自由一定战胜专制”之类的信念。以万年历史为参照系来思考问题，上述信念可能有真理性，不过，要以几年，十几年甚至百年为时间基点来审视，邪恶摧残正义、专制践踏自由的史实却屡见不鲜。

我不是根据信念，而根据中共铁幕深处正在发生的事实来讲述。因为，向一个只能听懂物性贪欲召唤的时代讲述信念是多余的。中共强大甚至豪华的外表下，隐藏着致命的弱点；中共从人类的贪欲中获得全球扩张的巨大经济能量，同时它本身的政治癌变也在内部迅速扩散——中共暴政已成人类大劫难之源，而中共内在的危机恰恰又构成消除人类大劫难之源的希望。

不是依靠理想主义的引导或者对正义信念的追求走出大劫难，而只能以大劫难之源自我解体作为希望的根据，这是可悲的。然而，无论如何，属于这个可悲时代的希望确实存在。

我看到，两个逻辑过程正在进行时间的竞赛。一个逻辑的内容是中共暴政全球扩张的能量聚积和推进速度；一个逻辑的内容是中共暴政内在矛盾趋向爆发临界点的速率。这两个逻辑过程的时间竞赛结果将决定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命运。遗憾之处在于，人类对于上述关乎其自身命运的逻辑过程，只能作旁观者。因为，没有理想主义的引导，人类只能沦为宿命过程的奴隶。不过，我愿对台湾如是说：全人类都可以作命运的旁观者，唯独你不能；中共暴政的内在危机爆发之前，它就已经开始消灭台湾自由独立的扩张进程，台湾要想保持自由人的尊严，就必须为自由而战——这是台湾的悲哀，还是荣耀？对这一问，懦夫和英雄自有不同的回答，而历史只会记住为自由飘洒的每一滴血。

二、以往中共崩溃和中共政治改良的预言为什么都受到时间的嘲弄——思想基点的错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部分以赵紫阳的智囊为核心的知识分子，追求实施新权威主义，用“开明专制”的模式，推行经济改革。“六·四”学运爆发后，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又试图利用学生运动，树立赵紫阳的权威，击败中共内部反改革的保守派。学生运动

被血腥镇压后，赵紫阳失势，中共政治迫害的锋芒也随即指向这批原中共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被迫流亡海外。

正是以这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为源头，先后涌出两种理论，即“中共迅速崩溃论”和“经济发展促进中共政治改良论”。国际上众多本就对中国只有隔山打牛式理解的专家学者，也摇唇鼓舌，咸与鼓噪，遂使这两种理论一时成为关于中国问题的最流行的权威之论。

但是，斗转星移，这两种理论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都已受到时间嘲笑。中国将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又一次逼问历史和未来。为了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前述两个判断的理论错失作基本的分析。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共迅速崩溃论最初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甚至亢奋的愿望更准确。这批知识分子原处于中共体制内，借权力之光，推行威权政治之理想，可谓春风得意于一时。今日一朝流亡，顿失权力之怙恃，理想之星随之黯淡。于是，归国重返历史中心之意，便转化为渴望中共崩溃之论。国际间的专家学者，以为原中共体制内的这批知识分子对中共的了解必然准确，因而又依据其判断，敷衍出一系列相关论说。

统观当时之种种中共迅速崩溃论，均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点，即认为中共很快会陷入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将导致中共崩溃；而判断中共必定陷入经济危机的依据，在于自由世界通行的经济学原理。正是这个共同的思想基点，构成中共迅速崩溃论错误的根源。

显而易见，以适用于自由经济制度的经济学原理作根据，研究判断中共权贵市场经济，本就违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基本规则，其判断结果又焉能不谬以千里。例如，曾不断有人按照经济学原理指出，根据坏账呆帐比例，中国的银行早该破产。然而，中国的银行不仅没有破产，反而越来越稳固。

更重要是，当代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中，很少有人能够洞察一个真理：中共极权体制本质上是政治的存在；在这种体制下，政治决定一切，而不是经济决定政治；当代中国没有经济危机，只有政治危机，经济问题只有通过政治危机才能形成社会变革的能量。

能够论证上述真理的事实可以随手拈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中国出现饿死四千万人的社会大悲剧。这应当算经济“大危机”了。可是，这个悲剧并没有造成中共的崩溃。相反，悲剧发生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对中共专制提出政治疑问。“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众多工厂、企业停工停产，经济停滞，可谓经济理论上的经济“危机”。然而，这种经济“危机”没有对政治产生明显影响，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必需品都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仍然热衷于从事当时共产党确定的政治运动。

另外，中共极权体制下还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即中共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常是在其经济状况好转时发生。例如，一九五七年，中共经济达到其建政后最好的状态，结果发生祸及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一九六六年，中共经济刚从饿死四

千万人的“大饥荒”时代恢复过来，就爆发了以内部权力斗争为政治实质的“文化大革命”。

现在，当年特定背景下出现的“中共迅速崩溃论”已成昨日黄花。于是，“中国问题专家”们又开始追逐另一个时尚的理论，即“中共崛起必然论”。少年男女对时尚的追求中常有青春的活力闪耀，学者文人追逐时尚的理论，则意味着展示浅薄和庸俗。我们此刻指出当年“中共迅速崩溃论”思想基点的失误，绝非为追求某种理论时尚，而是为准确预见中共暴政必然崩溃的前景，准备正确的思想基点和思维逻辑。中共暴政政治崩溃的进程，将从二零一二年底，中共十八大之后开始——这是我在本书此后两章内所作的全部讨论的结论。与那些曾作出“中共迅速崩溃论”的人不同，我结论的依据不是任何主观愿望，也不是西方经济学原理，而是中共暴政铁幕下隐藏的坚硬的政治现实。

当年，同“中共迅速崩溃论”并驾齐驱、名动一时的另一个理论时尚，可以称为“经济发展促进中共政治改良论”。这种理论的人格承载者主要是三种人：一是中共御用文人，二是原来曾处于中共体制内的流亡知识分子，三是国际上的“中国问题专家”。御用文人制造这种理论，目的在于散布幻想，欺骗世界，掩盖中共暴政强化极权，准备全球扩张的政治本质；原中共体制内的流亡者鼓噪这种理论，原因在于其政治上的“恋母情结”——此类人的政治之母本为中共体制，只是个人命运的偶然性之风，把他们从中共体制内吹到体制外，所以，政治基因使他们天性钟情于有利中共的理论；“中国问题专家”们对中国的了解一般只能达到“盲人摸象”的水平，所以，为证明其“专家”性，便不得不人云亦云地追逐理论时尚。

上述理论的核心内容可以用一句话表述如下：即使“六.四”事件之后，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中共仍然有意愿和能力，通过由其主导的渐进的[政治改革](#)，最终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

随着时间的流逝，上述理论必将日渐式微。中共专制随经济发展而日渐强化的事实，比理论更具说服历史的能力。

“经济发展促进中共政治改良论”受到事实的否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理论违背中共极权的天性。尽管世界上有案例表明，由于社会发展，一些威权政体主动经过政治改良趋向民主化，但是，人类的万年历史中，从没有极权专制主动放弃独裁权力的情况；当代共产极权专制政治的崩溃，都以人民大起义式的全民反抗作为直接的动力。所以，论证中共会主动放弃极权专制就是在论证幻想。

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共用鐵与血向历史声明：它绝不允许用任何方式改变一党专制的极权政治。“六.四”血案彻底剥去了中共暴政的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沦落到只能够利用国家暴力、谎言和利诱维持统治的地步。当前中国的“上层一万家”，乃是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无耻文人共同构成的政治黑手党。这个政治黑帮唯一的政治意志，只在于用一切方式强化极权专制。而强化极权专制的作用有二：一是中共官僚集团可以继续藏匿于暴政铁幕之后，规避历史对其反人类罪行的大审判；一是权贵阶层能够利用腐败的国家权力，在受到专制保护的条件下，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财富。通过政治改良实现民主，对于中共权贵阶层乃是政治自杀行为，所

以，中共政治黑帮集团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良的意志和激情——它没有自杀的意志和激情。

人的历史由意志决定。中共实施经济改革，发展经济的根本动机，在于实现其政治意志，即强化极权专制。动机决定结果。为其动机所决定，中共经济改革不会为民主政治构建经济基础，而只会为强化专制提供经济体制的保障。这个体制保障就是现在中国的权贵市场经济。指望权贵市场经济会导致民主政治，就像指望母猪生出猛虎一样可笑。

围绕“经济发展促进中共政治改良说”，曾提出一系列伪观念。现就其主要者讨论如下。

“中产阶级论”是上述伪观念中流播最广者之一。亚里士多德曾有论曰，一个城邦如果中产阶级占多数，则既可以防止少数富有者把财富转化为特权，又可以防止少数社会底层者的反社会过激行为造成动荡，所以，中产阶级占多数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要素。于是，中共御用文人和伪“中国问题专家”东施效颦，将亚里士多德“中产阶级论”之意，用于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问题，声称：经济的发展会使中国出现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必然提出[政治民主](#)的要求，中共则会顺应中产阶级的要求实施政治改良。

上述观念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权贵市场经济只会制造极端的两级分化，而不可能造就一个强大到占多数的中产阶级；另外，权贵市场经济之下产生的所谓“中产阶级”，是凌驾于广大底层民众之上的极权政治的赘生物。这个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只有附庸极权政治，以保住其利益之心，而绝无追求民主政治之意。因为，中共极权政治乃是其衣食父母。

“私有化必然导致政治民主化”——这是另一个著名的伪观念。这个观念断言，中共经济改革的私有化趋向，将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所有权基础。且不说中共一直没有，至今也没有迹象表明其会还地于民，放弃对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也且不说所谓国营企业所有制改造实质是中共权贵私分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仅就上述伪观念无条件把所有制与民主政治必然联系在一起，也足以表明其谬误。理由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不同形式的私有制常与不同形式的专制相联系，并为专制的存在提供经济制度的保障。

同民主政治相联系的，只是一种特殊的私有制，即公民个人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前冠之以“公民”，意味着这种私有制是以公民的政治和社会权利为前提。换言之，唯有建立在公民政治和社会权利法律保障基础上的私有制，才能构成民主政治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中共极权以否定公民的政治和社会自由权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在中共极权体制之下，根本没有公民政治和社会自由权受到法律真实保障的政治生态环境。所以，属于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私有化，不仅不会导致政治民主，反而只会强化极权政治的社会基础——权贵阶层的经济能力。

另一个伪观念，即“人均国民产值增长标志民主政治论”曾经能够风行一时，恰是证明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浅薄。依据这个伪观念，世界上诸多国家的民主化都

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某种统计学的指标为象征，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发展，并达到相近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中国的民主化就会实现。

这个伪观念之浅薄首先在于，用与中国状况具有深刻而巨大差异的其它国家产生的统计数字，来对中国作出判断。显然，这种判断又是违反思维逻辑基本原则的产物。其次，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判断定性分析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伪科学。因为，人的意志常常是非理性的，非定量的，即使在物欲主宰的时代，物性贪欲引发的社会进程，也不是理性的定量分析所能规范。

我们否定中共因经济发展而实施政治改良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中共极权将长久存在，而是要说明，极权政治构成中共政治命运的归宿，它已没有超越极权政治的前途，它将死于极权政治的崩溃，而且这种死亡方式是中共自己决定的。

三、中国社会全面危机的政治意志化 ——中共极权割肉自啖的政治天性

中共暴政已经作为人类大劫难之源，出现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政治地平线上。同时，中共暴政内部的社会矛盾也急速趋向极端，并呼唤社会大变革，呼唤民主政治的拯救。这种社会矛盾的本质，在于中共官僚阶层同民众之间的剥夺与反剥夺，压迫与反压迫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极权政治体制则是社会矛盾的孕育者。

任何极权政体都具有与社会为敌的天性。“六.四”屠杀之后，由于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除物欲引诱之外，中共极权越来越只能靠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和国家制造的谎言维持统治。当代中共暴政是人类历史上最堕落、最伪善、最狡诈、最凶残的极权形式。这种极权形式正在通过权贵市场经济，在积累全球扩张的能量的同时，也积累将导致其崩溃的社会矛盾的能量。

中共的所谓改革最终形成的权贵市场经济，是由腐败至极的国家权力主宰的经济运行机制。由于极权专制之下国家权力属中共官僚集团私有，以自私的国家权力为主宰的经济机制不可能以社会公平为原则，所以，权贵市场经济运行的总的趋向，就必然表现为社会财富涌向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即中共官僚集团及其家族成员。而且，权力越极端，便越腐败；权力越腐败，社会财富涌向权力的速度便越疯狂。于是，制造社会两级分化便成为权贵市场经济的宿命。

据中共高层一位良知人士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统计，当代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人，掌握著百分之七十二的社会财富；最富有的一万个人中，百分之八十六点九属于中共权贵的家族成员。由于中共铁幕的遮蔽，我们无法检验上述统计数字的准确度，但是，从不同途径透露出来的有差异的统计，都在表述一个共同的事实，即当代中国财富的两极分化已达人类历史之冠。

人民对社会财富极端两极分化原因的政治解读，构成社会动荡的起点。上个世纪中国出现饿死的四千万人的悲剧；悲剧过程中，人们宁愿默默地饿死，也几乎没有人提出政治的抗议。其原因在于，当时中共建政不久，由于欺骗宣传，整个时代对中共抱有希望，社会悲剧缺少转化为向中共提出政治疑问的条件。所以，即使中国人饿死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中共极权政治仍然十分稳定。现在，中共六十餘年的实践已经使

其成为政治道德的破落户，它制造的国家谎言的欺骗效应越来越低，所以，虽无饿殍遍野，但是财富的极端两级分化，已演化成十余亿中国民众对中共合法性的强烈的政治疑问；“不患寡，患不公”的古训，正通过社会动荡能量的积累，再现其真理性。

中国的两级分化并不只限于财富领域，更表现在权利范畴。中共权贵阶层通过垄断专制的国家权力，垄断了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部社会资源。这种全面垄断转化为全面的特权是逻辑的必然。普通民众被剥夺了以选举权为中心的政治选择权，从而处于政治奴隶的地位。中共狗官及其家族成员的横行无忌，骄奢淫逸，时时在提醒普通民众记住政治奴隶的屈辱；国家一切权力的运行过程，处处划出特权者和政治奴隶之间的界限。

柏拉图说“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这位先哲或许对人提出过高的期许，因为，许多人似乎并不懂得追求意义。我愿说“人是懂得尊严的动物”。即便沦为乞丐奴仆，人的心底里也沸腾著对尊严的渴望，而且社会地位越低贱，渴望便越炽烈。当前，现实每天都在论证中国民众的低贱和特权阶层的“高贵”，都在论证官权对民权的肆意践踏。中国十余亿政治奴隶对人的尊严的渴望，正转化成对中共极权专制合法性的另一个逼问。

社会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经济机遇的公平与法律权利平等，构成两根支撑社会正义之柱。当代中国，财富的极端两级分化摧毁了经济机遇公平的可能；权利的极端两级分化使民众不可能相信中共专制之法会坚持法律权利平等的原则。支柱摧折，社会正义随之崩溃。而社会正义崩溃必定打开社会反抗的闸门，并提出政治变革的要求。

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称：二零零五年以来，不包括藏人、维人等少数民族的动乱在内，年平均发生“群体性”事件八万三千起，参加人数最多的达四万余人。在中共的政治词典中，所谓“群体性”事件，实际是指起自民间的“维护基本人权，抗争官权暴政”的行动。这种维权抗暴活动形成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流，也是中共面临社会大危机的象征。

我曾指出，中共极权之下，只有政治危机，没有单纯的经济危机和其它社会危机。而现在，中国全面的社会危机正在政治意志化，即正在演变成政治危机。其标志就是遍布中国大地的群体性维权抗暴运动已经开始了政治意志化的过程。所谓政治意志化的基本涵义在于，民众不再把自己权利受官权侵犯和社会非正义现象当作个案，当作官员和中共权贵的个人行为的后果，而是将其视为中共极权专制的必然结果，并以此作为根据，对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另外，维权抗暴活动的秘密的准组织化，也成为民众反抗活动政治意志化的重要内容。理由在于，维权活动自发的秘密准组织化，意味着民众对中共国家组织和法律秩序的彻底背弃。中共中央政法委二零一零年一月的一份内部通报称：二零零八年以来，全国发生的退伍军官和军人为生活待遇而进行的群体上访事件，包括一千多名军官参加的到北京军委总政治部上访事件，都有退伍军人自发组建的“战友会”程度不同地参与组织协调；数起三峡大坝移民自行返回库区事件和辽宁富锦地区农民自主分地事件，均由农民自发组织的秘密“农会”发挥“煽动和组织”作用；近年广东和上海规模最大的农民工讨要拖欠工资事件，是由农民工中的“同乡会”组织领导。

反抗运动的组织化是社会大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形式。中国民众的维权抗暴运动虽只处于准组织状态，却也足以令中共心惊肉跳。[胡锦涛](#)对上述通报作出下述批示：“要坚决打击取缔‘战友会’、‘农民会’、‘同乡会’等非法组织。另一方面，各级领导都要把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当作维护我党执政地位的大事抓紧，抓好。”

中共确实受到危机地挑战。不过，对中共的最严峻的挑战，还在于中共解决危机的政治能力正日趋弱化。

极权政治实施的是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私有制。由于权力高度腐败，中共暴政已把国家权力私有制推进到极端的状态。这种极端状态的内涵可以表述如下：每个官员都把其所掌握的权力视为私有物，视为攫取经济、政治、文化和其它利益的私人工具。

国家权力私有制的极端化，使国家权力分裂为数千万官员手中的特权，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国家权力的整体性效应。显而易见，为应对严重的社会全面危机，中共应当缓和各个领域的矛盾。但是，由于绝大部分官员都从个人私利的角度理解其掌握的权力，因而就出现了对中共极权政治极为致命的现象——一方面，为维持国家权力的中共官僚私有制，需要官方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每个官员基于不可遏止的贪欲，都把其掌控的腐败权力发挥到极致，以攫取更多私利，而腐败权力的疯狂的非理性使用，必然以对社会和普通民众利益的侵害和剥夺作为直接后果。如此一来，社会矛盾的加剧必呈狂澜即倒之势。

维持政治生存的需要和腐败权力实际运行的价值取向之间严重背离，中共实已人格分裂。古籍中有载，两壮士为比勇敢而割肉自啖，直至血流满地，死于非命。当前中共数千万狗官运用权力的模式，恰似割肉自啖，自寻死路。所不同处只在于，古壮士是为竞比勇气而自啖，故虽愚昧却尚有令人动容之豪情；中共狗官是为满足吞象之贪欲而疯狂，故不仅愚蠢，且复丑陋不堪。

中共狗官的腐败权力一方面直接作用于社会，激化社会矛盾，另一方面还作用于自然环境。为攫取私利而对自然资源进行毁灭性开发利用，已成中共政权割肉自啖天性的另类表现。中共经济改革二十余年，自然环境惨遭涂炭。神州大地，壮丽河山，已成毒气污水之乡；黄河断流，长江水枯，珠江色变，淮河败坏；北方风尘弥空，沙漠汹涌，南方黑烟匝地，石漠裸露，西方核弹污染，千里死寂，东方渤海腐臭，鱼虾蒙灾。于是乎，怪病丛生，癌变竟成流行之症；活在毒气污水间，中国人人面有晦色。自然环境对中共的报复便是通过产生大批生态难民，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官民冲突。已有众多学者预言，越来越多的生态难民即将形成中共无力解决的另一个社会危机。

中共割肉自啖的愚蠢，还通过对藏人和维人的政策表现出来。藏人和维人同中共的矛盾之所以不可调和，关键在于藏人和维人要坚守自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命运的存在，而中共则试图通过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把藏人和维人的故乡，彻底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关键在于藏人和维人不愿再作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而要作有民族尊严的自由人。面对藏人和维人顽强不屈的抗争，中共暴政早已黔驴技穷，丧失解决危机的政治能力，只能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

通过大规模逮捕和屠杀的恐怖效应，维持统治。当缺乏政治道德基础的国家暴力成为极权者唯一的选择时，它所实施的每一次逮捕和屠杀，都同时是刺向它自己的利刃——多把一个反抗者关进监狱，极权者就为自己多积累了一份仇恨；藏人和维人在每一次屠杀中涌流的血，都如激流怒涛，冲荡著中共专制的政治基础。

国家权力的每一次运用都会产生积累社会矛盾能量的负效应——这是一个政权病入膏肓的象征。当前中共就处于这种状态。国家权力运用的自戕效应不仅表现为前述国家权力私有化的极端状态，更通过腐败权力主导的权贵市场经济表现出来。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所有关于中国前途的论述，都把经济发展指数当作判断中共政治极权巩固或者衰败的基础性指标。这种现象表明，当代世界范围内的中国问题研究都陷入一个盲区，即认为经济下滑将构成导致中共政治崩溃的首要原因。在此，我愿作出一个完全相反的预言：中共政治崩溃之日，必是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仍然发展之时。

作出上述预言的理由在于，导向社会两极分化，乃是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天性和铁律。权贵市场经济创造出的经济指数越高，为中共权贵积累的经济能量越巨大，它所导致的在财富和权利双重意义上的两极分化便越趋于极端。而极端的两极分化是中共政治崩溃的社会矛盾根源。所以，我判断，中共暴政将死于其权贵市场经济“繁荣”之时。那就如同日内瓦湖的喷泉，达到最高处之后，便颓然跌落，一泻千尺，无可挽回。

四、中共将在腐烂中走向灭亡 ——一种最丑陋的死亡方式

“六·四”屠城，中共虽保住专制权力，却深陷政治道德的危机之中。屠城首犯[邓小平](#)为让中国人忘记其罪恶，决意把历史推进疯狂追逐物欲的时代。他要让中国人在物欲中腐烂；这个老政客深知，道德良知腐烂了，人们就不会费心记住过去的罪恶。不过，在引导中国走上非理性的追逐物欲之路后，首先彻底腐烂于物欲的，乃是中共官僚集团。在中共数千万官员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贪官污吏集团的过程中，[江泽民](#)与[曾庆红](#)“功不可没”。

对于江泽民，掌握中共的最高权力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命运的偶然性。由于缺乏雄厚的政治资历，再加上上海小男人本就甚少政治大魄力，一旦身居高位，江泽民最初惶恐有加，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建立领袖权威。据知情人透露，正当江泽民束手无策之时，曾庆红为其献上一策，名曰“普遍放宽权力运用尺度”。曾庆红解释道：领袖建立威信无非铁腕和收买，即威恩并用。然而，铁腕立威需要政治强势，而江泽民缺乏的正是政治强势，所以铁腕可偶尔用之，但不可常用；无强势政治而常用铁腕，乃取祸之道。所以，根据江泽民的自身情况，建立领袖威信唯有收买一途，而欲收买数千万官员则唯有让权力变成财富。所谓“普遍放宽权力运用尺度”，名为充分发挥每一个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实则是允许官员把其掌握的权力视为私产运用。

专制权力天性就有腐败的趋势，历代最高专制者为避免官民矛盾激化威胁政权的存在，常对各级官员的权力行为加以严格约束。即便如此，权力腐败仍然是所有专制体制的痼疾。如今江泽民听曾庆红之计，为收买官心而纵容官员权力私用。一时之间，数千万官员像尾巴被点燃的公牛，眼瞪如灯，声吼如雷，拨土扬尘，奔入权贵市

场经济的原野，尽情打滚撒泼；数年之内，中共便沦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最无耻的贪官污吏集团。时至今日，腐败已成中共官场的正常政治生态，视权力为自己的私器已成官员的普遍信念。江泽民的中共领袖的权威由此而建立，中共暴政将腐烂而死的命运也由此确立。当今中共狗官腐败之斑斑劣迹可略数如下：

权钱交易乃腐败之首要内容。党权、行政权、司法权，凡权力运行之处，无不有受贿之事；中央建设项目，地方建设项目，凡有国家项目之地，无不有贪污之举。大官大贪，江泽民、曾庆红、朱镕基、李鹏、胡锦涛、[温家宝](#)的家族成员，无须奔走，便成超亿万富翁；小官亦不安于小贪，村庄、乡长、科长，鱼肉百姓，强取豪夺，便可得巨资。金钱如逐臭之蝇群，争先恐后飞入中共狗官之钱袋；贫困似漫天黄叶，纷纷落入寻常百姓之家。狗官之子女或骄奢淫逸，横行如蟹于国内，或宝马香车，豪宅巨室，一掷千金于国外。百姓之子女至可怜者，为娼为妓，出卖色相，只为一日之餐，其数已达八百万；百姓之至可悲者，不得不卖血以替子女交大学之费，而官宦无良，为饱私囊，抽血不换针头，竟使卖血者罹患滋病之难——河南爱滋病村因此而生。

如果说权钱交易天良泯灭，中共狗官只待天谴。那么，权色交易则表述中共狗官腐败之香艳风流的神韵。

中共权力意志之首，亦为以权谋色之冠。江泽民虽貌丑体朽，却恋慕少艾：左拥歌星宋祖英，赏之以少将之衔；右抱央视女主播，缠绵于中南海华屋之内。更于中共大会庄严之主席台上，天下记者千百镜头之下，江泽民贼眼烨烨如炬，死盯红衫女侍，似处无人之境；其目光炽烈当可融铁销冰，淫欲焚身之意如描如画。胡锦涛因糖尿病久不能行人事，不过风流不肯人后，效古宦官对食之意，与其僚属王三运之妻，肉体相依偎，精神长苦恋，贪鄙之徒王三运因此官运亨通。

上行则下效。数年之内，中共狗官人人妻妾罗列，无数金屋藏娇娘；个个情人成群，行云布雨之香窟多于鼠穴。其剽悍者如重庆警酋文强，以强奸女星享权力之乐；其不堪至极者如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以齿裂娼妓之乳显权力之威。

当今之中国，夜幕低垂之际，十万夜总会遍布宇中：灯火辉煌，尽是中共狗官淫乐之所；八百万妓女妖娆于其间，皆为腐败权力俎上之鱼肉。贵州有一秘密民间组织，专事调查狗官秽行恶举，以备中共崩溃后起诉之用。据这个组织的一项调查，进入贵阳最豪华的二十家夜总会淫乐者，无一例外全部是中共官员和奸商恶贾。此种场合，奸商恶贾不过是官员携带的会谄媚之笑的钱包，而官员之名色则法官、警官、检察官齐至，书记、政委、区长皆备，税务、工商、监察俱全。

情爱，这人类生命之泉的源流本应纯净，如今却被腐败的官权污染，中国人还能到哪里去寻找生命的道德尊严。国家权力已成最大的教唆犯，它教唆整个社会堕落。而堕落之至深者，乃在教育领域。

为控制人的精神，中共向来不允许民间开办大学。大学官办，教育遂成官僚猖獗之地；官权腐败，大学难免池鱼之殃。今日中国之大学，招生、毕业、分配、转专业、学位论文答辩等，所有环节必须钱色行贿，方能事遂人愿。教师之职已成捞钱之

网。教授碌碌，专思渔猎钱色，以得肉欲之享受；学者昏昏，只想用学术阿谀暴政，以求虚名高位。教授学者浑不知真理为何物。

教育堕落之最荒谬者，乃各级官员占尽天下财富、美色之后，又如“附庸风雅之土地主”，思得学位之虚荣。中共狗官有所欲，官办大学便有所行。于是乎，各种在职学位教育纷纷出笼，花样繁多，水陆并呈。大批狗官于贪污受贿，吃喝嫖赌之余，脑满肠肥之际，又摇头晃首于大学教室之内，宛似听琴之牛群，教师则乐于对牛弹琴。其狗官至大至尊者，甚至不必屈尊至教室，到时自有导师教授为之找人代写论文，奉上学位。中共官员本多猥琐不堪、贪鄙无度之小人，然而，二十余年，狗官竟大多顶戴博士、硕士之花翎。真是斯文扫地，冠绝古今。

知识分子有民族智慧之镜之誉，有社会的良知之称。今日中国的“智慧之镜”映出的，只有对腐败官权的媚态；今日中国的“社会良知”能听懂的，唯有物欲的召唤。教育腐败之后果一至如斯，怎能不令人大悲无泪。中共权力腐败，荼毒苍生。同时也在吞噬它自己的生存能力。对于中共极权的生存，致命之处在于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最严重的危险在于吏治腐败。中共吏治腐败之大者，有下列数项。

中共吏治腐败之首，当推卖官鬻爵。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卖官鬻爵逐渐成为官场潜规则。现在，中国的大官小职均明码标价——所谓“明码”是指，虽无明文规定，但相关者人人心中知肚明，心领神会。中共之官职乃属当代最具增值能量和暴富可能的商品。民族道德整体沦丧之时，投机取巧者日众。欲买官以暴富者，多如过江之鲫；官位买卖由此成为一项繁荣如百花怒放之生意。

许多人不惜破釜沉舟，毁家买官，举债鬻爵。据中共组织部二零零八年底一份绝密的内部通报称：该年之内，有二百零三人因买官不遂，血本无归而自杀；八百一十七人因买官不遂，为还买官所借之债而犯赌博罪，甚至索要贿赂罪。尽管如此，官职买卖仍属卖方市场。只因一旦买官成功，得到权力，便如手握点石成金之杖，只须心狠手辣兼之以伪善诡诈，不旋踵间即可收回买官之成本；对于今日中共之狗官，“一年清知府”又何止“十万雪花银”。只是众狗官皆以虐民攫财为能事，鲜有人为极权长治久安计，暴政又焉能不危。

中共吏治腐败之二，可谓之曰权力的极端私利化。专制权力本就私有，但是，在运用权力过程中，私有意识一旦达到每个官员都可以为私利而不惜损伤极权体制整体利益的程度，则吏治腐败已至极端。有一经典案例，足以对上述情况“一叶知秋”。

王乐泉凭借江泽民之信任，治疆十五年，恶名全疆昭彰。江泽民下台，胡锦涛本欲用其亲信，河北的“毒奶粉”省长胡春华，取王乐泉而代之。王乐泉手眼通天，得此信息便欲制造一次在他控制之内的“维族动乱”，以证明治新疆非他不能，令胡锦涛知难而退。二零零八年，广东韶关发生伤害维人事件。王乐泉借机秘密遣人在新疆维人中煽动对汉人的仇恨。七月五日，数百维人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集会示威；王乐泉十余个小时不派警力维持秩序，终至酿成举世震惊的“七·五”事件。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民怨沸腾，事件失控，王乐泉虽一时阻止了胡春华入疆，却也难以继续长久在新疆立足，而且为遭政敌整肃留下后患。

王乐泉为封疆大吏，号称“新疆王”，临事却能为私利用权，制造“动乱”，而毫不考虑暴政整体的安危与稳定。由此可知，中共贪官污吏数千万，能为暴政整体利益而筹思者鲜矣。只此一项，中共吏治腐败之危险不问可知。

中共吏治腐败之三，在于官员的帮派化和权力的黑社会化。中共专制官场之上，唯才是举，任人唯才永远只是幻想或者欺骗，任人唯亲才是铁律。任人唯亲政治的极端形式便表现为权力的小帮派化。如果说毛泽东、邓小平属虎狼之辈，当代中共领袖便只配称为蛇鼠之属。然而，越是蛇行鼠窜之徒，便越依赖于小帮派政治，盖因其缺乏势能压众的政治权威。江泽民的上海帮、胡锦涛的“团派”都是如此。

小帮派政治的直接效应，就是使官员普遍丧失对党纪国法的信心，而相信只有结成帮派，才能立足于官场，免受政敌之伤害。十数年以来，中共官员通过“结拜兄弟”这种古老的形式结成帮派已蔚然成风，甚至有为保证“兄弟”关系的严肃性而歃血盟誓者。每一个这样的小帮派都是一个综合权力体系，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中必有警官、检察官、法官、党的纪律委员会官员，担负保卫帮派成员不受政敌整肃之责；必有税务、工商、金融、计委等经济部门官员，为帮派成员谋利提供权力支持；必有党委、组织部的官员，为帮派成员保官、升官护航。

小帮派政治由于丧失基本的政治伦理，而必然趋向国家权力的黑社会化。利用黑社会力量从赌博、贩毒、娼妓等所谓非法行业榨取钱财，以饱私囊，同时，用国家权力为黑社会提供保护——这是当前中共官员的各级

小帮派势力正在作的事情。中共权力的黑社会化已成时代趋势，不可遏阻。

当前中国的权力腐败，是由数千万贪官污吏每日每夜都在万里河山之间刻写的黑色史实。我以只笔尺纸，即便写至墨干笔秃又岂能表述其罪恶于万一。不过，相信从以上寥寥数千言中，读者当能相信，“中共将在腐烂中走向灭亡”此言不虚。死于彻底的腐烂——这种丑陋至极的灭亡方式，或许正是命运对暴政的惩罚。

台湾大国策 六：中国内部权斗生死局

第六章 来自天谴的恶咒 ——中共内部权斗生死决 一、引言

对于自由的心灵，生活在中共极权专制下是一种绝望，在时代精神被中共的政治谎言绝对控制的年代，尤其如此。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位被判处死刑的中国女思想犯，用一句话说出这种绝望：“你即使对铁铸的墙咳一声，也会听到回声。可是，你对人的心千百遍地呼唤，却得不到一丝回应。”

中共当局甚至不允许这位女思想犯临刑前对铁墙发出咳声，而用铁丝刺穿她的下颚和舌头，绑在一起。不过，即便是在重重愚昧将中国人的心灵封闭在黑暗奴性中的时刻，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仍然在政治铁幕上划出道道雷电般的轨迹，给人以铁幕或许会被撕裂的眩目的希望。

内部权力斗争，构成中共历史的一个主题，是中共的一个难以摆脱的血腥的宿命。众多御用文人用被污染的长江般滔滔不绝的墨水，写出堆积如山的伪历史，企图让人们相信，中共残酷的内斗是基于政治理想主义的争论；在御用文人的心目中，为政治理想主义而残酷，而兽性，似乎可以得到良知与理性的赞赏。然而，比行刑队染血的刀锋更怵目的历史却不断证明：中共内斗的本质只在于争夺专制权力，对专制权力的疯狂热恋是中共内斗的原动力；种种理想主义的理由都不过是为掩饰对权力的贪欲而伪造的借口。

对专制权力的贪欲，犹如来自魔鬼的诱惑，那种诱惑远胜于金钱或者美女。人世间可以找到一掷万金、挥金如土的慷慨之人，可以找到即便美女坐怀也不乱性的鲁男子，但是，却难以找到主动放弃权力的中共官员。为争夺专制权力而作生死之决——这是苍天对中共暴政的嘲弄，这是来自天谴的恶咒。只要中共暴政还没有被历史埋葬，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就不可能止息。

建政之前姑且不论，建政之后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按其风格和表现形式的明显不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邓小平](#)先后主政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江泽民、[胡锦涛](#)先后主政时期。第一个阶段，中共权力斗争大开大合，总是表现为重大政治事件或者重大社会危机。第二个阶段，权力斗争依然激烈，却变成黑暗洞穴里演出的戏剧，外界很难得到观赏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况，又有御用文人和伪自由知识分子断言，中共已经建立起权力交接的基本规则，所以，不会再出现毛泽东、邓小平时期影响中共政局稳定的权力斗争形式。

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伪自由知识分子最可鄙之处就在于，他们心底里总有一种冲动——窥测并抓住一切机会，通过为中共辩护，向暴政献媚。事实上，在专制权力的贪欲作用之下，中共极权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正常的权力交接秩序；对中共只有一个铁律，即专制权力必须通过险恶万分的权力斗争获得。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邓小平时期和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会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与形式；这两种风格不同的权斗形式对于中共极权的利弊得失有什么不同？二零一二年秋至二零一三年春，[习近平](#)、薄熙来、李克强、汪洋、李源潮、王岐山等所谓“中共五代”全面进入中共最高权力领域之后，中共内部权斗的风格和形式会发生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共极权政治会产生怎样的作用，以及为什么？——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正是本章讨论的重点之所在。

二、中共建政后第一阶段权斗回顾 ——偶然性对魔鬼的垂爱

从建政起至江泽民接掌最高权力之前，可以称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权力斗争之重大事件包括对高岗、饶石的整肃；对彭德怀的整肃；“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整肃和“六.四”屠城。这个阶段权力斗争的总的特点是，每一次权力斗争都表现为重大政治事件或者政治危机。其中严重威胁中共极权政治生存权的重大危机的事件，有三起，即[林彪](#)企图政变事件、粉碎“四人帮”事件和“六.四”血案。我们将对这三起事件进行讨论。由于前两个事件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展开的，所以有必要首先就“文化大革命”的缘起作简要的说明。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中营，数亿农民则成为集中营中“会说话”的生产粮食的工具；“大跃进”是

为实现毛泽东全球扩张野心而积累经济能量的愚蠢至极的生产发展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饿死四千万农民的社会悲剧。“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实际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威信大受损伤，被迫“退居二线”，刘少奇趁势崛起，数年之内牢牢控制了中共暴政的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

毛泽东，人中之魔，世之枭雄。为夺回最高专制权，也为免于死后因造成饿死四千万人的惨剧而被掘墓鞭尸，毛泽东发动了以“文化大革命”为名的夺权运动。毛泽东自己起草的相关文件就写明，“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从刘少奇一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回政权。对权力的贪欲使毛泽东不惜粉碎刘少奇控制的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并重建受他控制的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

毛泽东依靠林彪控制的军队和自己炉火纯青的政治阴谋能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击溃刘少奇势力，夺回党政最高权力，并通过政治宣传使他成为中国人心中的神——为死后免于掘墓鞭尸的命运，必须在活着的时候以神的权威控制人的精神。

然而，就在毛泽东春光无限之际，他和中共极权政治却迎来一次真正的危机。由于对林彪权力不断扩张的不安，毛泽东开始通过政治阴谋压缩林彪的势力。而林彪则进行顽强的抵抗，他的儿子林立果制定出武装起义的计划，准备实施军事政变。林立果在关于武装起义的政治文件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是专制暴君，他对中国的统治是暴虐的封建专制。

如果林立果的上述政治指控能通过实际发动的武装起义震撼历史——甚至不必武装起义成功，而只需要实际发动，那么，这次军事政变即使当时很快就失败，其所蕴涵的彻底否定中共暴政的政治能量，也将对中共极权专制造成致命的伤害。

然而，或许由于林彪关键时的举棋不定，或许因为林立果的幼稚无能，武装起义计划没有机会实际发动，便胎死腹中。真可令英雄扼腕，历史悲叹。这是在权力斗争范畴内偶然性对暴政的第一次垂爱。

权力斗争第二次把中共极权推上政治大危机的锋刃，是在死神夺走暴君的生命之后。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甫一撒手人寰，华国锋集团和被称为“四人帮”的以毛泽东夫人江青为首的集团之间，围绕中共最高权力的斗争，便迅速白热化。华国锋联合反“文化大革命”的中共元老，果断决策，运用宫廷政变方式，一举逮捕了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

当其时也，江青集团以“文化大革命”正统派自诩，挟毛泽东死后之余威，党羽遍于天下，只须振臂一呼，应和之声必定四起。且毛泽东死后，该集团在大本营上海组建的几十万民兵大军，便枕戈待旦，蓄势待发。只可惜，江青集团的首要成员均是政治煽动有术，政治阴谋无能之人，遂在昏昏然之际，沦为阶下之囚。即便如此，只要上海数十万民兵能举兵起事，当时之中国也必陷入大动荡之中——专制暴政的动荡，就是[民主运动](#)的机会。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派”和反“文化大革命派”中的任何一方会趋向[民主](#)，而是认为，只要因权斗而形成的这两派政治力量的冲突，最终通过中共极权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大分裂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民众中长期被压抑的[民主](#)力量，就会在极权秩序的政治和社会裂痕中找到生长的空间。但是，命运的偶然性又一次对中共暴政露出献媚的笑。“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马天水、许景贤怯懦寡断，首鼠两端，

不敢举民兵，以成大事，遂使中共又渡过一劫。

八九年“六.四”事件是中共暴政的前所未遇的政治大危机。“六.四”肇因于中共顽固派同大良知者胡耀邦之间的权力斗争。胡耀邦遭整肃，于愤懑中骤然辞世。大良知者之死，点燃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追求正义的良知，“六.四”学运由此横空出世。中共顽固派担心再次如“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失去权力，因此对学运恐惧且复仇恨。赵紫阳的智囊和幕僚则暗中支持学运，试图借学运之势，强化赵紫阳的权势，以便行“新权威主义”，加速推动经济改革。

在这次权力斗争的初期，赵紫阳可谓占尽优势。他不仅因为对学运态度温柔而赢得天下人心，即使在军内党内也广受拥戴。当时，中共将帅如徐向前、聂荣臻、张爱萍、秦基伟等，均反对用军队镇压学生，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更抗邓小平之命，拒绝率部进京；北京乃至全国各地，都出现党政官员，甚至警察、法官、检察官走上街头，支持学运之事。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只要以总书记之权威，行刚明果决之策，振臂一呼，奋起一搏，必当风云际会，天下景从，功成名就。但是，在政治决战的关键时刻，赵紫阳现好谋寡断之态，其智囊幕僚也都呈政治上的银样蜡枪头之像。反观邓小平及中共顽固派，意志坚硬如顽石，视民意如草芥；行动迅捷如脱兔，凶残似虎狼。终至赵紫阳功败垂成，邓小平稳操胜券。真可谓庸人误国事，奸雄害万民。

一九八九年，赵紫阳虽然尚无行民主之意，而只有“开明专制”之心，然而形势比人强。其时赵紫阳只要敢于与中共顽固派决政治的死战，并战而胜之，他必要借民生的历史趋势而立足，并行[思想自由](#)之国策。由此一来，中国民主化进程势将进入现实。可叹可悲之处在于，偶然性又一次垂爱极权专制。

偶然性屡次垂爱极权专制是否在表述某种必然性，即仅有内部权力斗争的危机尚不足以促使中共暴政崩溃。如果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在历史彻底否定极权专制的进程中究竟具有何种作用？对此一问，我将在本书其它篇章回答。

纵观中共建政后第一阶段内部权力斗争史，可以发现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权力斗争起于铁幕严密遮蔽的宫廷中，但是宫廷斗争的范畴却又难于容纳中共的权力斗争的全部规定性，即权斗一定要冲破宫廷斗争的限制而社会化，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历史运动。——林彪政变、江青遭擒虽然在宫廷斗争的范畴内解决，但是，这两个重大事变都以“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大动荡为背景，对林彪和江青集团的从思想到组织的政治大整肃，也都表现为近十亿中国人卷入其中的社会历史运动。至于“六.四”事件，不仅过程社会化，而且更是以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注视下进行的大屠杀作为结束。

第二，权力斗争被涂上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理想主义的色彩；权力斗争的各方都把自己政治立场的神圣性和正义性作为权力斗争的出发点；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必被胜利者冠以政治的罪名，至于生活腐败只是一种附加罪。

中共第一阶段内部斗争的上述两个特点，互相联系，互为表里。中共内斗的实质在于对专制权力的无尽私欲与贪欲。内斗一旦超越宫廷斗争的限制而社会化之后，如果让内斗的实质裸露在公众前，中共暴政的政治信誉将如秋风横扫之落叶，荡然无存，从而导致社会的信任危机。所以，中共权斗的发起者一定要用神圣的政治意识形

态或者高尚的理想主义，骗取全社会的信任，然后才会纵情发泄其对权力的私欲和贪欲。

中共寡头曾成功地欺骗过历史和芸芸众生，不过，他们从不会对自己的话有百分之一的信任。毛泽东声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保持共产主义理想的纯洁性；邓小平声称，“六.四”屠城是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和平演变”阴谋。然而，据可信的资料来源披露，毛泽东死前想安排江青和毛远新接任中共最高权力；“六.四”屠城之后，邓小平和中共顽固派元老陈平有一个共识，即“权力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子女手里放心。”——一种理想或者政治信念沦落到只有靠自己的老婆和子女才能理解和实现的程度，那只能说明这种理想和信念的伪善性。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箴言，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领域也表现出真理性。中共权力斗争的风格和形式，是由权力斗争的主导者的人格特征所决定。中共第一阶段权力斗争的主导者，如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王震等人，都是从内战的血泊中走出的枭雄之徒，虎狼之辈。他们浴血一生，杀人如麻，心硬胜铁，实乃猛兽也。猛兽相搏，必定震天撼地。正因为如此，中共第一阶段权力斗争才具有了表现为社会历史运动的

特点——宫廷斗争的狭小范围容纳不了政治猛兽们对搏斗场所的要求和肆无忌惮的个性；更何况这些政治猛兽的生命都蕴涵着专制权力赋予的巨大政治能量。

中国第一阶段权斗的虚伪的意识形态化，除为了掩盖对专制权力的贪欲之外，还有另一个作用，即为中共权力斗争的极端残酷性提供合理性基础。中共权斗决战之处，必分生死，不共戴天。权斗失败者，要遭受肉体 and 心灵的双重酷刑，且必祸及家人。权斗的胜利者不仅要践踏失败者的尸骨作政治之舞，还要蹂躏失败者的名誉和人格以纪功。

依照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因此成为共产党人的最神圣的情感。所以，为论证权力斗争残酷性的合理性，中共暴政就要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名义，证明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是阶级敌人。如此一来，加诸于其肉体 and 灵魂的全部酷刑和凌辱，就具备了政治的正义性和情感的正当性。

行文至此，中共政治的阴晦险恶，凶残酷烈，令我心摇神动，不寒而股慄，惨然而髮树。想来，死于中共官场权斗的凶魂厉鬼，即使在地狱之中，也将作万年殊死之争，而永难超生。

三、江泽民与胡锦涛阶段 ——鼠辈人格的内斗样式

江泽民、胡锦涛先后主政时期是中共建政后权力斗争的第二阶段。这种阶段划分的合理性在于，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权斗的风格和形式与第一阶段大相径庭。这一阶段权斗风格和形式的突出特征为下述两项：

（一）权力斗争的过程和结果被严格限制在宫廷斗争的铁幕后，而不再通过社会历史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权力斗争的宫廷化，使中共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变成进行权力斗争的特务组织。毛泽东、邓小平主政时期，权斗犹如中共极权政体上裸露

的可怕伤口，血如河涌，惨不忍睹；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权斗则如极权政体深处的癌变，虽在摧脏蚀骨，外表却可以用脂粉修饰，形似常人。

（二）权力斗争不再借诸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理想信念的名义进行，而是披上反对权力腐败的外衣；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不再受到“阶级敌人”的政治指控，而是通过中共严格控制的司法程序，以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罪名，被推上审判台。

中共权斗第二阶段的上述第一项特征，即权斗的宫廷铁幕化，主要是由这一时期中共官僚集团的人格特征所决定；其第二项特征则是取决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以下我愿对这两项特征形成的原因作具体分析。

我曾有一文，对“中共四代”即胡锦涛、[温家宝](#)一代的人格状态稍作讨论。其实，这个讨论也完全适用于江泽民一代的官僚。现将该文中之片段引述如下：

“中共‘四代’主政群体间，或有一二雄才大略，深藏不露者。然就多数而言，皆贪鄙不堪，庸碌至极之小人。他们文不足安邦，专事逢迎；武不能定国，只功媚笑。数十年来，或缩颈垂首，低眉敛目，循循奔走于权贵之门，形如家奴走狗；或逆来顺受，屏息噤声，惶惶侍奉于高官左右，仿佛舔痔之佞臣。他们奴性天成，媚骨内涵，早已精神阳痿；他们卖笑取胜，阿谀成功，尽失阳刚之气。

“精神阳痿，是为政治太监；尽失阳刚之气，是为政治二奶。二奶当权，惯会亲民假笑，垂泪卖怜，却无鼎革布新，福荫天下之大义；太监主政，虽有狐鼠之智，阴柔小计，却无云帆沧海，鹏举万里之大策。

“悲乎亦哉：且看中国权力之巅，竟成蛇鼠存身之所。君不见，中共‘四代’，或涂黑漆于白发之梢，如年老色衰，粉饰沧桑之妓；或笑意淫淫、搔首弄姿，如倚门卖笑，冀得垂青之娼；或鲜衣华服于大腹便便之体，如顾盼自许，秋水横波，油头粉面之兔儿爷。我烨烨中华，茫茫人海，竟无人哉？！”

以上所引，虽只数百言，想来也足以刻画出江泽民、胡锦涛两代官僚奴性入骨之人格。人是历史的主题；人格决定命运的风格。正是江、胡两代官僚的人格特征，决定了第二阶段中共权斗的风格。

如前所述，毛泽东、邓小平一代官僚，有枭雄之性，猛兽之风。生命风格决定，他们发动的权斗必有风云激荡、震撼社会之风格。把权力斗争引向社会，是为取得民众的支持。这样作显然需要有获得民心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魅力。毛泽东、邓小平一代黑暗的政治巨星，对自己诱惑天下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魅力具有信心——尽管这种人格魅力和思想魅力是深刻的历史错误，是中国人的耻辱和悲剧。

江泽民、胡锦涛两代官僚不是靠血战之功，而是靠数十年献媚之术，立足于中共官场。长期献媚，终至奴性刻骨，精神去势；此两代中共官员尽成鼠辈之人格承载者。虽说鼠辈心中对权力之如炽贪欲同猛兽人格相比毫不逊色，但其权斗风格却有鼠辈的特质——猛兽之争，必战于天地之间，大野之中；鼠辈之斗则常在暗洞黑窟之内，阴湿地沟深处。因此之故，江泽民、胡锦涛两代狗官，权力之斗总隐匿于宫廷铁幕之后；他们喜好背后捅刀、笑里藏刀。不敢正面交锋的人格，决定了他们不愿让权力斗争社会化，并表现为历史运动。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政治胆魄和政治实力操作权

力斗争社会化和历史运动化的进程——政治鼠辈的能力只表现为奔窜于政治黑幕之下。

权力斗争的宫廷化必然引发中共内部监控的特务化。当前，中共实施内部监控的特务系统主要有两个，即国家安全部系统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系统。

江泽民主政时，中共国家安全部就开始承担两项责任：一是负责涉外间谍案，一是对各级官员实施秘密监控；国家安全部长直接向党的总书记负责，省和市的国家安全局直接向同级的党委第一书记负责，并接受上级国家安全部门的业务领导。尽管规定国家安全部只能对政治局委员以下的官员实施秘密监听，但是，由于总书记个人直接控制国家安全部，所以，实际上所有的中共官员都处于总书记和地方各级第一书记的秘密监控之下。

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中共监控其官员的另一个特务组织。这个特务组织对九人组成的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会负责，并实行垂直领导。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力对中共官员实行法律以外的实质上的逮捕和审讯。正由于逮捕和审讯处于法律之外，因此，这种逮捕和审讯属于特务统治的性质。如果说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官员的监控行为同国家安全部有什么不同的话，或许只在于国家安全系统更倾向于使用各种技术性的秘密侦查手段，而纪律检查委员会更热衷建立普遍的“告密者”机制。

稍用笔墨介绍中共内斗方式变化导致的对官员普遍的特务性监控，主要是为说明，权力斗争的宫廷化并不证明中共已经建立起“权力正常交接的基本规则。”如果说一定要说建立了什么关于权力的规则，那么，中共建立的乃是对官员的严密的特务监控系统。这套特务监控系统的建立，意味着中共极权政治的彻底的黑手党化。

借诸反对贪污腐败之名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已成政治时尚——这是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权斗的第二项突出特点。这个特点的形成是基于两个时代背景。

首先，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期间，人心腐烂，道德沦丧，民权凋残，官权势张；贪官污吏肆无忌惮，狠如虎狼；奸商恶贾强取豪夺，气焰烛天；财富与权利两级分化已达极致，弱势群体水深火热苦不堪言；社会资源尽归权贵阶层，黎民百姓唯有仰人鼻息；自然环境惨遭涂炭，神州大地竟成污水毒气之乡，风沙蔽天之野。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极权的政治道德感召力荡然无存，政治信念的魅力消失殆尽。中共官僚再也没有能力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信念，或者用“改革开放”的政治理想，来欺骗社会，赢得民众对其权力斗争的支持。

其次，权力的深度腐败使腐败的权力成为社会的公敌，为万夫所指，万民唾弃。用反腐败的名义击败权力斗争的对手，与民众对腐败的普遍憎恶一致。所以，谄于政治小权谋的狗官群体，为粉饰只有私利而没有任何公益内涵的权力斗争，从江泽民、胡锦涛起，等而下之，便纷纷给权力斗争的对手安上贪腐之名，无情整肃，以使这种整肃看起来具有表面的正义性。例如，江泽民整肃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真实原因，是陈希同向江的总书记地位发起政治挑战，而江泽民却用贪腐的风流罪名，将陈希同送入监狱。胡锦涛对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整肃，同江泽民整肃陈希同的原因和方式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江泽民、胡锦涛的示范作用，使以反贪腐的名义进行权力斗争，成为中共阴谋政治的时尚。这种时尚得以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背景则在于，现在中共的官僚集团已经从整体上沦为经济犯罪集团；“无官不贪，无吏不腐”，乃是对中共官员群体现状的客观、冷静的表述。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决定了中共权力斗争的任何一方都无须为给权力斗争的对手寻找罪名而发愁——贪污腐败是可以信手拈来的罪名，所以，在权斗中需要作的只是如何制敌先机，抢先给权力斗争对手安上贪腐的罪名，以免受制于敌。

同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用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作为权力斗争的旗帜相比，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权力斗争，可以减弱对极权专制的直接的政治冲击。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把反对权力腐败的事业变成为官员私利而展开的权力斗争的战场，既使权力斗争更加肮脏、虚伪，又使反对权力腐败，这个本来应当正义的事业，异化为政治阴谋——中共专制有能力把任何高尚正义的事业弄得非驴非马，不伦不类。而反腐败的政治阴谋化，不仅让社会大众对中共遏阻腐败的真诚性和能力丧失最后的信心，而且也在侵蚀中共官员对中共极权政治的忠诚和信心。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遭到江泽民整肃后，在狱中曾有一言：“‘六·四’事件，为维护党的根本利益，我不惜承担镇压学生的历史骂名。现在只是由于和江泽民个人之间的个人问题，我对他担任总书记的资格和能力提出一些疑问，就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党中央的领导集体居然也听之任之。这说明这个党已经没有了为党员主持正义的能力了。我的例子会告诉大家，以后能够相信的，只有手中的权力，而不是党中央。”——陈希同此言极其生动地表达出相当一部分官员对中共极权专制的沮丧心态。

江泽民、胡锦涛的鼠辈人格使中共权力斗争从社会化领域退回到宫廷斗争的铁幕后面，于是又有“中国问题专家”或者伪自由知识分子声称：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由于官员的大局意识不断加强而更注重相互妥协，激烈程度因此大大降低。这个判断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无知，便是有意为中共粉饰太平。

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权力斗争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加激烈——你不能说鼠类之间裂喉断颈、开膛破肚的拼死之搏，就不如狮虎之战激烈；事实上，除了风格不同，鼠类之搏的激烈指数比狮虎之战更高。因为，狮虎虽然更强有力，鼠类却更阴狠。当前中共官员的激烈权斗就充分显现出阴狠的风格。

胡锦涛主政以来，每年中共通过法律和党纪整肃官员的案例达数万起。这对于庞大的贪官污吏群体无异于九牛一毛，但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审视，其数量也足以怵目惊心——它说明了中共权力斗争的普遍性。而且被整肃者中，处死者日渐增多，长期徒刑者屡见不鲜；剥夺生命与自由，复之以剥夺财产，权力斗争可谓残酷性日增。残酷性源自于权力斗争的激烈。更应看到，昔日毛泽东、邓小平以政治罪名整肃对手，被整肃者尚有政治平反，重新崛起之望；今日以贪腐罪名进行权斗，一旦受到整肃，便永远失去平反的可能，沦入万劫不复之地狱。由此可见，鼠辈之凶狠，有过于虎狼者。说当今中共鼠辈狗官权斗趋缓，乃欺天瞒地之言。

四、独特的人格决定独特的命运 ——中共“第五代”的权斗将撞响中共的丧钟

所谓中共“第五代”，专指中共建政前后出生的一代官员；这代官员现在六十岁上下，将在二零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后，全面接掌中共最高权力，成为中共权力意志的主导者；其指标性人物包括习近平、李克强、薄熙来、李源潮、王岐山、刘亚洲、俞正声、汪洋等等。

少年人的心最柔软，但是，命运在少年之心上雕刻的痕迹却坚硬如铁；老年人的心都已变硬，不过，命运在老年之心上留下的痕迹却似轻霜浮尘，转瞬即销。所以，有哲人说，命运在一个人少年时代刻写出的人格特征，将决定他一生的生命价值取向。中共“第五代”少年时的独特的命运经历决定了他们的人格特征，其独特的命运经历就叫作“文化大革命”；而由这个命运所决定的人格，可以称之为“动荡的野心人格”。如果相信人格决定命运，那么，“第五代”二零一二年秋成为中共最高权力意志的人格载体之后，其“动荡的野心人格”便将决定中共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全面夺取刘少奇控制的党权和行政权而发动的社会运动。为实现其目的，毛泽东必须击溃刘少奇控制的党政系统，然后重建由他自己控制的党政系统。击溃由数量庞大的官员构成的党政系统是艰难的事。毛泽东从人民大众对中共专制官僚体制的强烈仇恨中，找到了摧毁既存的党政系统的力量。这种力量平时被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压抑在亿万人的心里，而毛泽东要释放这种力量。不过，毛泽东摧毁刘少奇控制的党政系统，并非要创建自由民主制度，而是要重建由他绝对控制的极权的党政系统。为此，毛泽东就必须把人民大众对党政官僚的仇恨释放过程，牢牢限制在马克思极权主义的政治范畴之内。

独裁者控制亿万人参与的社会历史运动，无非两途，即利诱或者理想主义的骗局。利诱可以在较长时间内发挥作用，理想主义的骗局则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掀起宗教式的社会狂热。而毛泽东当时需要社会狂热的瞬间爆发，一举击溃刘少奇及其党政系统的基础。

毛泽东是制造理想主义骗局的大师。他成功地让时代相信，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运动——在击溃刘少奇一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中国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并将用共产主义制度解放全人类。一时之间，中国被理想主义的狂热点燃了，而燃烧得最炽烈的便是少年人，因为，少年人最敏感。中共“第五代”当时正值少年，在上中学。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官员子女组成的“红卫兵”成为毛泽东的理想主义骗局和现实罪恶的主要表述者——用理想主义欺骗了理性和良知之后，这些“红卫兵”开始发泄凶残的兽性，大肆屠杀迫害“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

然而，毛泽东对中共“第五代”是残酷的。在充分利用他们的少年狂热冲垮既存的党政系统之后，中共“第五代”的绝大部分人的父辈又被毛泽东列为整肃对象，沦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其他类型的“阶级敌人”。于是，中共“第五代”转眼间由高贵的革命者变为反动的贱民，从理想主义的狂热跌入现实的冰水，从天堂进入地狱。这种命运的巨变即使对历尽沧桑的老人也残酷至极，更何况对于敏感似水的少年。他们的心被绝望血淋淋地撕裂了，而且那心的伤痕终生不会痊愈，并让他们以极其阴郁的目光看待人生。在此之后，虽然由于个人命运的偶然性生活道路有所不同，但是，

艰难困苦一直伴随着他们，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失败结束，他们的父辈，即曾遭受毛泽东严酷整肃的原中共高官，咸鱼翻身，重新掌权。

现在，这批遍历人生起伏跌宕，饱尝人间世态炎凉的少年，又以中共“第五代”的名义，准备问鼎暴政最高权力。他们少年时养成的人格将决定未来权力斗争的风格和形式，甚至直接影响中共极权的生死存亡。因此之故，未虑事，当先虑人——为准确预言中国政治走向，应当首先审视中共“第五代”的人格特征。故请容我将中共“第五代”的人格特征陈述如下。

“权力，权力，还是权力！”——薄熙来对其妹，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薄晓莹说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共“第五代”首要的人格特征，即一切为了获得权力，获得权力就是一切。这个人格特征的养成是基于少年时代的经历。

“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亲身经历或者亲眼目睹了太多家庭的升浮沉沦。只要失去权力，无论原来多么高贵显赫，也立即变成任人摧残侮辱的贱民；只要获得权力，即便原来是贩夫走卒，也会立刻拥有在别人的命运之上昂视阔步，践踏而过的资格。权力意味着真理，失去权力就失去一切。这种观念是命运用锐利的痛苦刻在那一代人骨头上的箴言。“六·四”屠杀之前，邓小平、陈云和薄一波等“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失去权力的中共元老，分别召集他们的子女商讨对策。结果，基于对再次失去权力的刻骨铭心的恐惧，他们的子女几乎一致支持血腥镇压学运的决策。为了权力，他们愿意让自己成为嗜血的魔鬼。当时，邓小平之女邓榕说：“与其又一次丢掉权力，沦落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状态，不如先流他们的血。”

至于李克强一类出身于一般官员或者官养知识分子家庭的中共“第五代”，对权力的向往更多的是基于贪欲。“文化大革命”中排斥一切的共产党文化，把唯物主义人生观注入他们的灵魂。在唯物主义的阴郁视野中，生命只有今世源于物性本能的欢悦，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他们，权力是尘世一切幸福的源泉。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书时，李克强就曾对同学如此表述他的“雄心壮志”：“成为权力的主人，也就成为世界的主人。要不然，只能作权力支配的小人物，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斯大林说，看政敌跪在地上讨饶是他最大的人生乐趣。我仔细想过，人世间还确实没有什么比斯大林的这个乐趣更诱人。”

心硬如石，不会被良知感动；血冷如冰，不再相信人有真情——这是中共第“五代”的第二个人格特征。理想主义破灭之后，人的血就会变冷，而且曾经的理想主义越炽烈，越真诚，对人生的绝望便越冰冷；经历过太多的情感和生活的苦难之后，心就会变硬，而且情感的苦难比生活的苦难更容易让心石化。理想的幻灭，情感和生活的苦难，正是中共“第五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典经历；他们的命运之路就蜿蜒在对人生、对人的真情和道德的绝望之中。他们有的坐过牢，有的为生活所迫而偷窃、抢劫。有的人甚至作出过毁灭人伦的兽行。当时，在其父薄一波以“叛徒”的罪名受到毛泽东整肃之后，薄熙来竟然痛殴其父，来表示对共产主义之神毛泽东的忠诚，以致于其母因此而心碎。薄熙来的经历虽然很典型，不过却并非个案。那一代人大都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痛苦，不同的只是痛苦的具体样式。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但是，心灵的惨痛留下的对人的阴沉绝望则如附骨之蛆，不可去除。这是丧失了相信真情和道德的能力的一代人。

蔑视规则，易于行险——这是中共“第五代”的第三个人格特征。“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特征之一就在于“礼崩乐坏”，秩序大乱。这是由毛泽东要摧毁刘少奇控制的党政系统的意志所决定。“文化大革命”已经湮灭于虚无，然而，其时代精神却以那个时代的少年人为生命载体，保存下来。同循规蹈矩，连笑容都中规中矩永远不变的胡锦涛相比，蔑视规则是中共“第五代”最鲜明的个性。在他们的视野中，获得和保持权力的政治实用主义高于一切，所有不利于他们获得和保持权力的规则，包括中共的党纪国法，都可以弃之不顾。

蔑视规则者必胆大妄为，少有顾虑，易于行险。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及其“[团派](#)”成功地阻止了对习近平的军委副主席的任命。过后不久，习近平访问德国时，竟代表已经下台的江泽民向德国总理问候并赠书。对于中共外交，这是极其严重的违背纪律的事件。因为，按照对等原则，习近平只应该代表中国的总理向德国总理问候并赠书。但是，习近平就要用这个“违背纪律”的行为，向胡锦涛示威，表明他同江泽民派系的亲密关系。另外，习近平还专门到中央党校一个军队政工军官研究班上搞了一个讲座，讲座前午餐时，他喝了半瓶茅台，讲座中他说：“... 我的父亲习仲勋曾任第一野战军的政委；我是将门之后，我同军队的联系不是什么人能隔断的。”事后中共高层有人就此评论道：“习近平发酒疯，胡锦涛喊‘头疼’”。

阴沉多谋，野心如炽——这是中共“第五代”的又一个突出的人格特征。“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性高度浓缩的时代，当时的中学生又曾是毛泽东用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敏感的政治性群体。从“文化大革命”继承的这种政治性，成为中共“第五代”的人格铸造者之一。极权政治就是阴谋政治；极权政治的人格象征必然以不断策划阴谋，作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所以，人格的极端政治化与政治局势的动荡，乃是因与果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又属于虚伪的理想主义漫天燃烧的时代。理想主义的烈焰黯然熄灭之后，留下的人格灰烬，便是炽烈的政治野心。永远不能安静，永远动荡，犹如暴风雨的海面；永远追求更大的权力，追求更加肆无忌惮地运用权力，就像大漠上不停的风沙——这种动荡的人格，是“文化大革命”留给中共“第五代”的魔鬼的遗嘱。

以上对中共“第五代”人格特征的讨论应当可以让历史明白，一个只相信权力的冷血的群体，一个不相信道德和真实情感的野心勃勃的群体，正在走上中共的权力之巅。他们与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代的鼠辈人格有明显区别。如果一定要用动物来比喻，则他们更像一群食腐肉的冷血的巨蜥，正阴沉地瞪视中共的最高权力。可以预见，从这种人格中涌现出的中共未来的权力斗争，至少有下列五项基本特征：

其一，中共的权力斗争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残酷和动荡；其二，宫廷斗争的形式将再次被冲破，权力斗争的社会化和重大历史事件化不可避免；其三，权力斗争将更具政治阴谋性，将采用更多的黑手党式的手段；其四，权力斗争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解决的可能性极大增强；其五，为取得权力斗争的主动权，向外军事扩张的可能性增强。

但是，由于中共“第五代”缺少毛泽东那种制造理想主义骗局的能力，中共的权力斗争对社会和民众已经不再可能有强大的理想主义的召唤力，所以，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三年，“第五代”接掌中共最高权力之后，恶咒般的权力斗争将变成撞响中共暴政丧钟的木槌，而中共的政治丧钟的铸造者，乃是以财富和权利的极端两极分化为核心的、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

第七章

中共内部权斗和社会危机的交互作用

——偶然性与必然性导演的戏剧

一、引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中共未来前途的预测，有两条典型的错误思路。一条思路是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主要寄托于中共主动放弃专制，自我改良；另一条思路是把中共极权崩溃的希望主要寄托于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的激烈化。“六·四”屠城之后，中共已沦为政治黑手党，并开始用极权政治和警察国家的最堕落的方式，即特务统治来维持政权，彻底丧失了政治改良的意志和政治能力。指望中共主动进行民主化改良，就像期待魔鬼会变成上帝一样荒谬。但是，以为单靠中共内部权斗就可以导致中共暴政崩溃乃是另一种幻想——中共权力斗争没有那样巨大的创造历史能量。

必将把中共推出历史进程之外的基本力量，乃是以财富和权利的极端两极分化为中心的社会矛盾；更准确地说，是发展到极端的社会矛盾的政治意志化。

此前我们讨论中曾提到，毛泽东、邓小平先后主政期间，权力斗争有数次使中共专制濒临大崩溃的边缘，只是由于偶然性的垂爱，中共才得以避过劫难，继续存在。不过，一次又一次偶然性后面，我们应该看到某种必然性的阴影，即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社会矛盾政治意志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中共内部权斗还难以产生引发中共极权政治崩溃的效应。

所谓社会矛盾的政治意志化，一言以蔽之，就意味着绝大多数民众都意识到，中共暴政是一切不公正、不正义的根源，是社会悲剧和社会罪恶的根源；彻底废除中共一党专制的极权政治，是重建法律正义和社会公平的政治前提。

社会矛盾的政治意志化，乃是民众民主政治意识的觉醒。然而，毛泽东、邓小平先后主政时期，绝大部分民众还在中共制造的政治谎言中沉睡，中共还有欺骗社会和时代的政治能力。所以，仅凭激烈的中共内部权斗，不足以从实质上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极端化和政治意志化已成必然的趋势，中国的社会矛盾爆发的必然性，只是在等待一次偶然性的机遇来触发。如果按照中共政治逻辑的自然发展，这个偶然机遇将来自中共“第五代”全面掌握最高权力后的中共权力斗争的激烈化；如果胡锦涛统战灭台的政治战略遭遇重大挫败，这个偶然性机遇将可能在二零一二年出现——这是本章讨论将得出的判断。

为使读者更清晰地理解上述判断，本章还会对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中共权斗对极权体制的侵蚀，以及当前一个时期，即二零一二年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前，中共权力斗争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出具体分析。

就在全世界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小政客都热衷于谈论关于“中国崛起”的话题之际，正当国民党权贵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政治前途拴在中共的裤带上，而马英九急于通过签订ECFA把台湾的经济命运的控制权交给中共之际，中国的社会矛盾已如狂风暴雨过后

三峡高坝内的蓄水，波澜动荡；只待中共权斗的一道雷电，划破铁幕，殒裂大坝，社会矛盾的大洪水便会汹涌而下，如天河倒倾，一泻万里，淹没历史。

中共的最后崩溃将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导演的戏剧——必然性来自财富和权利极端两极分化的社会大危机；偶然性来自中共内部权斗的再次社会化。

二、当代中共权斗如何蚀裂极权体制 ——没有公正规则的竞争

本质上，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是以权力贪欲为基本动力的、没有任何公正文明规则的竞争；这个竞争只遵守兽类的丛林法则，即弱肉强食——最残忍、最阴险、最无耻者，再加上命运的赐福，便成为胜者。不过，中共总是竭尽全力，用政治理想主义的谎言掩饰权力斗争的本质，以证明极权政治的合理性。随着共产主义政治道德基础在实践中的崩溃，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共权力斗争的本质越来越清晰地从谎言后裸露出来。没有公正文明的规则为标准，任何竞争都意味着丑陋人性的搏斗，而中共权力斗争中的人性则有时丑陋到荒唐至极的地步。为了让读者对中共权斗的本质有直观的理解，试举成克杰案例如下。

成克杰，原广西政府主席，后升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因贪腐的罪名被中共处决，成为中共历史上以贪腐的名义受到处决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其实，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共都在执行一个绝对保密的内部规定，即纪律检查委员会无权管辖涉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案件；三副（指国家副主席、副委员长、副总理）以上官员，不得判处死刑。这个规定实际上使中共政治局常委九个人组成的寡头集团，拥有超越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也使所谓“三副”获得免死金牌。成克杰官至副委员长却被处死，并非由于其罪行严重，而是由于江泽民批示，要求判处成克杰死刑。

成克杰临刑前写成的“生平自述”中，披露了他被判处极刑的原由。数年前，江泽民的情人，歌星宋祖英到广西游玩。成克杰的情人李成设奢华之宴，招待无冕之国母宋祖英，希借机攀龙附凤。然而，世事难料，风云突变。宋李二女皆好酒而少量，且复骄横泼辣；数杯之后，一言不合，便生寻衅之心。宋祖英放言：“你家成克杰的官还不是老江赏的。我只要一句话，就可让老成丢官——看你还能仗谁的威风？！”李成回敬道：“我家老成官虽小些，却是真男人，不像你家老江，连胡子都没几根，去演李莲英最合适。”

酒醒之后，李成自知可能妄言招祸，遂将此事诉于成克杰。成克杰不免用红颜祸水之话责备一番。但成克杰毕竟是有情有义的真男子。李成一旦泪下如带雨梨花，成克杰便生怜香惜玉之意。于是，二人合谋，共商善后之策——正是从那时起，成克杰才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资产，以图寻机远颺避祸。殊不知，成克杰善后之举，不如江泽民报复之行迅速，遂致成擒，并遭处死。

成克杰在其“生平自述”中指称，江泽民是鼠肚鸡肠、睚眦必报、阴狠恶毒的小人。此份“生平自述”被列为绝密文件。然而，能令人大感兴趣者自有“不胫而走”之能；成克杰“生平自述”的内容早已成中共官场佐餐之上品谈资。其令人感兴趣之处不在成克杰恋情之悲剧，而在中共权斗的荒唐与残酷。我们至少能够从下述几个视角看到，没有公正规则的权斗正在如何侵蚀中共极权政体，涣散中共官员对暴政前途的信心。

第一个视角。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中共权力像印度夏天炎日下路旁的死牛，不仅无可阻止地迅速腐烂，而且腐烂入骨。权力的普遍深度腐败已经构成中共暴政的一种政治危机之源。为巩固中共执政地位计，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权力腐败之速度，以缓解政治危机。但是，现在中共的反腐败已经成为权力斗争的最主要的形式，反腐败是为击败权力斗争的对手；权力斗争的失败者被冠以腐败的罪名，陷入政治的绝境死地，而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则会控制更大的腐败权力。上述情况引发下列三项效应：

其一，反腐败的目的不在于彻底清除造成权力腐败的机制，而在于致权力斗争对手于死地。目的虚假性决定了过程和措施的低效率，即中共的反腐败的行为和措施不可能具备有效遏制腐败，缓解中共政治危机的能量。

其二，由于“反腐败”是贪官污吏之间权力斗争的对决，而获胜的往往是斗争中更狡猾、更强悍的一方。所以，一种恶性循环便不可避免——每一次反腐败行为都是更具腐败能力的贪官获胜，而获胜的贪官又会进一步强化腐败的程度。如此一来，中共的腐败可谓雪上加霜，霜上复雪，不断循环，持续深化，直至末日。

其三，数千万中共官员现在基本都沦为一听到金币的撞击声就会亢奋起来的动物，权力斗争的胜败相当程度上要取决于斗争双方的经济实力。官员增强经济实力只有一途，即充分有效地运用腐败权力。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反腐败越激烈，表明中共内部权斗越激烈；权斗越激烈，中共官员便越要强化运用腐败权力的力度，以便为权斗中获胜积蓄更大的经济能力。经过上述中共政治逻辑的运行，反腐败行为为不仅不具有遏制腐败的效应，反而成为权力腐败的加速器和倍增器。

事实上，中国民众早已看透中共反腐败的虚伪本质。尽管每日每时都生活在腐败权力的沉重阴影下，中国民众对中共的反腐败却十分反感。因为，中共的每一次反腐败都必然伴随着一大批官员的轮换——权力斗争的直接失败者进入地狱，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则接管失败者的腐败权力。而中国民众把原来在职位上的官员称为“吃饱的野狗”，把新换上来的官员称为“饥饿的野狗”。显而易见，吃饱的狗贪腐起来不会达于疯狂的程度；被饥渴的鞭子抽击的狗，则会把腐败权力运用到非理性的极致。

第二个视角。古诗者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对于理解中共的大危机，这句诗并不适用。相反，由于政治铁幕的遮蔽，现在最清楚中共统治危机的恰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群体，而不是从铁幕之外观察的“中国问题专家”。

中共官员的命运只能随权力腐败的惊涛骇浪沉浮，而没有公正规则的权力斗争，又在推动腐败的洪流难以挽回地涌向政治的断崖绝壁。因此，中共官员人人皆有贰志，个个均思大厦倾颓时作鸟兽散之策；末世心态之下，醉生梦死之余，用腐败权力攫取更多财富，以备善后之用，已成中共官员的共识。

中共官员不懂富民强国之大计，却深谙狡兔三窟，未雨绸缪之策。据中共组织部二零零九年的一份内部调查报告所载，现在，中共县处级以上官员在海外经商、留学、移民的直系亲属，数量达一百零八万。参与此项调查的良知人士透露，如果把官

员的情人、密友算上，仅县处级以上中共官员与海外联系的私人管道的数量，至少达到五百万人。

所有来到海外的中共官员的直系亲属、情人、密友，都具有一项功能，即替官员设立海外账户，从而为官员用腐败权力攫取的财富开拓安全的储存方式。对于中共极权，最绝望之处在于，中共最高决策机构，即中央政治局的官员，都几乎人人通过亲友、情人在海外设立了账户；中共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即中央军委的委员，亦是如此。国外媒体已有报道的如[曾庆红](#)之子曾伟、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只是其中沧海一粟。为透露上述信息者的安全考虑，其它相关名单，我们暂不公布。

据知情人介绍，数年前，曾庆红之弟曾庆怀到新西兰，找一位从中国移民的商人，商讨向海外转移资产之事。一日晚宴时，喝过一瓶五千美元的葡萄酒后，曾庆怀以一言生动表述出中共高官的心态，他说：“江泽民和我哥他们也都是人。大家都知道中国迟早出大事，那要比‘文化大革命’还乱。江泽民和我哥他们自己倒已经无所谓了，但是他们也要为子女，为家人着想，作点准备。”

第三个视角。没有公正规则的权力斗争必然引发官员帮派化的后果，而官员的帮派化是对中共组织体系的强烈的腐蚀剂。中共高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却由于形格势禁，而无可奈何。胡锦涛的亲信幕僚令计划私下曾对组织部官员说：“遍揽天下人才当然是理想的用人方法，但在现实中往往滞碍难行，所以，锦涛总书记只能用他熟悉、了解的人。”胡锦涛正是通过强化他的“团派”，来结成政治死党。他对李克强和胡春华的态度，乃是对此的经典证明。

河南由于卫生系统工作人员为卖血农民抽血时，长期重复使用一次性针头，导致爱滋病大爆发，十余万罹病农民被封闭在“爱滋村”中等死。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民是为给子女交纳大学学费才不得不卖血，却因此患上“爱滋”这种风流病。此中之悲情，真可令苍天欲哭无泪。当其时也，李克强正任河南省长、书记。他不仅没有为此承担责任，反而一路攀升，终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胡春华原乃河北省长。三鹿毒奶粉即出自他之治下。尽管毒奶粉丑闻天下震惊，举世声讨。但胡春华却安然无恙，官运亨通；“毒省长”升任内蒙古书记，且被培养为中共“第六代”最高权力的接班人。

胡锦涛就是要通过对待李克强、胡春华的态度，让中共数千万官员明白，是否忠实于他，是能否掌握更大权力的唯一标准。这样作虽有利于胡锦涛凝聚个人死党，却使拉帮结派成为中共官员遵循的基本政治逻辑。

官员队伍的极端帮派化，必定导致政令不通，管治效率降低的后果。不过，这不是最主要的危险。官员中之庸俗猥琐者，拉帮结派只为个人自保，其对中共的危害尚不致命。中共官员中也有一批自命不凡、野心勃勃之徒。他们洞悉中共大危机、中国大动乱之前景。为趁乱世行枭雄之事，甚至问鼎中原，执天下牛耳，他们一方面在党政官员中拉帮结派，培植党羽；一方面渗透军队，并广泛结交社会上的经济实力人物。一旦有重大事变出现，必将有众多地方势力趁机而起，退则地方自保自治，进则志在天下。上述这种趋势，对中共极权的生存才构成真正的危险。

按照定制，中共省级第一书记兼任省级军区第一政委；省公安厅厅长兼任武警总队第一政委。省级军区虽一般只有不足一营的常备正规军，却管辖数个预备役师；省

公安厅厅长的任命也主要由省第一书记掌握。二零零五年成为军委主席之后，胡锦涛要求军队的情报系统和国家安全部，严密监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书记同各省军区和武警总队之间的关系，并定期直接向他汇报。显然，胡锦涛对于官员帮派化可能产生的最坏后果有一定预感。近年来，各省级第一书记同军队和武警部队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种现象已引起中共最高层的严重不安。不过，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评论：各地党政军首长联络日益密切已成普遍现象；各地官员均拉帮结派，为中共大崩溃作预后之计，其势不可遏制。胡锦涛虽有警觉，也是于事无补。

历史会记住，从江泽民主政起，胡锦涛继之，凡中共七名或者九名常委组成的寡头集团在聚光灯下亮相时，都必涂黑漆于白发之梢，以示青春活力。不过，看到几个六、七十岁，早已过更年期的老男人，却头发茂盛如怀春少妇，头发墨黑胜花季少年，不免有妖异之感。古有谶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今妖异之徒齐集中共权力之巅，莫非在向世人展示中共暴政将亡之相？

三、中国社会大变革 ——条件成熟得只需要一个历史机遇

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其标志就是社会矛盾的极端化和政治意志化，即中国人不仅普遍意识到，中共暴政是社会不公正和人民苦难的政治根源，而且开始寻找改变现状的政治道路。对此，我在本书其它相关章节已作过正面论述。在这里，我愿和读者一起，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中国社会变革条件的成熟度。这个角度就是，极端的社会矛盾所引发的中共意识形态的大分裂。

当代国际上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真正注意到一个即将对中国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现象——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开始以“新左派”的名义复活，并从一种思潮转化为明确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存在。这种复活和转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一定生命力的现实进程，就在于社会矛盾的极端化；同时这种复活和转化也是社会矛盾政治意志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当年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旗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理论至少有两个要点：其一，将他要击败的权力斗争的对手刘少奇等人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断言，这类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一旦得逞，中国人民将再次遭受苦难；其二，他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从而为粉碎刘少奇、邓小平控制的党的系统，重建由他自己控制的共产党设立理论根据。

毛泽东死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整肃的官员全面复辟，对毛泽东培育起来的政治势力进行彻底清洗，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也被全面否定。不过，由于邓小平历史上追随毛泽东实施了一系列反人类、反历史的政治行为，因此，如果完全否定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就等于否定邓小平自己。所以，邓小平和中共只否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对毛泽东的其它理论和政治实践依然加以肯定，毛泽东的尸体也依然作为中共的圣物，保留在天安门广场上。

以邓小平为思想起点的中共权贵市场经济改革，实施二十多年，造成社会财富和权利的极端两极分化，以及普通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霉迹斑斑的尸体带着他的“文化大革命理论”，走出水晶棺，复活了；“新左派”则是他的代言

人。“新左派”指出：毛泽东当年就预言过，刘少奇、邓小平一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旦成功复辟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将再次遭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现在，中国人民的苦难和社会正义完全倾颓的现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

从毛泽东到“新左派”，他们关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指控都是虚假的。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并非向往资本主义，而只是要取代毛泽东，控制极权专制的最高权力；邓小平以及江泽民、朱镕基也不是要实行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为强化中共一党独裁的极权体制，使经济体制由原来的官权计划经济，转化为权贵市场经济；当代中国的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也不能归罪于中国根本不存在的自由资本主义，而应当归罪于中共极权专制，以及与专制政治相适应的权贵市场经济。

但是，“新左派”对于当前中国工农的苦难、社会非正义异变、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破坏等现象的揭示，却极其直接、客观、深刻、具体，具有令人惊心动魄的真实的力量。另外，“新左派”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当今中共的权贵阶层，指控他们背叛了共产党，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甚至公开号召人民应当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当然，“新左派”对中共权贵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指控并不真确，然而，“新左派”关于推翻中共权贵阶层的统治的呼唤，却在中国民众心底里激荡起巨大的政治回响。

中国社会已经陷于绝望之中。从杨佳不肯忍受警察的侮辱，手持白刃，闯入警局，从一楼杀至七楼，如入无人之境，力刺近十名狗警，到邓玉娇为维护人的尊严，纤纤玉手握修脚之刀，杀逼良为娼之狗官；从越来越多受到贪官污吏、奸商恶贾欺凌的民众引火自焚，到连绵不断发生在幼儿园和小学校中的屠童事件，都在表述社会对中共暴政的绝望。

绝望并不是黑暗、荒凉的领域，而是充满巨大能量的范畴。社会绝望之中，压抑著对中共权贵的炽烈仇恨，压抑着推翻中共权贵阶层专制的强烈意愿——彻底的绝望，正是社会大变革的起点。“新左派”对中共权贵市场经济及其社会后果的严峻批判，表达了广大民众对中共权贵阶层的愤怒和仇恨；“新左派”关于推翻中共权贵统治的呼唤，在社会绝望之上点燃了希望之火。虽然“新左派”提出的毛泽东式的理想社会目标既是对历史的歪曲，又是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乌托邦，不过，绝望的中国民众首先关注的不是未来的目标，而是彻底否定现在的中共权贵阶层的批判与召唤。在这个意义上，“新左派”正在中国民众中赢得日益强化的影响力。

反观中国海内外民运，不仅人员凋敝，内斗日炽，而且政治意志软弱如泥，很少有人敢如“新左派”那样明确提出推翻当今中共权贵统治的政治呼唤。[中国民运](#)尽管以[自由民主](#)为社会目标，但是却又由于入骨之奴性，希望同中共暴政和解，要求宽恕中共权贵的反社会罪行，甚至愿与中共权贵阶层和谐共生。[中国民运](#)对当今中共权贵阶层的软弱态度，背叛了中国大部分民众对中共暴政正义的愤怒和合理的仇恨，也背离了未来中国大变革的基本趋势。

中国民运的社会目标正确，但是却由于背叛中国民众的现实情感，而失去在大变革中抓住政治机会的能力；“新左派”的社会目标荒谬并且根本违背人性，然而，却因为与中国民众对当今中共权贵阶层的愤怒和仇恨一致，而拥有获得现实政治机会的能力。现在，中国民运中的一种思潮正在崛起，即通过全民总体反抗和民主大革命的方式，彻底否定中共暴政，创建[民主宪政](#)的联邦中国。不过，命运还会不会给民主大革

命思潮以足够的时间，从“新左派”手中夺回中国底层民众的情感信任，则仍然是一个历史的疑问。

“新左派”已然作为具有完整的政治要素的力量，走上中国历史的地平线：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是其思想基础；“乌有之乡”、“毛泽东的旗帜”等网站是其宣传阵地；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推翻当今中共权贵阶层，是其政治意志；二零零八年成立的“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其政治组织形式，二零零九年成立的“中国工人党”，是其外围组织；北京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大培、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以及军中鹰派人物戴旭等一批专家学者，构成其理论家群体。

“新左派”的崛起，预言著中共极权政治从思想理论到组织的大分裂。对于中共暴政，最危险之处在于权贵阶层不敢以决然的手段应对“新左派”的政治挑战。中共当局可以毫不犹豫地关闭任何宣扬自由民主的网站，却不敢屏蔽“乌有之乡”，尽管“乌有之乡”大量刊载揭露批判当今中共权贵阶层的罪恶的文章；中共当局可以用铁血手段镇压任何组党活动，却不敢公开宣布取缔“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党”，尽管“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几乎公开指控，当今掌权的中共官僚集团中的大多数，是必须打到的“资本主义改革派”。中共权贵阶层之所以对“新左派”投鼠忌器，关键在于“新左派”自命是毛泽东政治思想遗产的正宗继承者，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神的地位并没有被真正击垮——“文化大革命”失败后，邓小平出于私利和维护中共整体政治道德形象的考虑，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现在，毛泽东的鬼魂则要借“新左派”之手，对邓小平掘墓鞭尸了。

“新左派”主要由下述各类人士构成：

其一，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这部分人是“新左派”的思想策源地。“六·四”之后，邓小平利用物欲引诱，很快就形成腐败的权力、罪恶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这三者的铁血同盟；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背叛了真理与良知，为物性贪欲的满足，出卖灵魂，成为中共权贵阶层的附庸。而少数知识分子则以毛泽东主义的名义，担当起批判现实的责任，如张宏良等。现在还不清楚，他们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批判当今中共权贵，是基于愚蠢的理想主义，还是出于下述这种精明的策略考虑——利用毛泽东之名，反对当今的中共权贵，使中共暴政难于下决心对其实施严酷的镇压，因为，毛泽东是暴政的奠基者。

其二，某些中共的中高级官员。他们良知尚存，道德未泯，对中共权贵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后果深恶痛绝，故而奋起批判。只可惜他们一生积累的最主要的理论，都是马克思和毛泽东主义洗脑的结果，所以，除了用“文化大革命”理论批判现实之外，他们实在没有能力用自由民主思想表述他们可贵的道德良知。

其三，“文化大革命”失败后受到整肃的各类人士。“文化大革命”对于他们是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然而那种“理想主义”意味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苦难和血腥的社会悲剧。不过，他们对当今中共权贵的批判和诅咒往往也最尖锐，因而最接近真正的现实——历史有时就是复杂到这样荒谬的程度。

其四，某些对中共的反人类本质有清醒认识的人士。他们参加“新左派”并不是想重现“文化大革命”，而是试图推翻中共权贵的极权统治。他们借毛泽东之名，行反对中共极权之实，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中共暴政镇压的锋芒。

“新左派”目前还不是中国思想政治派别的主流，但是，中共体制内的各种派别，从胡锦涛到江泽民，从刘少奇家族到邓小平家族，从军队的精英刘亚洲到地方枭雄薄熙来，睡觉时都用一只眼睛盯住“新左派”。因为政治直觉告诉他们，随着社会两极分化的不可阻遏的发展，“新左派”的政治能量必将迅速增强；他们可以蔑视不成气候的中国民运，却不能不注视“新左派”。

“新左派”的主要能量来自于社会对权贵市场经济后果的强烈愤怒和仇恨。不过，对于中共极权政治，最可怕之处在于，“新左派”思潮的崛起象征著中共思想理论的大分裂；“新左派”关于打到当今“资产阶级改革派”，即中共权贵阶层的号召，意味着中共政治意志的大分裂；“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共组织的大分裂，以及中共的党禁铁幕被撕裂——更重要的是，中共权力体系内部的各个派系，对于“新左派”给中共造成的潜在危险，均持观望的态度；每一个派系都不愿承担镇压“新左派”的罪名，许多派系甚至企图利用“新左派”作为权力斗争中打击对手的利器。在中共各掌权派系的首鼠两端之下，“新左派”则获得了它原本没有的政治能量。

“新左派”是从社会矛盾的激化中获得生命力的。以社会矛盾造成的中共极权政治大分裂前景为根据，来审视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可能比直接审视社会矛盾本身更接近准确的判断。因为，中国社会大变革，必须起步于中共的大分裂。太多的社会矛盾激化的现象一次又一次表明，大变革的社会矛盾条件已经成熟，成熟得只需要一个历史机遇。这个历史机遇的内容就是：中共权力斗争再次激化，并冲破宫廷斗争的范围，表现为重大社会事件。

然而，历史机遇何时才能降临？——对于这个天意民心都在焦灼期待答案的问题，我们将在紧接下来的文字中加以讨论。

四、当前中共权斗的基本态势 ——现实在预言未来

无论荒野中，还是中共铁幕之内，时间都在表述即充实又虚无的存在。不同之处在于，荒野中，时间由风来充实；中共铁幕之内，时间则由权力斗争来充实。

二零一二年秋至二零一三年春，是中共内部权力转换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期间，中共要通过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完全控制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启向中共“第五代”交付党政最高权力的政治进程。对于中共极权体制，重大的权力交接既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另一次权力斗争的起点。围绕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间的权力交接的斗争，早已成为中共铁幕政治的主题。现在，已经进入中共权力角斗场的，主要有江泽民帮派、胡锦涛帮派，以及薄熙来帮派。

江泽民主政近二十年，对官员实行利益均沾，共同腐败的政策，迅速使中共数千万官员整体极度腐败，并在党政军各系统培植起由众多贪官污吏构成的江氏帮派体

系。江泽民退休后，其帮派虽然开始衰败的过程，但是，毕竟有二十馀年的根基，仍然具备展开权力斗争的强大实力。

当前，江泽民进行权力斗争的目的，在于保障其家族的政治和经济安全。

江泽民对于自己政治安全的忧虑主要来自“新左派”。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二零零八年“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之后，江泽民曾给中央常委写过一封信，江泽民在信中说：“所谓‘新左派’表面上是针对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实际上是针对邓小平同志和我党的改革开放路线。中央如果对‘新左派’采取暧昧不明，甚至姑息纵容的态度，将遗祸无穷。再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动乱不是不可能的。... 希望中央的同志们能够清醒认识，我们是一条船上的，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共克时艰。对‘新左派’采取任何机会主义的作法，都只能害人最终害己... 。”

在中共官员的心目中，所谓家族的经济安全就是指，本人或其家族成员利用腐败的权力积累的财富的安全。江泽民也不例外。上海书记陈良宇之子在其父被判刑一年之后，对友人讲了一件事。五年前，他向江绵恒请教，财产转移到哪个国家最安全——澳洲、美国，还是加拿大。当时，江绵恒对他说：“还是让你爸把权掌好吧。我爸说过了，有权，钱在哪儿都安全；没有权，钱在哪儿都不安全。”最后，陈良宇之子痛心疾首地说：“还是江主席英明。现在，我爸没权了，我也就基本成穷光蛋了。”

为保障其本人和帮派成员的政治和经济安全，江泽民要确保[习近平](#)在中央十八大以后掌握党的最高权力，力争由张德江或者俞正声出任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而且一定要由他的亲信死党担任上海市委书记。

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胡锦涛权力斗争的具体指标如下：在中共十八大上只交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两个职位，继续保留军委主席一职，即继续掌握军权；由李克强任总理，率领“团派”和“北京大学帮”的一批成员，如内蒙古党委书记胡春华、中共组织部长李源潮、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新疆书记张春贤、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丰、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宁夏自治区原副主席张来武、宁夏自治区检察长王雁飞、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等等，逐步全面接管国务院；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出任常委，掌控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或者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

胡锦涛要通过这次权力斗争过程，全面巩固其个人的权力基础。如果成功，不仅他的儿子、女婿的贪腐罪行不可能受到追诉，他的家族的经济安全获得权力保障，而且他还可以进一步实现其权力野心，并确保其政治安全。

中共统治西藏六十馀年，对藏人实行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自一九八九年起直至今天，屠杀和镇压藏人的首犯便是胡锦涛。胡锦涛完全清楚，藏人只要得到伸张正义的机会，他就难以逃避大屠杀罪的追诉。所以，为个人的“政治安全”计，他也要在二零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之后，亲自主持解决西藏问题。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标志，就是迫使印度政府驱逐西藏流亡政府——如果外交交涉不能成功，便运用军事战争的方法；相关的外交运作在解决台湾问题之后马上全面展开，入侵印度的军事战争时间定在二零一六年，中印边境的领土争议则是战争的理由。

当然，胡锦涛进行权力斗争的最重要动力还是对权力的贪欲。如果二零一二年中共十八大胡锦涛能够保住军委主席之职，二零一六年对印作战开始之后，只要战争状态持续一年以上，胡锦涛甚至可以找到在中共十九大之后继续控制军权的理由。——这并不是对胡锦涛心理的推测，而是令计划为胡锦涛所作的权力规划。胡锦涛被糖尿病阉割了酒色的能力，其子胡海峰却是酒色之徒。京城一位车模对朋友透露，二零零九年杏花盛开之际她侍酒时，胡海峰酒后狂言道：“你好好跟着我，就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爸掌军权会掌到八十岁，过了‘十九大’... 令计划都计划好了——我爸真没白养这条狗。”此正可谓“酒后吐真言”。

当前，中共权力斗争仍然借“反腐败，惩贪官”之名进行。尽管江泽民帮派的人员在中共决策层政治局里占多数，但是，由于胡锦涛通过何勇架空贺国强，控制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实权，数年以来，胡锦涛派系，借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力，用贪腐罪名威胁和整肃江泽民的嫡系，可谓屡战皆胜，连下数城——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几至丢命，黄菊死后险遭“鞭尸”，陈良宇沦为囚徒，韩正噤若寒蝉，陈至立、黄丽满丢官失位。近日通过“深圳航空公司”贪腐案，江泽民的爱将张德江受到牵连，很可能对他在中共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升任常委，进入最高决策层产生不利影响。

面对一系列失利，江泽民帮派已经意识到，在专门负责查处贪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被胡锦涛控制的情况下，继续把权力斗争的形式限制在反贪腐的名义下，就意味着继续失败。据受到整肃的前上海高官的家族成员透露，江泽民、曾庆红等人已决定改变权力斗争的形式，即不再把反贪腐作为整肃权力斗争对手的唯一和主要的手段，而要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给权力斗争披上政治意识形态的外衣。江泽民帮派正在等待机会，用政治问题给胡锦涛致命一击。他们等待的机会就是胡锦涛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受挫。

江泽民主政时，中共决策以军事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胡锦涛全面接管权力之后，为不给江泽民培植的军中势力通过解决台湾问题“建功”的机会，决定用“统一战线”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政治欺骗、利益诱惑、感情拉拢等等这一套，正是胡锦涛的“团派”所专精。不过，江泽民帮派不相信胡锦涛的对台战略能够成功；他们认为胡锦涛对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控制台湾的能力估计过高，不用强大的武力进攻，二零一二年根本不可能控制台湾。曾庆红实际已经半公开地向胡锦涛发出挑战。在二零一零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有众多退休高官出席的场合，曾庆红当众说：“胡锦涛等著二零一二年台湾这个馅饼从天上掉下来，我也等著看掉下来的是什么——是馅饼，还是冰雹。... 《台湾大劫难》把他那点儿心思都给露出来了。连保密的能力都没有，还想建不世之功。真是笑话。”曾庆红幸灾乐祸之情真是难以自抑，溢于言表。江泽民帮派准备于二零一二年对台湾统战失败之际，以“错误决策，严重损害统一大业”的政治罪名，向胡锦涛发难。胡锦涛帮派则一方面继续用反贪腐的罪名整肃政敌，另一方面也开始筹划利用政治罪名，在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向江泽民发动决定性反击。

据中共中央党校良知人士透露，胡锦涛帮派由令计划负责，正对一个政治方案作出评估，即一定程度上利用“新左派”，把中共二十年来深度腐败归罪于江泽民的“资本主义复辟路线”，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效应。胡锦涛利用“新左派”的可能性，也正是“新左派”在中共极权特务统治之下能够生存发展的深层政治原因。

让权力斗争脱下反贪腐的外衣，穿上政治意识形态的战袍——江泽民和胡锦涛正分头策划的这种权力斗争阴谋，意味着把中共极权引向前所未有的政治凶险。用反贪腐的名义和虚假的法律程序作为权力斗争的形式，还能够把权力斗争限制在宫廷铁幕的范围内；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名义实施权力斗争，则权力斗争的效应必将冲破宫廷铁幕，演化成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这早为毛泽东、邓小平主政时期权力斗争的规律所证实。而无论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不具备毛泽东或邓小平那种掌握局面的铁腕和政治能力。在中国社会矛盾已如满引之弓，蓄势待发的情况下，江泽民、胡锦涛谋划的权力斗争政治化，实在是要把中共极权推上崩溃的边缘。然而，这两个庸人俗物均不能计及此，也可谓利令智昏。

就在江泽民和胡锦涛还在谋划之时，一个人却开始了一次有限度地把权力斗争从单纯的反贪腐领域推向政治意识形态的实践。此人便是薄熙来。

中共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薄熙来遭遇“滑铁卢”，由商务部长被贬至重庆任书记。究其原因，全在于他的人格。薄熙来此人，阴狠凶残、诡诈多变之名远播，“[太子党](#)”中人称其为“小曹操”。所以，江泽民和胡锦涛派系均对他有防范之心。如此一来，官运自然诸多波折。

薄熙来任职重庆后，显现豺狼之性，绝地反击，以反对腐败权力和黑社会势力相勾结之名，对其前任汪洋培植的官场势力进行全面整肃。几百名官员受到清洗，汪洋执政重庆期间的明星官员文强，竟至被处死。与此同时，薄熙来在重庆建起中国最高的毛泽东像，在全社会推行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色歌曲”的政治活动，从而与“新左派”思潮形成不言自明的默契。中共官场对此评论道：“薄熙来在重庆搞了一次小‘文化大革命’”。而薄熙来此次整肃胡锦涛的亲信汪洋在重庆的党羽，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大获全胜，端赖他借毛泽东之名和大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歌所营造的“政治优势”。薄熙来此战成功，既使他及其党羽成为中共权力斗争中新崛起的一派，又极大强化了权力斗争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趋向。薄熙来的动态不仅引起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警觉，而且刘少奇和邓小平家族的成员，也强烈意识到“新左派”的政治威胁，并开始策划应对未来权力斗争全面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

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有如尾巴被顽童拴上点燃的鞭炮的驴，疯狂奔向最后爆发的临界点；中共官僚集团各派系则正砺兵秣马，准备为权力而作生死之决。如果说内部权力斗争是上苍对中共的恶咒，那么，这个恶咒又一次开始为中共倒计时——时间就确定在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之间。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江泽民帮派和胡锦涛帮派将有一次大碰撞；更重要的是，中共“第五代”全面进入中共最高权力领域之后，中共内部必将发生震撼社会的重大事变。至于最后谁能抓住这次机遇——是自由民主进程在中国起步，还是“新左派”把中国引向动乱，或者中共权贵阶层通过向外全面扩张，转移矛盾，躲过大危机——现在只能尽人事，以待天命。

台湾大国策 八：台湾必须走出历史的阴影

第八章 台湾必须走出历史的阴影 ——以[自由](#)的名义

一、引言

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族群像台湾人这样，一方面前途波诡云谲，凶险万端，而另一方面其执政者却刻意把前途描绘成锦绣一片，光明无限。波诡云谲之处在于，上天都难以确定，中共极权体制将由于权力斗争引起的社会矛盾大爆发而如前苏联帝国那样颓然崩溃，还是通过对外扩张，转移矛盾，造成人类大劫难；凶险万端之处在于，中共已确定把控制台湾作为全球扩张的第一步，并把时间定在二零一二年底，而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激化，很可能要到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六年之间，才会造成中共极权难以承受的重大事变。

更令人感到波诡云谲、凶险万端的是，台湾总统马英九对这一切竟都视而不见，并宣称只要循他的全面投降中共的路线走下去，台湾将进入“黄金十年”。无论马英九如此作为是基于政治白痴的愚蠢，还是出于奸猾政客的背叛，其结果都使台湾的前景更加诡谲难测，凶险莫名。

面对艰难的命运，人无非有两种态度：或者听天由命，如残花落叶任凭命运之风拨弄，或者像贝多芬那样，一定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创造出将在历史苍穹中回荡千年不绝的音乐；台湾人如果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则会创造出自由的哲理和英雄的史诗。

为控制并主导自己的命运，台湾需要大英勇、大智慧——需要大英勇和大智慧铸成的大国策。在中共铁血强权的逼迫下，尤其需要如此。只求诸于智慧而缺少英雄人格的国策，定无战胜命运所必须的锋芒，只能沦为小政客的鼠窃狗偷之计，如马英九之流便是如此。只有英勇悲壮之气，而少势如海雨天风的大智慧，此国策定然与匹夫莽汉之勇一致，不可能具备征服命运所必须的策略运筹。

对那些在凶险的命运前听天由命者，我默然无语如枯木。但是，我愿为救台湾保自由筹谋大国策，以助已经往生和依然活着的高贵的英雄——往生者，如郑南榕，由于把自己埋葬在金色烈焰之棺中而成为守护台湾自由的神；依然活着的英雄群体，则开始走上时代的锋刃，准备与命运决一死战。

为赢得属于自己的命运，台湾必须走出历史的阴影——这是我为台湾筹谋的大国策之第一策。台湾现在处于三个历史的阴影下；这三个历史的阴影分别是：“国民党”、《中华民国》及其宪法、台湾的族群撕裂——“国民党”正引导台湾退回历史的深渊；《中华民国》是把台湾的命运囚禁在历史中的政治牢笼；台湾的族群分裂则正在使台湾保卫自己自由的能量，消耗在历史的废墟中。

台湾之所以必须把“走出历史的阴影”作为大国策之首，根本原因在于，那些历史的阴影是外在强权强加于台湾命运之上的；不果决地从精神和政治意志的角度走出本不属于台湾的历史阴影，台湾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获得主宰自己未来的权利；背负命运所强加的别人的历史，台湾又怎么能够自由地书写自己的情感与意愿。

现在，中共和国民党权贵联手，企图把台湾钉死在历史的阴影中。如果台湾从精神价值到政治意志都死于历史的阴影，台湾也就彻底丧失了活在明天的可能。为了明天自由而有尊严地活着，今天必须走出历史的阴影。

二、国民党权贵走上背叛自由的政治自杀之路 ——一个百年政治命运的终结

达赖喇嘛尊者以“共产党该退休了”一语，委婉地说出中共应当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真理。在台湾，国民党也应当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不仅是由于国民党曾经是命运强加于台湾的外来的历史过程，也不仅是由于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在台湾存在的现实合理性，更是由于国民党权贵背叛台湾的根本政治利益——自由民主体制，正在把台湾推入中共极权政治控制之下。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权贵，逼迫台湾作出重大的命运选择：或者被国民党的全面投降政策送上作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之路，或者为作自由人大步走出“国民党”，这个历史的阴影。

一百数十年之前，清朝战败于日本。为保其国家安全，清朝把台湾出卖给日本。当其时也，没有任何人想要费心征求一下台湾人的意见——你们愿意不愿意被出卖。而且，清朝的重臣还把台湾形容为“鸟不语，花不香”的不毛之地，以为他们出卖台湾作合理性解释。六十多年前，几个外在强权又赋予国民党政权代管台湾的权力。仍然没有任何人费心询问一下台湾人——你们愿不愿意被国民党代管。国民党作为强加于台湾的外来历史过程，在台湾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痕迹便是猩红的血迹，即二·二八大屠杀。在短短的时日内，二万余人被杀死，其中许多是台湾的社会文化精英。按照当时人口比例计算，相当于一次性在大陆杀死近两百万人。据说二·二八已经平反，可是，并没有人对这次大屠杀作为反人类罪进行法律追诉，就像德国人对纳粹党徒所作的那样。这种情况说明台湾人善良，还是表述台湾人的软弱？难道没有人明白一个道理——为防止反人类罪的再次发生，必须对已经发生的罪恶实施正义的追诉和审判；未经追诉和审判就宽恕罪犯，乃是对犯罪的鼓励。从中共的威胁和连战“联共制台”的政治意志中，人们难道没有感到国共两党将对追求自由独立的台湾人再次实施大屠杀的杀气吗？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全面败退于台湾。有许多人把国民党的失败或者归罪于美国支持不力，或者归因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这些观点都有其特定的合理性。不过，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民党丧失了大陆的民心。当时，中共以“民主联合政府”的概念，对抗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独裁观念，赢得知识分子的支持；中共以“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对抗国民党扶植大地主的政策，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中共以扶助“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抗国民党扶植大卖办资本的政策，赢得中小资本家和企业主的支持，从而全面赢得人心。再加上国民党腐败入骨，其又焉能不败。

当然，中共建政后，立刻背弃了它对历史和人民的所有承诺。它通过“合作化”，最终通过“人民公社”，完全剥夺了人民的土地所有权能力，将土地收为国有和集体所有。由于国家处于中共一党独裁之下，国有就是中共官僚集团所有，因此中共官僚集团成为中国唯一的大地主。它通过“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改造”运动，抢劫了资本家和企业主的财富，中共官僚集团由此成为中国唯一的资本拥有者。它通过国家恐怖主义式的暴力，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极权专制，中国人从此变成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不过，即便国民党是败于中共对历史和人民的无耻欺骗，但是，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毕竟构成它那一个阶段的历史主题。

败退台湾之后，国民党依然没有推行民主的政治能力，而只懂得以专制对专制。于是，它借反对共产主义之名，在台湾建立威权专制，执行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戒严令。几十年的戒严，是表述台湾人的精神恐惧、情感痛苦、自由和[人权](#)丧失的白色恐怖之夜。“通共”，则是国民党对台湾人实施特务统治时期的最恐怖的罪名。

半个世纪日昏月晦，台湾的勇者从未停止对自由的追求。那期间，有铁窗后的艰难与顽强；有被迫流亡万里的乡愁与冷泪；有烈焰焚身的痛苦与悲壮。台湾勇者对自由的苦恋，感动了命运。从蒋经国到李登辉，开党禁、报禁，顺天意民心，遂行民主，台湾勇者的血泪和苦难终于怒放为自由之花。不过，历史很快就证明，蒋经国、李登辉两位先生顺天心民意之举，只是他们个人的良知和智慧的结果，而并不意味着国民党的政治意志发生历史性改变。

台湾实现民主，国民党失去执政地位。为此，连战如丧考妣，万里报丧，哭诉于中共暴政。连战遂提出“联共制台”之策——“制台”者，基于国民党权贵对[台湾民主](#)的刻骨铭心的仇恨，只因民主使其失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联共”者，表明国民党权贵对极权专制的刻骨铭心的热恋。无论仇恨还是热恋，都出于极端的自私考量；考量间，没有台湾的利益，没有[自由民主](#)的理念，只有对曾经拥有的特权无尽的怀念。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自私到如此程度，已经丧失存在的社会价值。

反共，是国民党曾经的国策，是其实行威权专制的政治理由。在漫长的戒严时期，国民党以“通共通匪”的风流罪名威吓台湾社会，连花木草石都为之战栗。现在，国民党权贵突然变脸，视中共暴政为靠山，台湾的民主如仇仇，却不就其国策的一百八十度转变，向台湾民众和历史作任何解释——国民党已丧失对台湾的基本的政治责任感，它只对自己的利益负责。

其实，背叛台湾的独立与自由之日，便是连战和国民党权贵沦为政治破落户之时：其“联共”，实质上只意味着投共，因为联合需要政治资本，而连战与国民党权贵现在拥有的，只是政治破落户的无耻；其“制台”实质上也只意味着卖台，连战和国民党权贵对于中共暴政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出卖台湾的根本政治利益，即台湾的自由与独立。

第一次失去执政地位的八年间，国民党权贵情急万分，向中共投怀送抱。中共为灭绝台湾的自由与独立，自是对国民党权贵阶层刻意抚慰，恩宠有加。于是乎，八年之间，中共与国民党权贵已结成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休戚与共之关系。当然，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关系，本质上乃是主奴关系——中共为主，国民党权贵为奴。这不仅是因为国民党权贵在大陆的巨额经济利益的命运，完全操之于中共的政治铁手，也不仅是由于国民党权贵家族在大陆的荣华富贵完全由中共予与予夺，更是因为背弃台湾的自由与独立之后，国民党权贵已失去政治立足之基，其政治命运只能随中共的政治节律，作卖春之艳舞。中共形式上对国民党权贵有礼贤下士之仪，实际上只把其当作可回收利用的政治垃圾。台湾一旦被中共控制，便是国民党权贵的荣华梦惊醒之时；醒来后，必只有满目凄凉，终生耻辱，百年失落——中共乃实用主义之徒，岂能长养无用之辈。

“反共”，是上苍给国民党安排的宿命。回顾国民党在台湾六十余年的历史，唯有蒋经国、李登辉二先生的顺应天意民心之举，可算政治荣耀。当前，在中共暴政假“统一”之名灭绝台湾[民主制度](#)的图谋逼迫之下，国民党本应坚守反共之党魂，沥血明志，

与台湾的自由与独立同生死，共存亡，以报台湾六十余年天覆地载之恩。然而，国民党权贵却反其道而行之，背悖政治伦理，见利忘义，卖台求荣——国民党权贵令人不能有一丝怀疑空间地向历史表明，国民党已经决意把自己同中共暴政，一个对中国人、藏人、维人、蒙古人犯下重重反人类罪的血腥政权，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贪官污吏集团的命运拴在一起。国民党权贵此举乃是国民党的政治自杀；从此之后，国民党的存在无论对于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都不再具有任何自由民主意义上的政治价值。投共卖台，标志着国民党这个已历百年的政治命运魂飞魄散；它虽然还存在于现实中，然而在政治价值上只不过是行尸走肉，冢中枯骨。对于台湾，国民党已成一片腐烂的历史阴影。对于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也是如此。

马英九执政两年，国民党权贵的投共卖台之策大行其道。马英九治国无能，安邦无方，唯媚共之术，花样翻新，炉火纯青。在马英九政府曲意逢迎，尽心配合之下，中共统战台湾之计，呼风得风，唤雨得雨，两岸的经济统一、文化统一、媒体统一、宗教统一、教育统一，如急雨打芭蕉，已成中共极权政治统一台湾之序曲。

面对如此危局，马英九却“不统、不独、不武”，并自以为得计。殊不知，历史必定会将这位“三不总统”作为笑料丑角，刻在耻辱之柱上。背叛自由与独立者最愚蠢，因为，历史的荣耀只会给予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勇者；背叛自由与独立者，只能成为台湾的千古罪人，受百世唾骂，万年诅咒。

遥想百年之前，辛亥志士在中国，碧血黄花，呼唤共和，举义武昌，灭千年帝制，也可谓慷慨壮丽，豪情如虹；反观今日之国民党权贵，兔儿爷与无耻政客共穴，狐鼠与蛇蝎一窝，出卖民主，背叛自由，投降中共极权暴政，使国民党这个百年政治命运自绝于未来，而且还要用美丽的台湾为国民党的政治自杀来殉葬。——观之思之，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继之以长风之叹。

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正在把台湾引向中共极权控制下的“统一”之路。那是通向政治奴隶的命运之路，那是台湾的自由民主香消玉殒之路。台湾若要作堂堂的自由人，必须首先走出国民党这片腐朽的历史的阴影。为走出国民党的历史阴影，至少必行如下数法：

第一法，发起对民主化之前国民党当局种种反人类的全民调查和控诉运动。不要说国民党控制的司法系统不会接受起诉——司法不受理，便向历史控诉，向未来控诉，向台湾社会控诉，向人类控诉。用全民的调查与控诉铸成正义的铜鉴，让铜鉴之中映出当年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反人类罪之罪犯的形象。这样作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伸张历史的正义，更是为警戒未来。

第二法，发起对当今国民党权贵投共卖台劣迹的全民调查与控诉——向台湾的高天激流、大山绿野控诉。用全民的调查与控诉铸成政治道德的铜镜，让镜中映出背叛台湾养育之恩的国民党权贵的不仁不义之举。这样作不是为了劝诫，因为，国民党权贵顽冥不灵，良知已泯，不受教化，而是要伸张现实的正义。

第三法，解构“中国国民党”，创建“台湾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可以分为两部分，即权贵阶层和普通党员。国民党权贵控制着国民党全部政治和经济资源，以及政策制定权；普通党员只是被绑架在国民党这个概念中的政治人质。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宿命就在于反共，不反共就等于自杀。现今国民党权贵的卖台投共政策，则是一种最卑贱的自杀方式，其前途只有一个：同中共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其它“花瓶党”一样，成为政治装饰物；必须比古代佞臣赞美皇帝更肉麻无耻地吹捧中共，将构成中国国民党未来的命运主题。卖台投共过程完成之后，国民党权贵或许可受到中共暴政的赏赐；对于普通国民党员，中共既没有赏赐的必要，也没有赏赐的兴趣，相反，普通国民党员还必须同台湾人民一起，承受自由被强权剥夺的屈辱与痛苦。“上穷碧落，下黄泉”，我苦思冥想，为普通国民党员之利害筹谋，唯一之出路就在于，跳下“中国国民党”这辆被一匹发疯的瘦马拉着奔向绝境死地的破车，摆脱国民党权贵的控制，进而解构“中国国民党”，创建“台湾国民党”，让自己的政治命运回归台湾。

第四法，在国民党还基本遵守民主程序的情况下，在所有的选举中，用台湾人民的政治选择权，以选票的方式，扫荡国民党，这片命运强加给台湾的历史阴影，还台湾人民政治的晴空——腐烂的历史阴影早该归于历史。

第五法，在国民党权贵同中共联手，破坏台湾的民主制度的情况发生时，即人民主权已经无法通过民主选举得到实现的情况下，台湾人民应当实施在暴政前起义的权利，通过全民抗争，人民起义，击败国共两党把台湾带回专制历史阴影的图谋，重申主权在民原则，重建民主秩序。人民拥有对暴政的起义权——这个思想源自先贤卢梭，而其真理性由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辛亥革命、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人民起义等人类的政治史诗论证。

三、《中华民国》已丧失台湾主权之盾的作用 ——一个被当代国民党权贵埋葬在历史阴影中的概念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概念构成一个政治悖论。这个悖论根植于中国近现代百年政治史，除非其中一个概念被抹去，冻结在历史中的悖论无法解开。

宪法是国家意志的最高法律表现。《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主权诉求，基本上重迭于同一片领土。可见，这两个国家意志的法律形态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就像天空不可能有两个太阳并存，一片领土不可能承载两部主权诉求的宪法；就像一个女儿不能同时许给两个婆家，一片领土不能够同时被两个国家意志拥有。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共戴天；生死对决中必有一个血溅五步，尸横当场——这是上帝也无力改变的历史宿命。现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死结，就勒在台湾的咽喉上。

中共暴政对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生死冤家关系的实质，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清醒到冷酷的程度。所以，即使在[胡锦涛](#)试图用统战阴谋把台湾诱入专制陷阱的过程中，中共也从来没有丝毫含糊地不断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在此基础上，中共的“一国两制”的统一方案，也意味着取缔《中华民国》的国号和宪法，《中华民国》管辖的台湾只能成为中共管辖下的一个地

区，而作为中共极权政治的国家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唯一的主权表述——中共一定要彻底否定《中华民国》，以确立其对中国统治的唯一合法性，以及确立对台湾的统治权。

与之同时，为给马英九政府关于两岸关系正“互利双赢”、“和谐发展”等一系列梦呓提供理论基础，卖弄小聪明的国民党文人构思出所谓“一国两府”、“一国两宪”之类的理论。这类理论的共同点，就在于不敢正视一个由基本法理提出的逼问：“一块领土如何能同时被两个主权意志管辖？”

国民党文人不敢正视逼问，是因为国民党小政客马英九之流，既没有勇气否定中共暴政的主权合法性，又没有勇气否定中共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却又幻想同中共“互不否定”。事实上，中共彻底否定《中华民国》和否定台湾主权的意志，向来裸露在天日之下，从无遮掩，无人不知。马英九竟想掩尽天人耳目，让历史相信他已同中共达成互不否定的默契。“互不否定”只是马英九为他的政治投共政策辩护的托词，是一种欺骗。

在《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主权指向集注于同一领土时，无论哪一方，都只有否认另一方的主权的合法性，才可能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在中共对《中华民国》和台湾主权的咄咄逼人的否定前，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对中共的“不否定”，实质就是消极地承认中共对台湾的主权诉求。这难道不是政治投降吗？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的投共卖台国策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华民国》及其宪法已经完全丧失台湾国家主权之盾的作用，并成为笼罩在台湾命运上的历史阴影。那是台湾不能承受之重，也是台湾不应当承受之重。以中共图谋二零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和马英九的投降叛卖为背景，《中华民国》及其宪法对台湾的致命伤害，主要表现为下述诸方面：

（一）《中华民国》的概念及其宪法，已经成为台湾冲破中共的外交封杀的法律障碍。

根据现代法的精神，“主权在民”原则构成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中共依靠暴力夺取国家权力，并且用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维护彻底否定“主权在民”原则的一党极权专制，所以，从现代法的精神的角度审视，中共暴政不具有合法性。然而，这又是一个实用主义，而非理想主义主导的时代。基于诸种实用主义的考虑，国际社会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绝大多数国家同挟持了十五亿人的中共暴政建立起互相承认的外交关系——所谓外交承认，首先就是承认该国对其领土的排他性的唯一管辖权。

《中华民国》宪法所宣示的领土，绝大部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迭。在此情况下，当台湾以《中华民国》之名要求国际承认时，已经同中共暴政建交的国家根本没有认真考虑台湾诉求的法律空间。因为，在两个国家对其领土的主权宣示是同一个标的时，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可能同时承认这两个国家的主权合法性。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绝大多数国家都保持相互承认主权合法性的外交关系，所以，台湾以《中华民国》之名开拓国际生存空间的努力，就是在石板上播种——其它国家如果回应这种努力，就等于否定了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的合法性。那么，

《中华民国》凭什么可以让别的国家自我否定其行为的合法性呢？马英九，这位《中华民国》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否认”的承诺，又使《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的主权宣示显得荒谬——一国总统自己都不否认另一个国家对他的领土的主权要求，又怎么有资格要求其它国家承认它的主权宣示呢？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由于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的自我糟蹋，《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为台湾主权正名的国际法的能量和价值。故此，台湾欲确立国际法上的主权地位，必先走出《中华民国》及其宪法的历史阴影，为自己正名——上帝只救助有勇气自救者；自己不敢为自己正名，这个世界上便没有人会为台湾正名。

（二）《中华民国》的概念已经成为中共暴政囚禁台湾自由命运的政治铁牢；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则是看守这个铁牢的狱卒。

两岸关系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共竭尽全力从国际关系中抹去《中华民国》的概念，并通过不断的政治宣示否定《中华民国》的主权能力，与之同时，却又绝不允许台湾人放弃《中华民国》的概念，更不允许台湾人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提出主权主张的《中华民国》宪法，而且声称，台湾只要修宪就意味着战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

其实，这种表象上的自我矛盾，是由实质上一致的政治逻辑所主导，既中共所作的一切，都以有利于控制并消灭台湾的民主制度作为基本出发点。既然国际社会接纳一个声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基本重迭的《中华民国》的现实可能性已不存在，那么，将台湾固定在《中华民国》的宪法框架内，与窒息台湾独立主权的国际空间就是同一回事。此其一也。

另外，把台湾与《中华民国》捆绑在一起，就等于把台湾囚禁在中共和国民党共同演绎的党国历史阴影中；台湾就只能活在属于别人的历史中，永远没有出头天。台湾唯有抛弃《中华民国》宪法，才能创造出符合自己的历史逻辑和未来自由命运的《台湾宪法》，而《台湾宪法》乃是为主权正名，击破中共控制封锁，走向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础——面对中共暴政的灭台战略，没有《台湾宪法》，就没有台湾的自由命运；囚禁在《中华民国》宪法的铁牢内，前途只有一个，即作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创立的主导者国民党权贵，已经背弃了国民党自己的历史，拉开全面投共的序幕。对于上述逻辑，中共了然于胸，故而竭尽所能，阻止台湾修宪、制宪运动。

如果说《中华民国》宪法已成中共用以囚禁台湾的铁牢，那么，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则起著看守铁牢的狱卒的作用——他们不准台湾通过修宪走出这个铁牢半步。其实，从连战投共卖台的“破冰之旅”起，国民党权贵就已经弃绝了《中华民国》及其宪法，但是，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却不允许台湾人民以自由独立的名义修宪。究其原因，盖因为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视《中华民国》为包装礼盒，要把台湾包在其中，献给中共当局，作觐见之礼，以换取中共对他们个人和家族的赏赐。换言之，国民党权贵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国民党权贵纵火，试图在焚毁《中华民国》概念的同时，也焚毁台湾的自由命运；台湾的民众则想要在最危险的时刻，通过修宪，为台湾点亮一盏自由命运之灯。

（三）《中华民国》的概念已经成为中共把台湾的命运束缚在其统战阴谋内的铁链。

据中共党史研究室一份保密的资料记载，[邓小平](#)临终前五个月，曾有一次专门谈过台湾问题。谈话中他说：“... 要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台湾只要用官方的名义修改宪法或者改变国号，那就意味着战争。对于这一点要毫不含糊。在我们统一台湾之前，《中华民国》不能降旗。... 《中华民国》现在是我们和台湾之间的一条重要历史纽带。只要这条纽带在，台湾就跑不了；国民党的将领和老兵，还有他们的子女对大陆就会有感情。毕竟《中华民国》是他们政治的历史，他们这个政治历史的故乡，是中国历史。... 我们在国际上要反对有人利用《中华民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但又要严格防止台湾改旗易帜。作到这一点，对于对台湾的统战大有好处... 。”

上述引用的邓小平谈话，足够清楚地说明了当前《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对中共统战台湾的价值，我们再作任何解释，都属赘述。事实上，只要顶着《中华民国》这个凝结了太多历史悖论的政治概念，台湾就不可能以清晰明确的主权的名义，开拓出属于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现在，在中共的压力下，国际社会把台湾称为“中华台北”，而不是《中华民国》；中共官方更明确规定，从台湾进口的货物必须标示“中国台湾”或者“中国台北”，而绝不许用《中华民国》的标识。同时，中共却又为了推行统战阴谋，用战争相威胁，迫使台湾不得修改宪法，并必须戴着《中华民国》这个政治枷锁——铁血强权的逻辑，横蛮无礼一至如此，岂非欺人太甚。

综上所述，对于台湾，《中华民国》及其宪法只意味着历史的荒谬和现实的困境。

一个族群需要一个国号，一部宪法，根本原因在于要通过其确立并维护族群的自由和独立。现在，中共暴政利用《中华民国》这个概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国际社会孤立台湾，在台湾内部推行统战。《中华民国》不再是保卫台湾自由与独立的主权之盾，而是中共暴政绞杀台湾民主制度的铁索。

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对中共的“不否定”的政策，已经埋葬了《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因为，不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领土范围，《中华民国》宪法所确认的领土范围就是非法的。马英九的全面投共政策，更是断绝了《中华民国》的历史命脉。

面对如此困境，台湾只有一途，即果断地改宪易帜，把实质上已被国民党权贵的投共卖台政策埋葬的《中华民国》扔给历史，以清晰的国家形象走向未来。不走出历史的阴影，就只能和荒谬的历史一起腐烂；走出历史的阴影或许会面对铁血强权挑战的锋芒，但是，战胜挑战，便将赢得自由的未来。即使失败了，也会成为英雄的史诗——那总比在历史的阴影中腐烂而死好得多，至少，对于高贵而自由的灵魂是如此。

四、台湾，属于所有生活在台湾的族群的命运共同体 ——台湾族群大和解

人是理性的动物，更是情感的动物。理性意味着利害权衡，情感表述心灵的爱憎。虽然人在现实中常让情感屈服于利害权衡，但是，情感却离心灵更近，所以也常

能以潜意识的方式深刻影响人的意志。族群的情感撕裂——这是国民党权贵的威权专制留给台湾的最恶毒的政治遗嘱之一；也是情感影响意志的负面案例。

历史和命运在台湾形成四个族群：原住民、早期大陆移民、客家人、外省人。外省人专指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族群。

专制与特权同生共长，形影不离。在国民党对台湾实行威权专制期间，政治特权竟然转化为具有“种族”歧视性的情感，即外省人对早期大陆移民的族群歧视。由于历史的原因，外省人与专制权力离得更近，某些因专制权力而自觉“高贵”的外省人，把台湾本省人叫作“台芭子”，以示轻蔑之意。漫长的戒严时期，国民党权贵更多使用外省人掌握压抑社会的专制机器，进一步使“外省人”的概念同政治特权联系在一起。

族群撕裂是国民党威权专制埋在台湾历史中的仇恨的种子。台湾民主化之后，台湾本省人对长期白色恐怖统治的政治憎恶，相当程度上又演进成对外省人的情感排斥。尽管有郑南榕这类伟大的先知，用生命超越族群分裂，呼唤属于整个台湾的自由，但是，族群的情感撕裂仍然成为台湾走向自由独立的重大障碍。看来，受伤的情感比留在骨头上的伤痕更难愈合。

对台湾的前途最深刻的危险之一，在于族群情感的撕裂，转化成以“统独”划界的所谓“蓝绿”之间政治意志的分歧。由于包含了太多情感的因素，蓝绿民众间的统独分歧，常常进入非理性的状态。而双方民众也很少有人意识到，统独之争乃是一个伪概念。

对于蓝营民众，说统一是伪概念，并非仅是因为两岸现在根本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基础——极权政治和[民主政治](#)不可能统一于一个国家的概念之中，更是基于同蓝营民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理由。

蓝营民众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六十年前随国民党从中国退到台湾的。他们及其子女对中国故土的思恋和关爱乃人之常情，理应受到尊重。不过，蓝营民众又必须清醒地面对一个冷酷的事实：现在中国是中共官僚集团用一党专制的极权体制统治的地方，中共官僚集团才是中国唯一的主人；中国已不属于他们，他们回到中国将无立锥之地；即使回中国经商暂时还能受到欢迎，那也是由于台湾仍然处于自由之中，一旦台湾被中共控制，他们将立刻沦为“二等公民”。

蓝营民众还需要认识到，中共统治之下，中国已经文化亡国，变成德国犹太人马克思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中国不再是可以回归的祖国；台湾这方水土养育了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历经六十余年，天下虽大，唯有台湾才是他们能够安身立命的家园，唯有台湾才是他们需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的祖国；失去台湾，他们将沦为亡国奴，他们将无家可归；失去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将失去权利和人的尊严的主权保障。

蓝营民众基于故土之情而产生的统一愿望当然应当受到法律的尊重，但是，这种愿望只有超越单纯的情感，成为成熟的理性，才可能与台湾的自由命运一致。我不揣冒昧，愿将蓝营民众统一愿望理性化的要点归纳如下，以就教大方。

其一，当前两岸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基础，极权专制与民主制度不可能共处于同一个国家中；统一是下一个历史时期才有可能性的话题。更具体地讲，中共暴政，这个一党独裁的专制政府，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进行统一谈判的对话者。

其二，只有中国实现民主化，并将国家体制改建为联邦制，两岸才可能，而不是一定统一。只有联邦制下的统一，台湾才可能是其中自由并相对独立的一员，而不是被併吞，被控制。

其三，对于台湾，有尊严的统一的前提在于首先摆脱历史的阴影，宣布独立建国，成立《台湾共和国》。因为，联邦国家是自由人民的自愿结合；当前在中共谋台十万火急，马英九卖台急不可待的情况下，成立《台湾共和国》，乃是挫败中共统战阴谋和马英九卖台政策，保卫台湾自由的唯一之策。台湾如果失去自由，也就失去了统一的政治前提——没有独立的政治人格，台湾就只能被中共专制所吞併，哪里还有以自由人的资格加入联邦的可能。

其四，全体台湾人民的自己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利，构成统一还是独立的终极根据。所以，只有在台湾全民公决的法治程序中取得多数认同，统一才具备合法性基础。

其五，在统一问题上，蓝营民众应当划清同国民党权贵的原则界限。蓝营民众的统一情结源于故乡之情，国民党权贵追求的所谓“统一”，乃是卖台投共，是伪“统一”，真卖台。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马英九政府名义上通过“不统、不独、不武”实行欺骗台湾人民的缓兵之计，实际却全面投共，使国门洞开，中共对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统战渗透，如洪水猛兽，一发不可收拾。不作为就意味着等待，那么“三不”总统马英九在等待什么？我相信，他是等待在全面投降政策配合下，中共统战台湾的战略水到渠成之后，再同中共签订否定台湾独立地位的政治和平协议，而且时间或者是在二零一二年秋，胡锦涛在中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交出总书记职位之前，或者是在二零一三年春，胡锦涛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交出国家主席职位之前——这不是推断，而是中共作出的国家决策，而且有充分线索表明，中共的国家决策已经被某些国民党权贵奉为天音圣旨。

如果蓝营民众囿于历史的情感因素，不能以清醒的理性洞悉，国民党权贵阶层是在假“统一”之名，行卖身投靠于中共之实，那将是一个历史会为之垂泪的情感悲剧。而中共暴政和国民党权贵的阴谋一旦得逞，台湾人民，也包括蓝营民众在内，都将沦为中共专制的政治奴隶。请蓝营民众熟思之。

统独之争对于绿营民众也是深刻关乎情感的问题。由于二·二八屠杀，由于人类历史上最长的军事戒严期的白色恐怖，由于国民党权贵的蔑视和侮辱，绿营民众对“中国”这个概念不能不充满厌恶，因为，使他们长期承受苦难、恐惧和屈辱的国民党威权专制就来自中国；现实又告诉他们，中共暴政，另一个来自中国的铁血强权，将再次把不自由的命运加诸于台湾。

绿营民众对中国的厌恶如台湾的花草树木一样自然而真实，也和蓝营民众对大陆的故乡之情一样，源于曾经的命运。不过，绿营民众也应当理性地对待相关的情感，应当对蓝营民众的故土之情给予理解。之所以应当如此，是因为在族群情感血淋淋撕裂的条件下，台湾通过独立建国，卫护自由，抗争强权的事业，将遭遇重大困境。

许多台湾人深情地把台湾称为海洋国家。如果想真正成为海洋国家，主要并不取决于地理位置，而取决于台湾是否拥有海洋般宽广的胸怀，是否能给人以充分的、合法的自由。精神形态的多样化，不同思想情感的共生并存，乃是一个国家政治胸怀和自由度的象征。一个不能容忍不同思想情感的国度，即使处于万里大洋之中，也不配称为海洋国家。

我愿把先哲伏尔泰的一句话送给台湾：“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我也希望，台湾绿营民众和蓝营民众之间，不要因为情感的差异和观点的不同而互相不共戴天，不要让你们情感的冲突，撕裂了台湾；要知道，无论对于你们中的哪一个族群和哪一个个体，台湾现在都是唯一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世界辽阔，天地万里，而台湾则是你们唯一的祖国。

其实，台湾创立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可以为多种精神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并存，提供足够的空间；关于国家的命运和其它公共事务的不同意见，也能够根据法治原则得到解决。台湾初步具备了不必为思想观念的不同而互相仇恨的政治宽容度和法律自由度。不过，对蓝营民众的故土之情的理解，绝不等于应当对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两岸政策的宽容。蓝绿民众相互理解的利益共同点，在于台湾自由独立的国家状态和民主制度。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的卖台投共国策已经超出[思想自由](#)的范畴，而属于背叛台湾自由、独立和民主制度的卖国行为；无论从政治还是法律的角度审视，这都意味着犯罪。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的背叛，既伤害了绿营民众的根本利益，也伤害了蓝营民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伤害得更深刻，因为，那种伤害中包含对蓝营民众的情感亵渎和玩弄；国民党权贵辜负了蓝营民众对他们的政治信任。

促成蓝绿民众相互理解，并在法治轨道上解决分歧，从而治愈族群情感撕裂的伤痕——这是一切忠实于台湾自由独立的政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共同责任。从目前的状况看，对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基于私利实施的投共卖台国策揭露的越深刻，越彻底，便越有利于蓝营民众看清他们背叛台湾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本质，也就越有利于绿营民众和蓝营民众超越情感的隔阂，在卫护台湾的自由和独立的意义上，形成政治的合力。

蓝绿双方民众在情感和观念上的族群撕裂，是命运留给台湾的历史阴影，是国民党权贵在台湾命运上刻下的一个世纪毒咒。当今的台湾，外有中共相逼日甚，内有马英九政府叛卖日急，可谓险若累卵，危如临渊。如果再复以激化的族群撕裂，则其势难以逆料。因此之故，走出历史的阴影，破解国民党权贵对台湾的毒咒，精心医治族群情感撕裂的伤痕，乃是当前台湾大国策不可或缺的内容。

“你真的爱台湾吗？你真想台湾自由独立吗？如果有真爱真情，就要每分每时，每事每行，都把弥合族群情感伤痕记在心间。”——这是台湾的命运对每一个台湾人的时代嘱托。

以台湾自由独立之名，实现族群大和解，让台湾成为所有生活在此的人们的命运共同体。——这是时代对台湾人的期待。

台湾大国策 九：台湾大崛起

第九章 台湾大崛起 ——在命运逼迫下走向时代荣耀之巅 一、引言

在历史上留下过荣耀的族群必定都有自己的理想主义之梦，台湾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百年之梦——为命运不再被外在强权任意左右而独立建国。现代，人类不再相信理想主义，而迷恋于物欲的诱惑，许多族群已经丧失了梦想的能力。没有人生之梦的时代黑暗如没有星月的长夜。但是，台湾之梦的星辰依然在时代的夜空中晶莹地闪烁。

自由是人类最神圣的精神事业；对自由作出具有独特的时代风格的理解，乃是每个时代都应当承担起的对人类历史的责任。然而，当代人类却由于物欲引诱而放弃了热恋并理解自由的天职；一个仇恨自由的铁血强权，中共暴政，却成为物欲的灯塔，世界各个族群的命运航船都被那个灯塔引领，驰向人类大劫难——放弃理解自由的时代最堕落，而大劫难便是命运对那种放弃和堕落的惩罚。

就在理想主义黯淡而自由受到冷漠的时代背景下，台湾的独立建国之梦却与台湾的自由面临的危险相遇了。为了卫护自由和尊严，台湾必须独立建国；最危险的时刻常意味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是我在本章将要表述的主要思想之一。

中共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是对人类自由命运的挑战，而挑战的第一个锋芒，已经直指台湾的咽喉。那是台湾避无可避的宿命，也是台湾必须立刻回答的命运逼问：以投降换取苟活，还是以抗争为自由事业作神圣的献祭。

台湾行政院长吴敦义为国民党权贵的卖台投共政策辩护时声称，只要两岸保持目前这种关系状态，再过八十年，一百年，中国总会变的。相信在历史的回顾中，吴敦义应当为他的愚蠢而羞愧莫名，如果他还有知耻的能力的话——中共吞併台湾的现实危险已经向他脸上吹气了，他依然在妄语百年之后的事，难道还不够白痴吗？当然，他也可能是有意装傻，用谎言麻痹台湾的警觉。

命运对台湾的逼问并非只同台湾的前途有关；这个逼问也和人类今后的百年命运相关。因为，中共扩张的战靴如果从台湾的躯体上践踏而过，就会紧接着迈向下一个目标，征服全世界才是中共野心的终点。当年[毛泽东](#)曾对他的官员讲：“将来我们还要成立世界管理委员会... ..”现在这句话又在[胡锦涛](#)空洞得只剩下权力贪欲的生命中回荡。

当前，极权与自由的生死之决的第一战，已经宿命地选定台湾作为战场；时代的希望和未来人类的百年命运，都聚焦于台湾。如果台湾追随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选择投降，也就选择了卑微和耻辱的命运。对于人类，那意味着在中共极权全球扩张

前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对于台湾，则意味着永远的黑暗——自由的灯火被命运之风吹熄，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就会重新笼罩世界。如果台湾选择搏战，选择在命运的锋刃上作一次流光溢彩的自由之舞；如果台湾能从凶险至极的态势中发现崛起的机遇，从中共暴政的强大中看到其致命的弱点，并果决地宣告《台湾共和国》成立，台湾就实现了四百年来的最伟大的崛起，就为今后千年的自由奠定了国家主权的基石。

如果天佑人助之下，台湾的抗争引发中共内部危机大爆发，从而使中共的扩张战略折戟沉沙，则台湾便以人类自由捍卫者的雄姿，走上时代的荣耀之巅。在一个自由需要拯救的时代拯救了自由——还有什么比这无尚的荣耀更值得被历史记住。

上述的一系列“如果”的现实可能性，将从我在本章的讨论中呈现出来。从来没有那一个小族群像今天的台湾一样，与整个人类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历史和时代都在屏息注视台湾的选择。这种状态或许会使庸人恐惧惶惑，却一定会给勇敢高贵的生命以激情；他们定然会为台湾作出不令人类失望的选择。我坚信，台湾将在最艰难的时刻选择宣布独立建国，并以此作为捍卫自由的大国策之本。

二、世界的堕落与台湾的抉择 ——和中共一起腐烂，还是作人类自由价值的捍卫者

如果有谁当面问一个人：“你热爱自由，还是更喜欢腐烂的物欲？”想必这个具有侮辱性的问题一定会使被提问者感到愤怒。但是，时代就曾在人类的耳边轻轻地问过这个问题。人类不仅没有愤怒，反而暧昧地眨了一下眼睛，并用实际行动作出回答——“更喜欢腐烂的物欲”。

以拜物主义哲学为灵魂的中共暴政，制造出前所未有的物欲诱惑的能量。它用毁灭性开发自然资源和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三亿中国农民工奴工般的劳动的剥夺，这两个因素给了人类暴富的希望。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客、商人、知识分子都沦为这个希望的奴隶；历史丧失了属于心灵的目标，迷失于喧嚣的物欲；中共暴政则成为全世界物欲奴隶朝圣的“圣地”。

圣徒和智者意识到，人性的非道德化构成时代的危机——心灵在物欲中腐烂是人性非道德化的另一种表述。圣徒与智者重建一种比物欲化更好的人性的努力已经开始，但是人类非道德化的速度却似乎更加迅猛。历史仿佛走到了精神的尽头。

上个世纪，柏林墙崩塌之后，经过短暂的狂欢，欧洲突然陷入精神的空虚；精神空虚是因为，目光越过柏林墙的废墟，欧洲在自己的历史地平线上再也找不到值得追求的理想。欧洲衰老了，除仰卧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躺椅中晒太阳之外，不再会对亚洲的极权主义的兴起承担抗争的道义责任，而其对中国的兴趣则主要源于物欲。

由于恐怖主义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特别是对无辜妇女和儿童的残杀，美国反恐战争被视为二十一世纪初叶开始的最具正义性的事业。然而，时至今日，虽然击败了萨达姆，美国的反恐战争却不仅仍然远离最后的胜利，而且处处露出败相——本·拉登还是美国的噩梦，世界范畴内的恐怖袭击并没有受到真正的遏制；更重要的是，世界对美国的反恐战争的态度越来越冷漠。世界对正义的事业冷漠，或许是因为在物欲崇拜的时代，正义本就不是命运的主题。而美国在反恐过程中表现出的对私利的关切和对

人类共同利益的忽视，则一定导致世界的冷漠。一个理想主义凋残的美国，当然不可能视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私利。

今日之日本，早已丧失“明治维新”时代的蓬勃生机，退化成一个精神狭隘的经济动物。其精神狭隘之处在于，除了本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日本没有兴趣关心任何问题，那是一个既没有精神领域的雄心壮志，也不会为人类的自由事业承担责任的国家。印度社会开放，行为自由。但是，悬殊的两极分化使绝大部分印度人处于贫穷状态——印度人贫穷、肮脏并自由著。那是自由的耻辱。在绝大部分人贫穷的背景下，发展核武器和建造航空母舰只能令人厌恶印度的政客群体。遍布印度的乞丐棚户区时时表述印度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它的人文价值只能从日渐远去的历史中寻找。

古埃及文明衰落之后，非洲从来没有再次证明，它是一个有能力创造属于人类的理想主义的大陆。阿拉伯世界则从近代史开始，就一直停滞在历史的阴影中，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与其说在伤害美国，不如说在伤害伊斯兰的整体荣誉。

世界在堕落，中国则是堕落的极致之处；人类普遍沉溺于物欲，中国人则正在物欲中腐烂——中国的堕落之最，在于中国民族人格的奴性化、谎言化、物欲化，在于中国人正按照中共暴政的意志，走上极权扩张之路。

中共暴政表述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复活。它统治中国六十余年作的最彻底的一件事，就是灭绝中国文化的灵魂，把中国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中国在文化的意义上已经亡国六十余年，并濒临灭种。一个民族，文化之魂被灭绝之后，就变成无魂的行尸走肉，不再相信道德和良知，而只在物质的意义上丑陋地活着。这正是十五亿中国人的现状。

利用当代中国奴性化、物欲化、谎言化的民族人格，中共暴政的宣传机器培育出一种无魂的民族主义，为其全球扩张提供民族心理基础。所谓“无魂”，是指这种民族主义没有任何文化精神的追求或者理想主义的附丽，而只充斥着沸腾的私欲和阴郁的贪欲。

作为无魂民族主义生命承载者的那部分中国人，基于入骨的奴性，他们对中共暴政，这个文化上的外来政权，每日每时都在制造的大量社会罪恶噤若寒蝉，讳莫如深，却对历史上异族的入侵义愤填膺，因为，他们明白，对身边现实的罪恶进行抗议会受到官权的迫害，而对历史的不公正作出声讨的姿态，不仅可以发泄虚伪的激情，而且还会得到暴政的赞赏；他们自己被中共暴政剥夺了思想言论自由权，甚至剥夺了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利，反而渴望在中共举起全球扩张的旗帜时去抢劫全世界；他们自己沦为暴政的政治奴隶，却渴望践踏台湾的自由，以满足黑暗的心理冲动。

当代中国无魂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华丽的谎言。因为，它所张扬的“爱国激情”和“历史义愤”都建立在奴性、物欲和谎言化的民族人格基础之上，都在为中共暴政的极权扩张作政治宣传——谎言人格支撑的激情必定是谎言；政治宣传化的义愤必定虚假。然而，谎言也可能蕴涵巨大的能量；历史就常在谎言引导下伸展，命运则常被谎言蒙蔽。十余亿道德良知在物欲中腐烂的中国政治奴隶，以无魂的民族主义的名义，按照政治奴隶主中共暴政的意志，要求灭绝台湾的主权，用极权专制控制自由的台湾。在

如此严酷的命运挑战前，台湾怎样作出抉择？“台湾会投降并和中共一起腐烂，还是会为捍卫自由而战？”——每次走入台湾时，我都如是问自己。

中资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媒体为马英九政府投共卖台所作的辩护，已经如铁幕遮掩了台湾资讯自由的空间。这种状况令人气沮。但是，只要离开猥琐的政客和只会为钱而疯狂的奸商，走入台湾的民众中，生机勃勃的清新之气便沛然入我胸怀。

在台湾的大山碧水之间，花韵竹影之下，民间的艺术家、雕刻家、写作者、园艺培育者和最普通的农民，都通过他们的生活过程，创造著与自然一致的美，创造著真实的人性，创造著有些古拙但却善意深沉的道德原则。凝视林义雄、高成炎教授等千里苦行者的背影渐渐远去；透过台北之冬濛濛的雨丝，看到立法院外棚屋中的蔡丁贵教授和他的白发苍苍的战友们，我意识到，有一些高贵而顽强的生命，还在守护属于台湾的最后的理想主义，守护着台湾的梦。

漫游台湾，一日沉醉之后，我豁然开朗，明白了诗人李敏勇说出“台湾是一个小而美丽的国家”这句话时，声音中为什么会充满动人的深情——深情中有百花怒放时浓郁的芳香，有红日沉入大海时的万里涛声。登玉山之巅，环顾今日之世界，我看到，台湾是少数几个还珍藏着人类已经丢失的文化神韵的地方；是少数几个还能够同真实而美丽的人性对话的文化圣地。在理解李敏勇对台湾的诗意萦绕的深情那一刻，我也得到一个刻在铁石上的答案：台湾一定会拒绝中共的利诱或者武力威胁——台湾定然会拒绝和中共一起腐烂的命运，拒绝政治奴隶的命运，而将捍卫自由与独立。因为，台湾壮丽与秀美共存的山河孕育出的真实的文化精神，宁肯为自由和美而玉碎，也不会丑陋而卑贱地瓦全。

这是一个历史因丧失精神目标而走入绝境的时代；这是一个人类由于对物欲的迷恋而可以背弃自由理想的时代，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用理想主义感动的时代。只有在理想主义的感动中，历史才会回归精神的命运，人类才会重新把热恋的凝注献给自由理想。我深知物欲追求常构成历史的原动力，在心灵普遍腐烂于物欲的时代更是如此。但是，我也更清楚，在诸多命运的关键时刻，是理想主义，而不是物欲诱惑，引导人类走入伟大史诗的时代。究其原因，则在于诚如柏拉图所言，“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

台湾，苍天般辽阔的太平洋中的一个美丽岛，将要以其在铁血强权前捍卫自由和独立的意志，成为人类万年历史中坚守高贵精神原则的典范；这个意志中所蕴涵的史诗的悲壮和英雄人格之美，将感动历史与命运。台湾将因此走上人类荣耀之巅。

台湾人是一个有质朴的真情而没有野心的族群，甚至对荣耀也没有野心；他们只愿在平静的劳作和休憩中，度过自然而真实的生活。然而，命运却要逼迫台湾走向荣耀，而且逼迫越冷峻残酷，荣耀便越辉煌。在整个人类都自愿走向堕落的时候，台湾却被迫走向荣耀，这也许意味着难得的幸运——似乎命运不允许台湾堕落。

不相信理想主义的时代必定蔑视英雄人格；不理解生命价值的庸人俗物必定诅咒英雄。相反，敢于同艰险命运作生死之决的族群，则必定尊重属于自己的历史的英雄。值此台湾与中共铁血强权就要开始最后的意志对决的时刻，英雄郑南榕雄烈的魂

魄将在金焰中灿烂复活，并和英勇壮烈之士，慷慨悲歌之人一起，守护台湾的自由。在凶险万端的命运挑战前，失去英雄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就失去了一切；没有英雄人格的勇武刚毅，就没有一分凯旋的可能。

有人在窃窃私语中指责郑南榕不珍惜生命。但是，这种指责是错的。郑南榕是以一个伟大理想主义者的方式，以一个高贵英雄的方式珍惜生命——在自由的理想还面临被摧残的危险时，他不允许自己的生命在庸俗中渐渐腐烂，他要让生命升华为绚丽的意义，升华为自由的美丽祭品。郑南榕的生命因此成为台湾的精神圣物。

还有人公开把英雄与民主对立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否定英雄。但是，这种否定使民主蒙受耻辱。因为，它似乎在暗示民主是只属于庸人的概念。民主确认每个人在法律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却并不否定英雄人格的价值。现在，台湾的民主制度处于中共强权觊觎的危险中，则更需要台湾族群人格的英雄人格化。

国民党权贵的小政客卖台求荣，秽行昭彰；马英九媚共投降，自以为得计；奸商滚滚，皆争相对中共卖好输诚，以求不义之财；小文人碌碌，尽见利忘义，向中共乱飞媚眼；更有怯懦庸众，移财资于境外，准备一旦不测，便插翅远飏，置台湾命运于不顾。上述种种危象难道还不足以使人认识到，唯有台湾族群整体上得到英雄人格的加持，才能铸就同命运决死战的意志，以挽狂澜于即倒。

情势扑朔迷离，人心动荡难测，恐怕上帝都无能准确预言台湾的前途。不过，我坚信，郑南榕精神将以台湾之魂的名义，召唤英雄的男女，为自由一战。此战如败，则血漫台湾，自由之梦破碎于宝岛，中共极权全球扩张的人类大劫难势将难免；此战若胜，则自由屹立于台湾，极权崩溃于大陆，人类将进入另一个时代。无论那个时代的主题是什么，为自由而浴血的台湾精神，都将成为时代晨光中一缕至美的朝霞；拯救了人类自由的台湾英雄人格，都会赢得历史的永久尊敬。

三、台湾独立建国的时机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台湾通过独立建国，以卫护自由和民主制度——这是当代台湾大国策的核心。何谓独立建国？根据台湾目前的情况，独立建国的主要内容如下：废止《中华民国》宪法、国名、国旗、国歌；颁布《台湾共和国》宪法，宣布起用新的国名、国旗、国歌。

如果说走出历史的阴影是台湾大国策的第一步，独立建国是台湾大国策的灵魂，那么，独立建国的时机的选择与确定，则是台湾大国策最重要的策略原则之一。二十一世纪初叶，民进党执政期间，台湾已经丧失过一次独立建国的机会。没有勇气与智慧果决地修宪法，改国名，易国旗，只简单提出某些两岸是两个国家之类的口号，会使神圣的独立建国事业沦为政客玩弄的政治议题。独立建国，乃国之大事，关乎台湾今后千年的历史命运和当今台湾人的生死荣辱，因此，选择时机需要大智大勇。无谋无智的匹夫之勇适足以败事；无勇无胆的庸人政客永远只敢谋划，不敢行动。

选择独立建国的时机，不仅应当知敌知我，洞烛情势变化之先机，而且要有从绝境险地中发现机遇的能力。这种能力既是大智，又意味着大勇。认知中共的强大几乎不需要智慧；中共在管辖人口、土地、资源，以及经济规模和军事能力诸方面比台湾

强大得多，乃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存在。所以，很多人忧心忡忡，一谈独立建国便气沮色变，不敢捋中共之狼尾虎须。更有《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吴敦义浪声放言，“白痴才搞独立”——他似乎觉得自己能发现不需要智慧就可以看到的事实，便不是白痴了。行政院长的智商如此，可见马英九政府官员之愚蠢颡顼。当前，能从中共的强大中看到其致命弱点者，才是大智之士，而能从中共的弱点中找到台湾独立建国的时机者，则是大智亦复大勇之士。

台湾独立建国的最佳时机在二零一二年；那也可能是台湾独立建国的最后时机。其实，二零一二是在胡锦涛在时间上为台湾划定的宿命之线；他要在那一年用签订“和平协议”的方式，实现中共对台湾的全面的政治控制，即实质上用极权专制统一台湾，灭绝台湾的[民主政治](#)。因此二零一二年对台湾最危险。不过，这也是台湾独立建国的最后和最佳时机。之所以是最后的时机，就在于二零一二如果独立建国不成，中共的铁幕将在下一个历史时期中遮蔽台湾的命运；之所以是最佳时机，就在于台湾一旦以果决刚毅之意志，在二零一二年行独立建国之事，则极可能提前引爆中共内部大危机，从而使台湾建国之梦成为现实。

如前所述，中国的两极分化已经满足了形成重大社会危机的基本条件，现在只等待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激化，冲破宫廷斗争的范围，从而扣动击发社会大危机的扳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在因素介入，只按其自身的逻辑发展，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五年中共“第五代”全面接掌最高权力之后，击发社会大危机的扳机将被扣响。然而，如果能洞察台湾问题与当前中共权力斗争之间的微妙联系，则会发现一个重大可能性，即在二零一二年胡锦涛准备消灭台湾的自由和独立的危险时刻，通过实施台湾独立建国大国策，则可能激化中共党内矛盾，加速中国内部危机发展的逻辑过程，从而使对台湾最危险的时刻，转化成对中共最危险的时期。

目前，中共内部为权力而激烈角逐的基本派系是两个，即胡锦涛的[“团派”](#)和江泽民的[“上海帮”](#)。另外，[薄熙来](#)在重庆实施的“唱红色经典歌曲，打击与腐败官员勾结的黑社会势力”的行为，则意味着“新左派”政治崛起的一次预演，而担任导演的[薄熙来](#)也被认为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派别代表。国际间的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广泛炒作的所谓“太子党”，并不构成中共党内斗争的一个独立派系，而只是一种政治出身的表述。“太子党”成员内部利益矛盾深刻，四分五裂，小帮派林立，而且，无论“团派”还是[“上海帮”](#)，都包括许多出身“太子党”的成员。

数年来，胡锦涛通过何勇，架空贺国强，实际控制了专职整肃官员风纪的“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所以，在以反腐败为借口进行的党内权力斗争中，胡锦涛及其“团派”，攻城拔寨，斩获甚多；江泽民及其“上海帮”一败再败，似乎已呈颓势。但是，江泽民执掌党军政大权二十年，利用腐败权力，培植了大量的利益死党，其势力可谓根深叶茂，现在虽不断败退，尚远不致一溃千里。相反，江泽民的“上海帮”像受伤的狼，卧在草丛里，一边舔伤口，一边紧张窥测反击胡锦涛的机会。据“上海帮”的重要人物的家族成员透露，江泽民认为，在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前，彻底击败胡锦涛的唯一机会，就在于二零一二年中共用统战方式控制台湾的战略遭受严重挫败。

胡锦涛全面掌握军权之后，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国策修正，就是把江泽民主持制定的“军事斗争为主，统战方法为辅”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改为“以统战方式为主，以军

事斗争准备为辅”。胡锦涛作出这种国策修正，并非由于他“和平、理性”，厌恶战争，而完全是出于权力斗争的自私的考虑。

胡锦涛出任中共军事委员会主席时间不久，如果对台湾问题实施军事解决，他尚没有能力掌握全局，且会使江泽民长期在军内培育的力量借机进一步崛起。如果用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的整个过程都将处于他的操纵之下；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因此成为强化其权力地位的一个历史性“功绩”。

不过，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利弊得失靠天意，但更靠人谋。胡锦涛改变对台湾的国策之举，不仅令江泽民和“上海帮”愤懑不已，而且开罪于试图通过台海作战“建功立业”的军内强硬派，如梁光烈、郭伯雄等，还被少壮派将领和军官如朱成虎、罗援、戴旭等私下指斥为“误国的书生之见”。薄熙来在二零一零年三月赴京开会时，曾在北京的家中宴请国防大学和军委各总部的十几位将军和大校。席间，酒酣耳热之后，薄熙来狂言道：“共青团系统出身的干部，凭一张舌头，巧言令色，就登大位掌重权。现在，他们又以为凭一张舌头就能说得台湾来归，那是作梦。毛主席早说过，‘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说，‘大军不到，台湾不会自动回归。’我打赌，台湾问题的解决必有一场血战。现在的这一套统战政策最后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就等著吧，二零一二年看他胡锦涛怎么收场。”

当前，台湾问题已经演变成中共权力斗争的一个焦点问题；除“团派”外，中共内部各种势力几乎都对胡锦涛的统战台湾的战略持乐观其败的态度。曾庆红看过《台湾大劫难》后，在好几个场合，难以按捺幸灾乐祸之意，对“上海帮”的人士说过同样的话——“这本书出版的很及时，这可给胡总出了一个大难题，考验胡总的智慧的时候到了。”曾庆红的态度已经引起胡锦涛的重大顾虑；据“太子党”间流传的消息，胡海峰透露，胡锦涛甚至怀疑是曾庆红指使人，故意把秘密文件泄露出去，才支持了《台湾大劫难》的写作。

上述诸种情况都标示出一个判断：在台湾问题上，胡锦涛只能进，无法退；他的统战台湾的战略必须在二零一二年取得成功；他承受不了失败的政治后果，因此，他必将把自己的政治能量发挥到极致，以实现其战略——他自己走在有进无退的不归路上，他也必定要在二零一二年把台湾逼上绝路。面对迫在眉睫的危局，吴敦义还要谈论八十年、一百年后中共的变化对台湾的影响，这才真是政治白痴。

处此困境绝路，如何解脱？台湾只有行大智大勇之策，借力打力，促使中共变起肘腋，祸起萧墙，惨烈内斗，自宫自残，无暇外顾，才能扭转乾坤，击破中共为台湾设定的最后时间界限。以卫护台湾自由的名义，行独立建国事，宣布创立《台湾共和国》，颁布《台湾共和国宪法》——这是一举改变命运，创造历史之策。

《台湾共和国》横空出世，昂视阔步进入历史，必产生下列震撼性效应。

首先，台湾独立建国表明胡锦涛用统战方式控制台湾的战略在最后一刻彻底失败，想使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成为统一台湾的庆典的政治企图瞬间化为泡影。胡锦涛的权力斗争的对手，早已环伺周围，磨牙吮舌，此刻此时则定然借机而起，以此发难，从而在中共十八大前引发江泽民势力与胡锦涛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的决战。这一

决战，事关双方及其家族的存亡荣辱，因此，双方必全力以赴，誓决生死。“新左派”摩拳擦掌，窥测时机已久，中共当权集团的大内乱，正是“新左派”崛起的政治机遇。而“新左派”崛起必以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为号角，促使中共内部权斗冲出宫廷斗争的范畴，演进为社会政治运动。在此情况下，中国已达极端的两极分化所蕴涵的政治能量，就很可能被引爆，中国社会大变革将提前成为中国现实命运的主题。

其次，台湾二零一二年行独立建国事，将完全打破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安排，使其陷于战略被动。中共虽有对台的军事行动预案，然而，该预案是以统战方式取得决定性成功为前提而设计，所以不可能适应统战方式彻底失败的局面。而国家战略的转化，绝非一朝一夕可成；旧战略的失败要求制定新战略，新的国家战略的制定，要求最高权力意志相对统一，在中共最高权力范畴内权斗如火如荼的状况下，这种最高的权力意志的相对统一显然是奢望。因此，中共新的对台战略将在一定期间内难以形成，离进入实施阶段就更远。由此一来，台湾会有比较充足的时间为台湾宣布独立建国善后，并为应对未来可能的种种挑战作充分的准备。

有人或许担心，内部权力斗争激化，会不会促使中共当局将矛盾外引，倾全力荼毒台湾。这种担心其实是对事态缺乏具体认知的结果。对历史和现实作纵横观，凡极权专制，当社会矛盾难以在内部化解时，确实常有将矛盾外引，发动对外战争，以缓解内部危机之举。在一定程度上，中共二十一世纪全球扩张战略也是为了将中国人的注意力从国内危机引向对外扩张。不过，把内部危机转化为对外的扩张需要一个基本条件，即极权体系的最高权力意志被一个铁腕人物或者一个基本团结一致的寡头集团所掌握。或者说，统一的最高权力意志是实施上述危机解决方案的前提。在最高权力意志分裂的情况下，极权专制需要作，也只能作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血腥的权力斗争，重新形成统一的最高权力意志；如果不能形成，极权体系将趋向崩溃。

如曾经分析过的那样，江泽民帮派与胡锦涛帮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最高权力意志的分裂；“新左派”的崛起则更意味着，最高权力意志的分裂已经由帮派利益之争，演化为政治意识形态之争——那是极权体制灵魂撕裂的象征。所以，《台湾共和国》的建立一旦引发中共内部权力的一次决斗，中共暴政根本就无暇他顾，只能专注于解决最高权力意志分裂的危机。而且，在权力决斗开始之后，江泽民势力和军中坚硬派也不会允许胡锦涛临时行险，冒然出兵台湾——他们还要把解决台湾问题的“荣耀”留给自己。更何况胡锦涛虽阴鸷狠毒，却缺少行大险的胆魄。

综上，担心台湾独立建国会造成中共立即武力进犯，荼毒台湾的担心，基本上属于杞人之忧。二零一二年，是台湾实现其建国梦的最后时机，也是最有利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机一失，遗恨万古；扼住时机的咽喉，《台湾共和国》就将崛起于时代之巅。

在此，讨论的主题只限于台湾独立建国的时机。至于二零一二年独立建国时会面临怎样的险境，以及如何为《台湾共和国》赢得国际支持等问题，当容在下一章，即第十章中讨论。

四、让《台湾共和国宪法》成为人类自由价值的集中表述
——一个既有利于中国民主化，又是保卫台湾自由所必须的时代主题

如果说选择实施的时机乃独立建国首要的策略考虑，那么，创制《台湾共和国宪法》，则意味着为独立建国铸造国魂的事业。宪法是国家意志的最高法律表述，也是国家价值基础的最高法律依据。历史将以《台湾共和国宪法》作为主要依据，判断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历史意义；人类也将在相当程度上以《台湾共和国宪法》作为主要依据，来决定对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态度——同情，支持；还是冷漠，甚至反对。中共铁血强权近在咫尺，吞併之意，急不可待；台湾处境，凶险万般。因此，独立建国运动得到人类的同情和支持，得到历史的肯定，乃是关乎台湾生死存亡之大事。能够有益于人类并感动人类者，才能得到人类的同情和支持；创造历史价值者，才能得到历史的肯定。因此，小邦立国，必有大国之志，方能成功。所谓大国之志，绝非指强权扩张，而是要有顾念天下苍生的佛心，让自己国家的立国价值与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要求一致。宪法则是表述大国之志的最主要的法律方式。

在此，利益人类，主要指精神价值。《台湾共和国宪法》要想为独立建国运动奠定成功的精神价值基础，其内容就不仅应当与台湾命运攸关，而且应当以历史的反思为基础，成为人类对自由最新理解的集中表述——台湾唯有靠对自由的热恋和深刻的理解，来感动人类和历史。

据我观察，台湾独立建国的立宪活动要切忌下述两种倾向。

第一，试图通过强调种族生理特征，把种族的特殊性作为独立建国的一项价值基础。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可以历数如左：首先，独立建国本质是一项属于精神领域的事业，而不是生理范畴的问题。把种族生理特征作为基础，将极大削减独立建国的政治意义和精神价值。而能够感动人类的是精神价值与政治的正义性，不是生理特征。其次，依照现代法的精神，种族生理因素的独特性，不足以构成独立建国的合法性基础；一个简单的事实在于，同一种族的人可以分属不同国家，同一个国家也可以有诸多不同种族。另外，种族生理特征是一个十分狭隘的有种族主义嫌疑的平台，如果把独立建国置于这个平台上，则很难得到世界的道义理解；没有世界的道义理解，当然不会有广泛的支持。

第二，把独立建国视为台湾内部某一族群的专利，以至于特权。我们已经讨论过，台湾的族群撕裂是国民党权威统治时期，留给台湾命运的一个毒咒；台湾至今还没有走出这个历史的阴影。把独立建国视为某一族群专利的倾向，则是这个毒咒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其极端者甚至把是否讲源自闽南语的台湾语，作为判断对独立建国事业忠诚度的指标。我们知道，戒严时期国民党强迫推行所谓国语，禁讲台湾语。国民党的这种作法不仅伤透许多台湾人的心，而且是一种文化性的种族灭绝的罪错。但是，如果为报复历史，而在今日的独立建国运动中引进另一种语言歧视，乃至族群歧视，则是深刻伤害独立建国事业的大荒谬。因为，台湾是属于所有台湾人的——无论其属于那个族群，有哪种宗教信仰，使用哪种语言；只有独立建国成为绝大部分台湾人的共识，《台湾共和国》，这个台湾之梦才能实现。从现代法的精神的角度审视，语言也没有资格构成独立建国的基础——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可以分属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也可以共处于同一个国家。

只有超越族群撕裂和语言歧视，独立建国事业才能有大成。在此，我愿向某些台湾朋友进一言：“你真得忠诚于独立建国运动吗？你真得渴望创建《台湾共和国》吗？

如果是，那麼就剖开你的胸膛，把你的心捧给所有的台湾人，而无论他属于那个族群，讲哪种语言，并告诉他们——台湾独立建国是卫护台湾自由的唯一之途；台湾是现在所有生活在台湾的人群的唯一祖国和安身立命的地方。”

《台湾共和国宪法》要想成为人类自由价值的时代结晶，就必须具备满足时代精神要求的素质。哲人曾有言：“当代，东方需要自由的拯救，西方则需要拯救自由。”此一言，道出时代的基本精神要求。希望独立建国运动创制出体现自由的拯救和拯救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宪法，与希望《台湾共和国》的创立得到历史肯定和人类支持乃是同一回事。

根据上述希望，为实现“东方需要自由拯救”的时代精神，《台湾共和国宪法》应当再次确认人类实践自由理念数百年来所积累的普世价值。其最重要者包括：“主权在民”原则；法的天职在于对公民权利的肯定和国家权力的限制的原则；权力分立制衡的原则；法治与司法独立原则；公民财产个人所有权不可侵犯原则；思想自由及精神形态多样化原则，等等。

值此中共暴政的宣传机器和数百万御用文人每日每时都在大言滔滔，论证共产党极权的合理性的荒谬时代，再次确认自由民主的真理性乃是创造历史的行动。以《台湾共和国宪法》的名义重申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对于中共专制铁幕后十五亿政治奴隶，意味着时代的启示和自由人的政治示范。因此，在自由民主的意义上，台湾的独立建国运动与中国人摆脱政治奴隶命运的追求，利益相合，价值取向一致。

事实上，在中共的逼迫下，创立《台湾共和国》已经成为为保卫台湾自由的唯一方法。如果任由中共用暴政“统一”台湾；如果任由台湾，这盏东亚自由民主的明灯，被极权专制吹灭，那麼，不仅世界将因此而更加黑暗，中国人也因此失去一个自由的希望，中国的民主化的前景则会由于中共暴政的胜利而变得黯淡。因此，台湾的独立建国运动和中国的民主化并行不悖；《台湾共和国宪法》不仅是卫护台湾自由的法律坚盾，也是中国十五亿政治奴隶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

为实现“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时代精神，就不能不对西方[民主国家](#)的精神和社会危机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法哲学的总结。就目前最突出的危机表征而言，《台湾共和国宪法》至少应当具备下列内容，才能符合“拯救自由”的时代要求。

其一，强化对金钱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特权的法律防范与纠正机制。

“文艺复兴”过程中，基于对中世纪政治专制的深刻认知，法律把确认与保护公民基本[人权](#)和严格制约国家权力，作为最重要的事项加以关注，但是，却忽略了对另一个具有强大社会能量的因素，即金钱的制约。几百年的实践证明，民主制度确实成功地把国家权力这个猛兽关进了法治之笼，但是，金钱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特权的现象则由于缺少法律制约，对公民在法律前一律平等之原则，造成严重伤害。这种伤害已经以精神危机的方式对人类提出警告。即使在台湾，通过金钱在选举中所发挥的超出合理性范围的作用，人们也明确感到了金钱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特权对选举公平的侵蚀。

《台湾共和国宪法》如果能在总结全人类数百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限制金钱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特权的法律原则体系，那将是对“拯救自由”事业的重要贡献。

其二，确立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宪法原则。

“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限”——这是近代以来，限制自由权的最基本的宪法原则之一，而限制实质上意味着保障。不过，“文艺复兴”后的那些伟大的立法者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以致于物性贪欲鼓动下的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相当程度上已经威胁到人类的未来生存与发展。尽管各国都制订了为数不少的环保法应对危机，但是却少有宪法原则的规范。这表明各国对处理同自然的关系还缺乏最高法律范畴内的法哲学理解，而这种理解能否及时表现为宪法原则，关系到人类生存环境的安全。

显然不应该用法律限制贪欲，因为，法律的效力只以束缚社会行为为限度。不过，法律可以在社会行为的层次上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鉴于自然环境所处的危机状态，急需确立“人的自由以不侵害自然生态平衡为限”的宪法原则，并围绕这一原则，设置对自由权进行相关限制的法律体系。如果《台湾共和国宪法》承担起创制上述宪法原则的时代任务，也就意味着台湾独立建国运动从又一个角度承担起“拯救自由”的责任。就如同“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限”原则实质上在保障自由一样，“人的自由以不侵害自然生态平衡为限”原则，则是从保护人类根本生存条件的角度，来保障人的自由。

其三，确立不能以自由之名否定人的社会公共责任的原则。

中世纪是人的自由权被神权彻底否定的时代。人类走出中世纪黑暗之后，法律便合乎历史逻辑地把确认和保障人的自由权利作为第一定律。不过，人的生命具有个体性，人的生存却又是社会性的：生命的个体性确认个体自由，生存的社会性则确认共生共存的共和精神和社会公共责任。近现代法的精神以强调个人自由作为起点，乃是历史逻辑的要求，但是，对社会共和精神和公共责任的忽略所造成的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失衡，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已经通过精神危机的形式，对社会正义的价值基础提出质疑。确立不能以自由之名否定社会公共责任的宪法原则，或者说确立“自由以不得违背社会正义为限”的宪法原则，乃是走出精神和社会危机所必须；唯有如此，才能使自由趋近理性、良知，趋近曾令康德心灵震撼的道德准则。《台湾共和国宪法》如果体现出个人自由与社会共和精神、公共责任之间的合理平衡，就是在从事使自由理念高贵化的事业。虽说绝不可以用法律的强制性迫使人高贵与美，不过，法律却可以通过对自由界定，来表达对高贵与美的神往和对自由的拯救。

我对《台湾共和国宪法》怀有强烈法哲学的期待。这种期待是以我对台湾的文化底蕴的了解为基础。从郑南榕先生为公开发表一部台湾宪法草案而乘烈焰长风逝去时起，台湾宪法的创制就宿命地成为壮烈、悲怆的过程，同时也是充满智慧的过程。李西潭教授的“绿色自由主义”的理念，则显示出台湾智慧对当前人类精神危机的某种程度的准确解读。

让《台湾共和国宪法》成为当代人类自由理想的经典表述，台湾独立建国运动就获得了同人类利益一致的价值基础。因为，唯有自由才是人类共同的事业。除了自由之外，任何其它理念都不应当被奉为台湾独立建国的价值根据。自由，才配作《台湾共和国》，这个海洋国家的立邦之本，建国之魂；也只有自由，才是能够得到人类承认的台湾大崛起的精神象征。铸造自由的意志，是台湾独立建国运动超越台湾本身的命运，升华为人类保卫自由的世纪之战的关键所在——此乃台湾的生死之道，胜败之机，台湾的有识之士不可不察。

第十章 铁血国策卫自由 ——命运不相信怯懦者的眼泪或者微笑

一、引言

有人说，现代政治就是妥协的政治。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共暴政有时也会妥协，甚至会韬光养晦。不过，能让中共暴政作出妥协的，不是怯懦者的眼泪或者微笑，而是力量；中共仍然是本能地遵从丛林法则的政治动物。尽管中共狗官常常企图用微笑或者眼泪欺骗世界——[胡锦涛](#)脸上不变的微笑和[温家宝](#)眼睛里不干的眼泪就是经典的谎言，但是，中共暴政本质上绝不会相信眼泪和微笑，中共暴政不会被弱小的怯懦者感动。

把自己的意志和政治逻辑强加于弱者——这是中共暴政不变的政治人格。现在，台湾在中共的视野中就是一个弱者。因此，中共把它二零一二年对台湾实施全面政治控制，视为不可改变的宿命；它不会对弱者妥协。台湾只有用不惜身碎骨裂、流血千里也要卫护自由的坚定意志，用慷慨悲壮、刚毅果敢的抗争，用吐吞宇宙、鬼神莫测之智慧，才能击破中共暴政准备强加于台湾的政治逻辑。这也正是我们筹谋[台湾大国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台湾大国策](#)必是铁血智慧，因为，中共只会被铁与血说服。

为自由地生活，必须选定时机，独立建国——这个判断构成台湾大国策的核心内容。走出“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这两个概念，以及族群撕裂的历史阴影，是台湾大国策实现的前提。而本章所要讨论的，则是实施台湾大国策的具体方案。具体方案有三：其一，台湾最危险的期间将在何时出现，以及如何应对；其二，台湾国家意志的宣示及宣示的意义；其三，如何组建“保卫台湾自由国际志愿军”，使保卫台湾的自由成为人类共同的神圣事业。

在本章《引言》中，我们还愿指出两种对独立建国运动会产生重大消极影响的倾向：一种倾向把《中华民国》政治概念下的竞选获胜视为最高政治价值，另一种倾向则排斥《中华民国》政治概念下的竞选。

在目前情况下把竞选获胜视为最高政治价值为什么是错误的？理由就在于，《中华民国》的宪法并不能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由于《中华民国》宪法在领土范围等诸方面的荒谬性，台湾的独立建国是还没有完成的事业。所以，在《中华民国》概念中的竞选，对于台湾不具有终极的国家意义；把竞选视为最高政治价值，等于在历史的废墟间徘徊。再加上国民党权贵加紧实施全面卖台投共的国策，《中华民国》的概念已经是“尸居余气”，来日无多。因此，只有将创建《台湾共和国》当作竞选的终极目标和最高政治价值，才能走出《中华民国》这个概念的绝境死地。

当然，排斥竞选的倾向也是狭隘的。想必没有人不知道，废止戒严令，冲破党禁，实行[民主选举](#)，是台湾人民数十年艰苦卓绝的抗争的结果；争取到[民主选举](#)的权利，在台湾独立建国的进程中，具有历史里程碑的意义。所以，否定选举，也就否定了台湾争取民主和独立建国的历史，否定了为民主而流淌的血泪。只要以独立建国为终极目标，通过成功的选举活动，依人民的意愿控制更多的政治资源，架空马英九政府的卖台投共的国策，将有利于为《台湾共和国》的创立，积累必要的社会和政治能

量。而且二零一二年关于台湾命运的决战日益迫近，此前的所有选举，对于最终战胜国民党权贵的投共国策，都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积极参与《中华民国》政治框架内的选举，是为创建《台湾共和国》积累能量；以独立建国为最高政治价值，打好每一场选战——这是关注台湾自由命运的人应当遵循的逻辑。

二、台湾最危险的时期：二零一二年三月至五月——用铁血意志论证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

台湾最危险的时期将出现在二零一二年三月至五月之间，即台湾大选结果出台之后，至法律规定新当选总统履任的日期之前。

二零一二年，是中共暴政为台湾的自由划出的终点线，所以，自由与极权的一次决战无可避免，除非台湾向中共暴政屈膝。中共当局的总的意图是，在二零一二年国民党通过选举再次执政后，即由中共和国民党的领导者，以执政党的名义签订政治和平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在于，确立中共极权政治主导下的两岸政治一体化，取消台湾的主权和政治独立，台湾由此成为中共一党独裁的中央政府管辖下的特别行政区。

显而易见，要想实现上述总意图，中共就必须确保国民党在二零一二年继续执政。所以，竭尽全力操纵二零一二年的台湾大选，乃是中共当前最主要的政治关注点；中共一定要在台湾导演一出用民主的名义埋葬民主的政治戏剧。这不仅是因为中共一再声称台湾关乎其“核心国家利益”，而且是因为台湾大选的结果直接影响胡锦涛及其“[团派](#)”的政治命运。

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二零一零年三月，中共组建了“台湾大选工作领导小组”，胡锦涛任组长，温家宝、贾庆林任副组长，秘书长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台湾大选，中共却要由最高领导人组成领导机构，可见其操纵台湾大选的决心之大。据中共高层相关人士透露，令计划根据《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和新出现的情况，已经为中共“台湾大选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出操纵台湾二零一二年大选的工作方案。这个工作方案列出的操纵台湾大选的方法涵盖经济、舆论、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现将该工作方案的部分要点介绍如下：

（一）该工作方案首先指出，中央政治局要求，二零一二年动员中共所能控制和影响的一切政治社会资源，确保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获胜，而且要作到万无一失。

（二）该工作方案明确提出，采取一切可能的经济措施，在二零一二台湾大选之前，造成台湾经济的繁荣气氛，增强一般民众对国民党执政的信心指数，削弱台独势力的民意基础。为此，经济上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同台湾各地的经济联系，要作到“遍地开花，处处结果”；二零一一年下半年起，要保证台湾股市的上扬态势，要用高于市场价格的方案收购台湾南部地区供出口的农、副、渔产品，而且，有多少，收多少，不设上限；同一时期，要保证到台湾的大陆游客人次翻一番，至少达到年均一百万人次的水平。

（三）二零一二年大选前，要动员受中共控制和影响的所有媒体，全面营造有利于国民党胜选的舆论；要精心准备材料，力争从道德的角度搞垮台独势力竞选人的形象。为确保掌控舆论导向，届时中共将投入足够的资金。

（四）运用政治和军事措施影响台湾大选。要作到“不露痕迹，恰到好处”，要吸取以往教训，切忌“大轰大嗡，引起逆反心理”。该工作方案提出的政治军事措施一是“以黄埔同学会为纽带，以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为契机”，通过退役的高级军官，加强两岸的政治联系，一是适时呼应马英九发出的撤除飞弹的呼声，“以增强台湾人对马英九的信任度”。不过，究竟在二零一零年“五都”选举前撤除飞弹，还是在二零一二年大选前撤除飞弹能够更有效影响台湾民意，中共还在评估，尚未作出定夺。针对军中强硬派的反对意见，该工作方案指出，“撤除导弹只是为加强马英九的民意基础所作的政治姿态，并没有实质的政治军事意义”。因为，撤除的导弹重新瞄准台湾的目标，只需要十分钟。”

（五）全面动员在台湾长期培养的“宗教爱国力量”，于二零一二年大选之前，向信众明确表达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态度。该工作方案称：过去测试的经验证明，由著名宗教人士作出“选民进党就会血流成河”这类表态，对信众能产生重大心理影响；不要顾忌有人提出宗教干预政治的指责，“在我党已经控制台湾舆论大势的局面下，这种指责不会产生广泛影响”。

（六）周密部署，妥善安排，确保在大陆投资的台商及其家人亲友的每一张选票都投给国民党籍候选人；要采取有效措施，掌握每一个台商投票的真实情况；要让台商明白，他们不单是在投票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也是在给他自己在大陆的经济利益投票，“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用从大陆挣到的钱去支持台独势力”。

（七）动员掌控的黑社会力量，影响台湾选民，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也可以对台独势力的候选人的家庭成员施加人身安全方面的压力；动员各大学内同大陆有密切的学术联系的教授学者，影响大学生、研究生的投票倾向；动员在大陆有重大利益的台湾演艺界明星，影响社会大众的投票倾向。

该工作方案列出的操纵台湾大选的方案总共有十八项，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择其最重要的内容，作出上述综合性介绍。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工作方案强调，对于中共操控二零一二年台湾大选的意图必须严格保密，深藏不露——甚至使用了《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藏于九地之下”；同时，为麻痹台独势力，对于二零一二年台湾大选之前的包括“五都”选举在内的所有选举，都要冷眼旁观，密切注视，不作干预，不露痕迹；只有到二零一一年十月之后，再全面启动操控二零一二年大选的计划，以作到战略动作的突然性，使台独势力在选举前和选举过程中陷入全面被动。

中共暴政对台湾二零一二年大选志在必得，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也将全力一搏。为控制选举的结果，国民党权贵必将把他们的党产和其它社会资源发挥到极致。在中共暴政和国民党权贵共同全力操控下，如果国民党通过二零一二年大选再度执政，会出现下述两种效应：

其一，由于受到强权、金钱和政客阴谋的操控，台湾的选举变成实现中共和国民党权贵的政治阴谋的过程，台湾人民的意志被践踏，台湾的民主制度因此而名存实亡——形骸虽存，灵魂已死。

其二，国民党再度执政，推行卖台投共的国策再无顾忌，台湾的自由独立地位将迅速丧失。

面对上述情况，台湾人民也有两种选择：或者接受政治阴谋操纵下的选举结果，或者奋起反抗，揭露政治阴谋。如果台湾人民接受这个选举结果，喝下中共暴政和国民党权贵共同酿制的这杯政治苦酒，那就意味着台湾独立建国的百年理想从此灰飞烟灭，“小而美丽的国家”的台湾之梦瞬间化为千古遗恨；中共暴政和再度执掌大权的国民党权贵，很快就会把自由独立的台湾变成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一个特区——中共得到对台湾的宰制权，国民党权贵得到中共暴政赏赐的荣华富贵，台湾人则沦为中共的政治奴隶。

任由血泪丰盈的独立建国理想灰飞烟灭，任由《台湾共和国》象征的自由理想遗恨千古，台湾的未来将只是一声无尽的悲叹。对于台湾的自由灵魂，奋然而起，同中共暴政和国民党权贵奋勇抗争，是唯一有尊严的选择。从二零一二年三月选举结果揭晓，至五月二十日国民党权贵完成再度执政的程序之前，则是抗争必须发动的期间。

抗争的第一步，便是发动全民抗议，彻底揭露中共暴政和国民党权贵操控选举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承认受政治阴谋操控的选举结果，要求在联合国监督下重新举行公正的大选。

国民党权贵最可能的政治举动，就是在中共暴政的全力支持下，对全民抗议活动实施暴力镇压；台湾的自由命运由此进入最危险的时期。出现对全民抗议的暴力镇压，标志着国民党权贵的统治在政治上彻底退化，再次变成以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为基础的专制政治。处此严峻的境遇，台湾人民又面临两种选择：或者在国家暴力下屈服，或者遵从先贤卢梭关于人民在暴政前拥有起义权的理念，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诸国的人民那样，果断地将全民抗议，转为反抗国民党权贵暴力镇压的全民大起义。

人民屈服于暴政的镇压，台湾的自由与独立就只能从此永远消逝在专制铁幕的阴影中；以反抗暴政的全民大起义的名义，宣布《台湾共和国》诞生，台湾之梦就会点燃历史——那是属于台湾的自由和独立的璀璨历史；即使为此而浴血，生命也会升华为献给台湾之梦的美丽而高贵的祭品。这难道不正是勇敢的台湾男女所追求的荣耀与理想吗！

国民党权贵执政至今两年有奇，投共卖台之丑态毕露；马英九娇媚可人的政治面容也日渐枯萎憔悴，几成政治黄脸婆。考察今日台湾之天意民心，如果中共暴政和国民党权贵不运用政治阴谋和黑金进行非法操控，则二零一二年大选国民党必败无疑。当然，即使进行非法操控，国民党也极可能在大选中败落——只因天意难欺；民心难骗。不过，二零一二年大选一旦国民党失败，自由独立派候选人获胜，台湾自由命运最危险的时期，依然将在二零一二年三月至五月之间出现。请容我试述理由如下。

首先，以国民党权贵“联共制台”的根本政策为依据判断，即使在二零一二大选中败选，国民党权贵阶层也绝不会交出国家权力，让自己重新沦入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境地。自三月初大选结果确定，到五月二十日法定交接权力的日期之前的两个半月时间内，国家权力仍然由马英九政府执掌。可以预见，为保住权力，国民党权贵会实施一切必须实施的政治阴谋和极端行为，甚至不惜提前公开投共卖台，借中共之力消灭台湾的民主制度。

其次，中共暴政也绝不会允许自由独立派候选人再次执掌台湾的最高权力。《台湾大劫难》一书已介绍过，中共针对台湾的《军事斗争准备预案》中，对于一旦出现自由独立派候选人赢得大选的情势如何应对的问题，专门作出了规划。根据该规划，中共将在二零一二年三月至五月，当选总统尚未接管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仍由马英九政府掌控期间，运用其在台湾长期培育的社会政治力量，制造事端，扰乱秩序，然后，以台湾出现了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事变为借口，援引其《反国家分裂法》，在马英九政府的配合下，出兵台湾，控制台湾的战略目标，并由胡锦涛和马英九签订两岸政治一体化的和平协议。台湾的自由独立和民主制度由此灭绝。

当上述情况出现时，可能对台湾进行军事援助的唯有美国。可是，马英九早已“制敌先机”，多次公开对媒体重复“永远不会要求美国人民为台湾而战”的宣示。显而易见，台湾总统如此表态，美国就没有为台湾而出兵与中共对抗的理由和可能。一旦中共出兵台湾，台湾将失去获得国际军事援助的可能性，陷入孤身苦战强权的危局。国民党权贵“联共制台”政策之心机深沉，诡诈难测，从马英九利用上述宣示断绝台湾获国际军援之路可见一斑。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二零一二年大选自由独立派候选人胜出，那么当选总统首先需要对因应下述状况作出万全的准备，这种状况就是：国民党权贵拒绝交权，并联合中共灭绝[台湾民主](#)制度。只要出现中共出兵台湾，马英九政府配合的情况，当选总统即应公布国民党权贵“联共制台”的叛国罪，宣布全面接管国家权力，号召军队、警察、官员和全体台湾人，奋起抗击中共的军事入侵，并颁布对叛国者进行军法审判的临时条例；值此自由危险，台湾浴血的艰难时刻，当选总统更应当宣布《台湾共和国》正式成立，从而让对中共暴政入侵的全民抗击，同时成为实现独立建国理想的决战——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理想将因此成为同一首英雄史诗。

二零一二年三月至五月，台湾的自由命运必定直面危险。这是宿命。所有关注台湾自由的人士，都应抛弃幻想，筹谋对策。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唯有尽人事，才可能制天命。把独立建国的理想刻写在台湾人保卫自由的铁血意志之上，历史将被感动，宿命将被征服。

三、台湾国家意志宣示 ——台湾给人类历史的备忘录

任由中共政治逻辑自然发展，中共“第五代”全面接掌最高权力后，即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五年之间，中共的内斗势将引发可能造成极权专制崩溃的社会危机大爆发——对此，我们在本书其它章节已作过具体讨论。但是，胡锦涛却要通过先经济一体化，文化一体化，然后在二零一二年内，实现两岸的政治一体化。因此，台湾没有等待的余地，而必须以创造历史的主动性，促使中共内部权斗在二零一二年白热化，把胡锦涛为置台湾于死地设定的时间线，变为中共的生死线。

中共暴政与台湾相较，强弱之势分明，无须多思。台湾以小博大，以弱战强，制胜之道，端在借力打力，激化中共内部矛盾，使中共专注于内部权力斗争生死之决，无暇他顾，从而为台湾独立建国赢得时间。而台湾欲行激化中共内部矛盾之策，唯一途——公开、彻底地揭示胡锦涛运用统战方式控制台湾，灭绝台湾民主制度的政治阴谋，并采取有效反制措施，使胡锦涛试图凭统战方式实现其“统一”台湾的战略呈现出必败之势。

古有政治箴言：“人亡政息”。不过，那是就铁腕的专制枭雄而言。对于胡锦涛这类有权势无威信的鼠辈独裁者，常是另一个规律发生作用，即“政败人亡”——如果他的国策失败，或者遭遇重大挫折，觊觎最高权力的政敌势必一拥而上，同他作生死存亡之斗。在社会危机高度发育的背景下，极权专制的致命内乱将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如何使胡锦涛统战台湾的战略呈必败之势，这是一切愿与台湾的自由独立同生共死的人们需要筹谋的大国策。我意，除二零一二年台湾最危险的时期，与中共暴政和卖台投共的国民党权贵作铁血之战外，从现在起，就应当让国家意志的宣示，成为台湾政治的最强音；成为台湾大国策的意志战的内容。我深信，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意志史；意志的宣示所凝聚的精神能量，则是历史的起点，命运的归宿。

台湾国家意志宣示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独立建国已经成为台湾保卫自由的唯一抉择，同时也是全体台湾人政治命脉之所系；失去自由与独立，台湾就失去了一切；台湾决意同企图灭绝台湾自由独立的任何强权，作铁血之战，作玉碎之战。

（二）台湾人自己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四百年以来，均是外在强权把种种不自由的宿命强加于台湾，现在，初步获得自由独立的台湾，决意结束外在强权任意操控台湾命运的历史。从此之后，包括中共在内的一切外在强权不得再强行规划台湾的命运。

（三）现在这个历史时期，统一不能够成为海峡两岸关系的议题，因为，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基础。[自由民主](#)不可能和极权专制统一在同一个国家之内，自由的台湾绝不会接受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权作为“中央政府”，自由的台湾人也绝不会接受作中共专制的政治奴隶的命运。只有中国民主化之后，统一才可能成为一个议题。即便在那时，台湾和大陆以联邦制统一，还是保持独立，也完全由台湾人自己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而不是由任何外在强权或者国民党权贵来决定。

（四）无论未来如何，摆脱《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概念的羁绊，创建《台湾共和国》，乃是当务之急；只有在《台湾共和国》的主权之盾的卫护下，台湾人的自由、尊严和利益才能得到历史的肯定，台湾人才最终拥有了自己的政治依归，才能够以堂堂的《台湾共和国》公民的资格走入国际社会，而不再是国际社会中的政治流浪汉。

上述台湾国家意志宣示的内容，以“台湾是所有生活在这个宝岛上的人们的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作为基础，因此，它符合蓝绿民众的共同愿望和利益，当然，“投共卖台”，“联共制独”的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除外。台湾国家意志宣示运动只有成为台湾的政治最强音，才可能起到令胡锦涛的统战灭台战略呈现败像的作用。所以，具备

大智慧的台湾政治家应当居中协调，构筑台湾国家意志宣示的大平台。正如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言，形式才是实效性。没有豪华壮丽的形式，台湾国家意志的宣示就很难令整个人类都屏息倾听。如何动员遍布台湾城乡和北美大地的以自由独立为己任的各种台湾社团，都投入台湾国家意志宣示运动；如何让台湾人把台湾国家意志宣示的内容视为当前的“政治圣经”等问题，是构筑宣示大平台必须思考解决的关键问题。

台湾国家意志宣示不仅面对台湾，更要面对世界；要让国际社会毫无疑义地听到台湾人关于国家意志的表述。特别是要让美国和欧洲的民主国家明白，他们屈从于中共强权而作的关于台湾地位的声明，违悖台湾人民的意志，也是对自由原则的背叛；为了短期的经济政治利益背叛自由，最终将使叛卖者自食苦果——各国如果在台湾为自由和独立奋斗的过程中保持冷漠，甚至任由中共暴政吞噬台湾，中共暴政将积累起全球扩张的更大能量。

国家意志宣示运动一旦主导台湾的政治趋势，并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聚焦点，引发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大策略目标就极有可能实现。同时，国家意志宣示还具备另一项效应，即选举效应。以往台湾大选以外的各项选举，自由独立派的竞选人同国民党候选人的争论常囿于具体的民生问题，很少涉及关乎台湾根本命运的领域。这显然不利于台湾民众认清国民党权贵投共卖台的国策的危险性。当然，竞选必须关注具体的民生问题，不过也要同时关注台湾的整体命运。国家意志的宣示本身就具有反制投共卖台政策的能量；当国家意志宣示成为台湾政治的最强音，必然引发选民从台湾命运的层次思考这样的问题：“选择谁，才是选择了台湾的希望，才是选择了台湾的自由、独立和尊严？”这种台湾命运层次的思考，既有利于提升台湾选举的政治素质，又有利于强化创建《台湾共和国》的意志，更有利于揭露中共暴政隐藏在专制铁幕后的统战灭台阴谋，以及国民党权贵用重重谎言掩盖的投共卖台的本质。

国家意志宣示所能达到的最高策略目标，就是以其精神能量瓦解中共统战活动的政治能量，不战而击败胡锦涛制定的灭台战略。但是，真正的战略家则必须准备应对最坏的情况，并筹思突破危局之策。目前，对于台湾最坏的情况便在于，二零一二年胡锦涛在国民党权贵的配合下，出兵台湾。那时，台湾唯有与强敌血战。即使最坏的情况变成现实，国家意志宣示也会在坚定台湾人战志方面表现出举足轻重的效应。中共军队的总的特性，一言以蔽之曰：强大而腐败。抗击强大而腐败的军队，台湾的战志必要炽烈如火焰，坚硬如铁石。

同台湾相比较，中共军队的强大显而易见，无须赘述。因此，我们将着重讨论中共军队的腐败，然后审视强大与腐败这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会对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产生怎样的影响。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共暴政就意味着绝对的权力，而中共军队则是中共体系中权力最绝对的地方，因而也是腐败至极的地方。中共军队的腐败可谓腐烂入骨，现只列举其要者如下：

其一，权钱交易成为军队管理运作的主要规则。现在的中共军队，招兵、提职、退役、转志愿兵、入军校深造、改换军种和兵种，甚至加入共产党等所有的管理环节，均实行权钱交易；有钱可通行无阻，无钱则寸步难行。之所以出现这种深度腐

败，其根本原因在于各级各类军权实际上已实行“私有化”，即每个军官都把与其职务相关的权力视为私产。于是，带兵的军官喝兵血，管理军用物资的军官贪污军资；负责审查军职提升的政工军官卖官鬻爵，各部队、单位的主官则坐地分赃；高官之贪，早成亿万富豪，娇妻美妾成群，小官之贪，亦可花天酒地，嫖娼宿柳。当今之中共军队，乃是古今中外权钱交易的第一大黑市，且生意兴隆，无经济危机之虞。

其二，由于权力的极度私有化，军队退化为私家军。这并不只是指军队的共产党化，同时也是指军队被特权阶层垄断。据军委总政治部二零零八年的统计，中共军队师级以上军官百分之八十是原军官的子女和“老干部子女”，即“太子党”；少将以上军官这个比例达到百分之九十四。上述情况表明，各级军权实际已成世袭制，门阀出身是军队升迁的主要标准。军权的特权阶层世袭化必然以下述现象为补充，即正义土崩瓦解，才华横溢之士横遭淘汰，纨绔裙带之属则登龙有术。特权阶层狭小范围内的近亲繁殖，使军官群体智力的白痴化，军事才能的残障化之趋势，迅速发展，难以阻止。

其三，中共军队腐败之最令人喷饭者在于，军官眼中，士兵非人，而是捞钱之耙，盛钱之袋；下级军官在上级军官眼中亦如是。军官为饕餮之主，士兵乃被鱼肉之奴；上级军官欲壑难填，索求无度，下级军官竭力逢迎，疲于奔命。如此一来，中共军内官兵关系紧张如弹奏“十面埋伏”之琴弦：士兵视军官若百世之仇敌，只是不敢怒，亦不敢言；下官视上官如缠喉之毒蛇，只因未遇时机，不能除之。中共军队内的矛盾似地火奔行，只待喷薄而出的一日。一旦对外开始作战行动，战场之上，混乱之际，正是士兵屠官，下级灭上级的天赐之机。时机天赐，人必取之；中共武力犯台之日，亦是其军中矛盾仇杀开始之时。

中共之军队正在腐烂发臭。深刻而普遍的腐败之下，将有贪意，人人皆怀升官发财、醉生梦死之念；兵无战志，个个尽思苟且偷安、得过且过之策；其军魂灰飞烟灭，军心纷乱动摇，军风败坏不堪，军纪形同虚设。二十一世纪前八年，中共军队内已破获六起以校级军官为主体的军事政变组织。按照一般规律，未破获的，一定比已破获的更多。这种现象告诉人们，中共军队的腐败正转化为政治危机。但是，这支军队规模依然庞大，物资能量依然强大。腐败与强大相互作用之间，使当前中共军队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考虑到中共在军队中庞大的政工系统和进行政治欺骗宣传的能量，中共军队能在短时间内处于激情状态，并爆发出比较强大的军事能量。

第二，由于腐败造成的精神意志的伤害，靠欺骗宣传鼓动起来的激情状态不会持久。激情冷却之后，军队的作战意愿和能力将迅速降低，军队内部的官兵矛盾此刻可能趋向激化。

第三，腐败与强大并存，意味着中共军队外强中干，因此，只能在对软弱之敌的打击中气壮如牛，而一遇顽强英勇的抗击，则必露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为腐败所决定，中共军队只能短时间亢奋勃起，却不能持久作战；只能在顺境下作战，而一遇挫折则悍气全销，战志颓然，即中共军队只能胜，不能败，一败即可能如三峡大坝堤倒洪泻，一溃千里。

鉴于中共军队的上述特点，如果出现中共武力犯台的局面，台湾的全民抗战必要显示出下列素质，方可制胜——以铁血战志，灭敌气焰；以气势如虹之搏战，摧敌进攻之锋芒；借本土抗战的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行巧妙灵活之战法，顽强与敌周旋，以赢得时间。只要台湾全面抗战具备坚定性、英勇性、顽强性和智慧性，时间就将成为中共军内矛盾和党内权斗的催化剂。而矛盾重重、权斗惨烈的中共暴政，必因为中国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而败于台湾的全民本土抗战。

台湾的铁血战志和英勇搏战的精神，只能来源于保卫自由和独立的意志，而台湾国家意志的宣示，正是以自由和独立作为起点与归宿。可见，现在就应当开始的台湾国家意志宣示运动，同时也是铸造台湾铁血战志的运动，铸造台湾战神的运动。

极权猖獗，物欲沸腾，历史处于茫然之中。国家意志的宣示，乃是台湾留给人类历史的备忘录——当整个人类为物欲而谄媚中共强权之际，一个“小而美丽的国家”，为自由的理想，勇敢地对强权说不。

四、让保卫台湾的自由成为人类的共同事业 ——组建《保卫台湾自由国际志愿军》

中共政治灭台和台湾独立建国，这两个命运将在二零一二年宿命地相撞。台湾，“小而美丽的国家”，为制胜庞大的强权暴政，显然应当尽全力取得强有力的国际支援。中共狡诈万端，对此早有预见，因此，多年以来，打压台湾国际生存和活动空间不遗余力，并对各国施加强大的经济政治压力，孤立台湾独立建国运动。马英九政府投共卖台，予中共以默契配合——马英九一句“永远不会要求美国人民为台湾而战”，断绝了美国政客在中共武力犯台时派兵参战，保卫台湾自由的可能性。

内有家贼难防，外有强权嚣张，处此窘迫之境，组成保卫台湾自由的国际阵线是否还具有可行性，以及应当如何去运作，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共暴政对内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专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殖民统治，并因此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中共暴政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极权扩张战略，构成人类的下一次大劫难，从而使它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人类的公敌——中共暴政的这个本质，决定了组建保卫台湾自由的国际阵线的现实可行性。

事实上，许多情系故土的“台美人”，多年来一直作出感人的努力，试图说服美国的政客理解、支持台湾的独立建国运动。然而，至今收效甚微。究其原因，至少有三：

其一，诉求的对象有误，即以美国的各类政客为主要诉求对象。政客虽然离权力很近，却往往离真理和正义很远。目光短浅，贪图暂时的利益是政客这种动物的本能；想让政客理解真理和正义，可能比让犟驴随小提琴的音韵翩翩起舞还要困难。在中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诱惑下，各国政客很难有兴趣倾听台湾的理想与痛苦。

其二，没有令人毫无疑义地说明，独立建国是保卫台湾自由的唯一之路，自由是独立的价值基础；更没有说明，保卫台湾的自由，并非只与台湾的利益有关，而是保卫人类自由的第一战。

其三，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组建国际阵线的整体规划，从而使相关诉求只具有个案的影响力。当然，在上述意义上缺乏整体性规划，根本原因还在于独立建国运动没有确定时间目标，以及相应的策略方法。

基于以上讨论，组建强大的支援台湾的国际联合阵线，应当作出下列三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要为独立建国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在此，正名首先要说明，面对中共政治灭台阴谋和马英九政府的投共卖台政策，创建《台湾共和国》是坚守台湾自由必行的国策，台湾人为作自由人而不得不独立建国——以自由的名义感动人类；其次要说明，控制台湾只是中共二十一世纪战略扩张的第一步，如果不能将极权扩张的战略阻止在其海岸线之内，台湾的自由被践踏之后，全人类的自由将处于铁血强权全球扩张的直接威胁之下——台湾不只是为自己的自由而战，也是为人类的自由浴血。

第二，独立建国运动不能仅停留在理想主义的表述层面，而更要成为一个正在实施的目标明确、方案具体的现实运动。为此，要向国际社会充分说明，中共暴政把政治灭台的期限划在二零一二年，那也是台湾与中共强权的决战期；台湾将以创建《台湾共和国》，作为决战的召唤和目标。

第三，在继续与各国政客周旋的同时，把诉求的主要对象转向民间。世界各国与台湾一样，良知和正义往往不在政客群体中，而在民间。如果能在世界各国民间激起良知的广泛回应，则组建国际联合阵线，支持台湾自由就获得了全球的民意基础。在民主国家，民意即天意；通过民意的压力迫使政客恢复良知，比直接向政客诉求可能更有效。

组建支持台湾的国际联合阵线的目的在于，让保卫台湾自由成为人类的共同事业。纵观人类万年历史，能够成为凯旋者的事业，必然要求以英俊高贵的男女的血作祭品。这或许是因为，血是生命中最圣洁真诚的因素。有鉴于此，国际联合阵线的名称应当叫作《保卫台湾自由国际志愿军》。这个名称意味着，志愿军的成员不只为台湾提供道义或者物质的援助，其最主要的任务是，在二零一二年台湾的自由命运最危险的时刻，当台湾人民举行全民抗争之际，同台湾人一起，为保卫自由而反抗暴政，搏战强权——用血来表达人类对自由事业的真诚。

《保卫台湾自由国际志愿军》的主体应由下述两类人组成。第一类是为逃离中共暴政而流亡海外的汉人、藏人、维人、蒙古人等。这个群体对中共暴政的残忍和诡诈有切身的体验，他们的加入，会使国际志愿军有能力深刻了解中共暴政，从而增强战力。因为，“知敌”是百战不殆的前提。第二类是世界各国，主要是民主国家的公民。国际志愿军属于民间组织，任何人都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不过，在组建过程中要注意吸纳知识分子、政治活动者、商人和退役军人。理由在于，知识、政治权力、金钱和搏战能力构成社会中最具现实能量的四个要素，而上述四类人分别是知识、政治权力、金钱和搏战能力的生命承载者。吸纳他们加入，与为国际志愿军吸纳强大的社会能量是同一回事。

另外，国际志愿军中还要有一定数量的台湾海外移民。他们既了解海外情况，又了解台湾。由他们居中协调，有利于安排与国际志愿军入台参战相关的各项事宜。

一位美国教授曾对我表示，他愿意在中共武力犯台时，以志愿者的身份，赴台抗击中共，前提是台湾人自己必须表现出保卫自由的强烈愿望。这位美国教授的坦率表述，也正是组建《保卫台湾自由国际志愿军》所必备的前提。我在遍游台湾，纵横北美，为台湾的自由演讲期间，感到了一种能烧裂岩石的炽烈的激情。那激情深藏在台湾人和“台美人”的心底里，那是愿为台湾的自由、独立和尊严万死而不悔的意志——他们即便被碎尸万段、挫骨扬灰，也不会背弃那个意志。正是这种感触给我以信心：组建国际志愿军的前提早已具备。

过去几年间，不少人总向我论证美国不会放弃台湾，论据不外乎“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类的概念与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攸关等实用主义的思考。且不说马英九已经用我们曾两次援引的一句话——“永远不会要求美国人民为台湾而战”，一劳永逸地斩断美国官方出兵台海的可能，仅对于所谓“岛链”之类概念的痴迷，就意味着思想的落伍。在科技日新月异，空天战的概念已经出现的背景下，地表环境对军事能力的制约极大地降低，“岛链”不再像过去那样与美国有生死攸关的战略关系。而且，中共正在试图同美国进行核心国家利益的交换。在中共把台湾和西藏列为它的两项最基本的核心利益的同时，由于地理环境对军事能力制约的减弱，台湾已经不属于美国核心利益的范畴，因此，美国以对台海两岸问题不进行军事干涉的承诺，来换取中共在美国核心利益上的让步，乃是当代绥靖主义最令人齿冷的前景。所以，仅仅从实用主义的狭隘眼界审视，台湾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同美国，同世界交换的筹码；台湾拥有的唯一能令美国和世界震撼的能力属于精神领域，即“不自由，毋宁死”的高贵情操。

所以，《保卫台湾国际志愿军》的基础，不在于同台湾作实用主义利益交换的考虑，而是属于自由的理想主义。命运常被利益收买，也可能被理想主义感动。不同之处在于，利益收买的命运定然俗不可耐，甚至肮脏堕落；听从理想主义召唤的命运定然美而高贵。既然如此，就让《保卫台湾自由国际志愿军》成为实用主义主宰的时代中涌现出的理想主义奇迹吧。当志愿军不得不用自己的血为台湾的自由之神洗礼的那一刻到来时，或许人类再次回归理想和意义的时代的晨钟也会同时撞响。

物欲虽然充斥于现实，却又离人的根本利益，即生命价值甚远；理想主义，特别是关于自由的理想主义，虽然离世俗生活甚远，却又与人的根本利益生死相依，同生共存。因为，如果失去自由，人即使拥有一切，也是卑贱的奴隶；即使失去一切，只要还拥有自由，命运就与希望一致。有人愿意相信利益交换的力量。他们不懂，利益引诱可以促使人去作很多事，但是，却不能令人成为保卫自由的英勇战士。理想主义常常显得缺乏现实的力量，不过，只要理想主义从心灵的感动升华为信念，便会形成征服现实、创造历史的强大意志能量。《保卫台湾自由国际志愿军》就是理想主义熔铸出的自由信念的象征，在保卫台湾自由和人类根本利益的决战中，志愿军定然是令中共暴政望而生畏、闻风丧胆的骁勇劲旅。

《保卫台湾自由国际志愿军》固然要在二零一二年和台湾人一起，用血书写对自由的热恋，证明“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但是，从开始组建之日起，国际志愿军就将以理想主义的名义作用于现实。其作用至少有下列各项：

（一）促进世界理解历史命运对台湾的不公正和台湾人心灵的痛苦；理解在中共暴政的逼迫前，创建《台湾共和国》的独立建国运动，是保卫台湾自由的不二选择。

（二）促进世界了解中共暴政的本质及其二十一世纪全球扩张战略，让人类意识到，大劫难正在形成之中；中共暴政，这个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建立的东方巴士底狱，是人类大劫难之源。

（三）由于被迫流亡的汉人、藏人、维人、蒙古人的加入，国际志愿军为保卫台湾自由同中共暴政的搏战，就具有了促进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效应。因为，各民族流亡者共处于国际志愿军中，实际上意味着被摧残与被压迫者反抗中共暴政的联盟开始形成。这种联盟对于彻底否定中共暴政意义重大。

（四）以国际志愿军为先导，形成各民主国家普遍参加的世界反极权扩张的国际行动阵线。

对于上述第四项作用，有必要作一些补充讨论。我曾经分析过，当代美国和欧洲诸国的政客群体，不可能跨越中共暴政的实用主义诱惑，真正关注中共控制台湾的政治阴谋，更缺乏把中共政治灭台和其推行全球极权主义扩张战略联系起来思考的远见。所以，二零一二年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和欧洲诸国都不会给台湾提供强有力的军事支持。但是，如果国际志愿军吸纳众多美国和欧洲诸国的公民参加，这些志愿者为保卫自由理想而在台湾进行的浴血苦战，必将震撼并唤醒其母国民众的良知。当良知的觉醒通过民主程序，形成美国和欧洲诸国的国家意志，构建反极权扩张的强大国际行动阵线就获得了基石。

只要台湾保卫自由和独立的运动成为人类的共同事业，中共暴政的挫败和台湾自由命运的高歌凯旋就都是必然的。

台湾大国策 结束语：属于台湾的英雄史诗时代

结束语：属于台湾的英雄史诗时代 ——历史将把他们的灵魂刻在鐵碑之上

此书文稿初成之际，我的心忽然空虚如死寂的大野之夜，只覆盖著茫茫无际的期待——那是我对朝霞的期待，也是时代对英雄史诗的期待。

数年之内，台湾的[自由](#)命运定将成为人类历史的焦点，台湾必将创造属于[自由](#)的英雄史诗。在一个崇拜物欲的时代，[自由](#)的英雄史诗意味着对人类的拯救。因为，唯有血泪丰盈的英雄史诗，才能开启回归精神价值和理想主义的时代之门——丧失对精神价值的理解和理想主义的追求，人即使财富如山，享乐如海，也不过是与草木同朽的卑微存在。

台湾的英雄史诗将表述美、高贵与自由。美是艰难的，高贵是艰难的，自由更艰难，然而，为了不死于政治奴隶的命运，台湾必须承受属于英雄史诗的艰难。

约一年之前，我得一梦：清明之际，断肠之时，愁云压顶，晦暗如夜，雨丝似银，若苍天悲泣。有三百台湾铁汉，白衣胜雪，抬鐵碑缓步行于雨中，至英雄郑南榕

墓前，奠酒明誓——为外抗强权，内惩国贼，不惜血浴刀锋。三百铁汉之名，皆刻于鐵碑之上；数为三百，乃取温泉关三百斯巴达勇士之古意。

我将此梦诉于一台湾友人，正德兄。吾友正德，面紫如千年香檀木雕，形正似万鬼惊惧之金刚菩萨；锦绣心胸，才华内敛；壮怀激烈，刚毅外显；其端坐时，威严酷似虎踞，其行走也，稳重犹如山移；纵酒则睥睨万物，慷慨悲歌，遇事则深沉有致，明见千里；为台湾命运，正德兄忧思如焚：其心也，常萦长虹贯日之志，其言也，时显彗星袭月之意——正德兄诚乃如烈酒如长歌之人。

听过我之梦境，吾友正德拔刀而起，斩石明志，愿集三百台湾志士，效斯巴达铁血勇士，于强敌犯境时，为保台湾自由，而决死一战。正德兄亦将铸一鐵碑，刻三百志士姓名于其上，立鐵碑于高山花海之间。正德兄嘱我撰鐵碑铭文一篇，以志其事。我奉命焉。现以此鐵碑之铭，为《台湾大国策》一书作结。

《鐵碑铭》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大洋浩荡，海涛无垠，波涌浪舞之际，宝岛嵯峨崛起，上摩云汉，雄踞东亚。金日映玉山之冰峰雪岭，流光溢彩，华贵万方，宝岛势若沐万里碧波之璀璨王冠。

宝岛出世，名称台湾。采天地之灵气，万美咸备；集日月之光华，神韵天成。君不见，宝岛之上，有插天之千仞铁壁，泻地之万道银泉；明澈清莹，呈日月之潭，林涛雾海，现阿里之山；百花四时盛放而绚丽，如百代不败之诗意，长风舒卷海云而浩渺，似千年不息之雅乐；稻穗金黄万顷，涌向丰饶之海，美酒如歌如诗，可醉倒苍天大地。

然天妒红颜，地嫉奇秀。四百年有奇，宝岛命运多桀。外在强权，势如虎狼，控驭台湾于股掌之中。于是乎，血泪与骤雨交迸，苦痛共山风悲号；屈辱无尽，如蔽日之黑云，恐惧压心，似浓雾锁闭重山。

幸賴台湾地灵而人杰，英雄烈士代代不绝。蹈苦难如履花海，饮血泪似喝琼浆，以英俊壮丽之生命，为台湾作自由独立之祭。四百年苦难如山，四百年血泪如涛，感天动地，台湾终获自由。

值此时也，又有中共强权，鹰视狼顾，欲鲸吞宝岛，灭绝自由，其心何其狠也。强权逼迫，宵小不堪之徒，奴颜婢膝，思卖台求荣，以得富贵；怯懦庸俗之辈，心惊胆摇，谋移财海外，以求自保。卖台弃台，忘恩背义；宝岛山河定然有灵，必会因而心碎，并作彻夜之长哭。

我等三百台湾死士，铁骨间有玉山之岩的芳香，热血中有宝岛烈酒的氤氲，额头上有台湾的日月星辰闪耀，今在此铁铸之墓碑前，明决死之志如左：

宝岛是我心灵的家园，岂能容外来强权凌辱；自由是我生命的图腾，绝不许中共强权摧残。宁为自由之鬼雄，不作专制奴隶而苟活。中共犯台之日，便是我等冲天一啸，拔剑而起之时。

剑指苍穹，必有天雷助我武威；血溅红日，定让强敌胆破心裂。我等三百台湾铁汉，心逾坚石，死志已决，只待辉煌一战。届时，只愿生命如花雨漫天飞落——飘入台湾独立建国的百年之梦，且为《台湾共和国》作缤纷落花之祭。

血誓刻于鐵碑，以明台湾好男儿铁血之志。

二零一零年六月六日初稿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修订

[RSS全文订阅中国禁闻，不翻墙看禁网，SSL全程加密，安全可靠方便 | Email订
阅](#)